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前中古辭賦中的「江南」論述

——以《楚辭》、〈山居賦〉、〈哀江南賦〉為主的討論

The Jiangnan Discourses of Pre-medieval Rhapsodies: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Songs of Chu*,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nd “Lament for Jiangnan”

彭定源

Ting-Yuan Peng

指導教授：鄭毓瑜 先生

Advisor: Prof. Yu-Yu Cheng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July, 2008

摘要

由於先秦到六朝的「江南」研究，少有貫串時序、提點脈絡的學術論著，本論文擬從《楚辭》、〈山居賦〉、〈哀江南賦〉三個端點，探索前中古的辭賦如何建構「江南」。

《楚辭》分為屈賦和「擬騷」。屈原筆下的「江南」為政治權力關係下士臣的意識空間，可從中央與東西南北四方、中央與四方上下兩種體系切入。漢代「擬騷」中的「江南」，則是模擬屈賦的紙上空間，並可再細分成〈招隱士〉及其他「擬騷」兩部分：前者將原本屈原筆下吐露士臣哀思的「江南」，改寫為權力中心對於逃離體制的警告；後者則以屈賦與〈招隱士〉各種意象的交錯，體現失志之士只能逃遁或者哀泣的不遇感慨。

相對於西漢至東晉的大賦，都未呈現長久依存於「江南」的在地體驗，〈山居賦〉中的「山居」，不論是強調「山」而不是「水」，或是雖沿用賦體，但提出遊走於私我與皇權兩種向度的「居」，都豁顯出不同於以往大賦的關注角度。因此除了相應於晉宋時期「東山」經營的風潮，始寧山居如何體現謝氏「祖德」、對抗放逐，以至謝靈運由身體行動開展了什麼樣的「江南」風景，都是研討的重心。而賦文中引用、轉寫楚典的一段，更展現了謝靈運企圖超越屈原的放逐之悲。

〈哀江南賦〉的「江南」論述可從三個層次來談。首先，除了注意到「哀江南」承續屈騷，也不應忽略「江南」一詞包有地理、社會、文化等意涵，「梁」只是其成分之一。其次，經由〈哀江南賦〉與〈歸魂賦〉、〈觀我生賦〉的相互對照，透顯三文中「江南」書寫所包蘊的「家園」與「中原」意涵。第三，從庾信反用典故以解構「江南」，點出「江南」可「哀」之處。

因此，從《楚辭》談到〈山居賦〉、〈哀江南賦〉，一方面呈現出了一個「江南」起源、開發與崩毀的歷程，並涉及了三賦之間的彼此對話；另一方面，若與《尚書·禹貢》、《周禮·地官》、《禮記》等傳統地理論述、乃至具現此論述模式的傳統大賦相參照，會發現一直要到〈哀江南賦〉等作，「江南」才得以擺脫和權力中心相對的邊緣地帶，且以駢賦的書寫範式來寫就此「江南」「中原」。往後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嘗試讓北方也經由南方的書寫格套來成為權力中央，相較於以往「江南」希冀憑藉傳統賦體晉身「中原」，正可說是此一時，彼一時了。

關鍵字：江南、空間、《楚辭》、〈山居賦〉、〈哀江南賦〉

目 錄

緒論	01
第一章 《楚辭》中的「江南」論述	
第一節 前言	07
第二節 中央與四方、中央與四方上下之權力關係下的意識空間 ——屈賦中的「江南」論述	09
第三節 漢代「擬騷」中的「江南」論述	17
一、 權力中心對於逃離體制的警告 ——〈招隱士〉的「江南」論述	17
二、 失志之士的紙上慰藉 ——〈惜誓〉、〈七諫〉、〈哀時命〉等漢代「擬騷」中的「江南」 論述	20
第四節 結語	25
第二章 〈山居賦〉中的「江南」論述	
第一節 前言	27
第二節 山川論述與江海描繪 ——西漢至東晉間「大賦」中的「江南」論述	28
第三節 山野園宅與經營開發 ——晉宋時期的「東山」論述	33
第四節 山水流連與功成身退 ——〈山居賦〉中體現「祖德」的「山居」	39
第五節 身體行動與居的世界 ——〈山居賦〉中以身體行動開展的「江南」風景	47
第六節 結語	55

第三章 〈哀江南賦〉中的「江南」論述

第一節 前言.....59

第二節 以「梁」詮釋「江南」的效用與局限

——〈哀江南賦〉對於〈招魂〉的承襲與轉化.....60

第三節 家園與「中原」的「江南」

——〈哀江南賦〉、〈觀我生賦〉和〈歸魂賦〉中的人情普遍性與文化

正朔.....66

第四節 「江南」的建構與解構

——〈哀江南賦〉用典藝術的探討.....73

第五節 結語.....79

結語.....81

主要參考書目.....85



緒論

文學如何書寫「江南」？相應於史地學界對於「江南」的研究，若以宋代為斷限，已觸及了地理疆域上，從廣狹兩義並用，到形成具有穩定內涵之專有名詞的沿革；土地經濟上，由生產力低落到漸次開墾、乃至商業城市興起的發展過程；多雨卑濕與瘴疫流行的地域特徵；以及南北士人遷徙與文化交流等種種面向的問題，¹文學中的「江南」究竟又可從什麼樣的切點進行討論？

如果同樣由宋朝往前爬梳聚焦於「江南」文學書寫、文人集團，或者是與文本相關的文化研究之著作，首先會注意到的就是最早文學總集《詩經》中關於「南」的書寫了，²但一來《詩經》中之「南」以至「南山」成詞等所含涉的意涵眾說紛紜，需要更為深厚的學養以探討，二來一般仍視《楚辭》為相對於北方的南方文學起始，且《詩經》之「南」指涉的最南地域達至江漢流域，而漢水已是《楚辭》之北了，³因此《楚辭》可能是更具代表性的書寫源頭，三是以《楚辭》為「江南」書寫的起源，更可見出後代「江南」文學沿襲轉變的痕跡(後詳)。基於以上原因，暫且不論《詩經》，再縮小搜尋範圍為《楚辭》到宋代的研究資料，此時主要就有以下的研究成果：劉躍進：《樂府古辭〈江南〉考論》、⁴林文月先

¹ 有關史地學界對於宋朝以前「江南」的研究，略舉重要著作如下：饒宗頤先生：〈江南解〉(收入氏著：《楚辭地理考》，臺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4月，頁79-83)、周振鶴：〈釋江南〉(收入錢伯成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1992年6月，頁141-146)、蕭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3年12月)及〈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83年4月，頁67-171)、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頁95-113)及《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臺北：帛書出版社，無著出版年月)、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10月)、張劍光：《唐五代江南工商業布局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10月)、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而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研究也可參考，如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月)、王庸：《中國地理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7月)。

² 研究資料略舉如下：文幸福：《詩經周南召南發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79年6月，頁1-118)、陳致：〈說「南」：再論《詩經》的分類〉(《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2期，1998年3月，頁355-402)、劉益州：〈《詩經》中「南山」一詞意向的複合與應用〉(南華大學文學所：《第三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符號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4月)、鄭志強：〈《周南》、《召南》之「南」正義——兼論二〈南〉與「楚風」的關係〉(《中州學刊》2004年第6期，頁82-87)、段學儉：〈《詩經》中「南山」意象的文化意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頁51-53)、林東海：〈「南」「風」辯說〉(《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年2月，頁1-9)。

³ 如〈九章·抽思〉：「有鳥自南兮，來集漠北」、「望北山而流涕」，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10月)，頁231、232。

⁴ 劉躍進：《樂府古辭〈江南〉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6月。

生：〈潘岳陸機詩中的「南方」意識〉、⁵程章燦：〈地理發現與政治定義——論郭璞〈江賦〉〉、⁶鄭毓瑜先生：〈名士與都城——東晉「建康」論述〉、⁷以及〈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⁸曹道衡先生：〈略論晉宋之際的江州文人集團〉、⁹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從〈廬山略記〉與〈遊石門詩序〉談起〉、¹⁰田曉菲先生：*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第七章 “The Culture Constructuin of the North and South”、¹¹王文進先生：〈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爲主的觀察〉、¹²〈南朝文人的「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¹³陳頤真：《六朝之江南及其文學——以香草、山水與歸魂爲主》、¹⁴李心怡：《唐詩中的揚州形象》、¹⁵俞志慧：《唐代浙東詩論略》、¹⁶蘇芳于：

⁵ 林文月先生：〈潘岳陸機詩中的「南方」意識〉，《臺大中文學報》第5期，1992年6月，頁81-118。

⁶ 程章燦：〈地理發現與政治定義——論郭璞〈江賦〉〉，收入氏著：《賦學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9月。另外，高莉芬先生：〈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1期，2004年6月，頁113-148）第四節「祝聖空間的文學書寫儀式」，亦對郭璞〈江賦〉、庾闡〈揚都賦〉、〈涉江賦〉、〈海賦〉等有所闡發，但先生主要是從神話原型的角度剖析兩晉江海諸賦，「江南」書寫不是其關注焦點。

⁷ 鄭毓瑜先生：〈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收入李豐楙編：《地域、空間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199-236。

⁸ 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先生此文原以英文稿 Bodily Movement and Geographic Categories: Xie Lingyun's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nd the Jin-Song Discourse on Mountains and Rivers 登載於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vol. 23, 1-4, 2007, pp.193-219。此增補部分內容之中文稿已通過審核，將刊登於《淡江中文學報》，本文所引述之內容出自原始稿本，將待學報出刊後再加列出版項及調整頁碼）。

⁹ 曹道衡先生：〈略論晉宋之際的江州文人集團〉，收入氏著：《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7月，頁121-136。

¹⁰ 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從〈廬山略記〉與〈遊石門詩序〉談起〉，《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71-106。

¹¹ Xiaofei Ti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10-366.

¹² 王文進先生：〈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爲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年7月，頁103-113。

¹³ 王文進先生：〈南朝文人的「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收入《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12月，頁239-262。其實山水文學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但若要聚焦於文學與環境間如何交相互動的空間研究，似乎還沒有很充分的討論，因此此處只各舉了鄭毓瑜先生和王文進先生的兩篇文章爲例。以下再略舉一些較重要的山水文學研究，例如：林文月先生：《山水與古典》（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6月）、王國瓔先生：《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96年7月）、陶文鵬、韋鳳娟主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小尾郊一著，紹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顧彬(Wolfgang kubin)著，馬樹德譯：《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

¹⁴ 陳頤真：《六朝之江南及其文學——以香草、山水與歸魂爲主》，臺北：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

¹⁵ 李心怡：《唐詩中的揚州形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6月。

《唐宋士人揚州遊樂意象的生成與轉變》、¹⁷景遐東：《江南文化與唐代文學研究》、¹⁸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¹⁹等等。觀察以上資料，可發現先秦到漢朝的「江南」較不受到學者的關注；六朝和唐宋時期的研究則都已累積了一些著作，而唐宋雖多集中於揚州浙東東南一隅的討論，但也有嶺南或湖湘放逐之地的研究，大體上已隱然浮現出該時期對於「江南」有著繁華都城與放逐僻地的兩條書寫脈絡；六朝的研究則包括了江州、會稽和建康(包含長江)，焦點似乎較為分散，並未出現唐宋兩代針對兩地域的研探風潮。若考慮到從先秦到六朝的「江南」研究，都還未出現一些貫串時序、提點脈絡的學術論著，陳頤真的《六朝之江南及其文學——以香草、山水與歸魂為主》，嘗試以《楚辭》(屈原)、山水文學(包括謝靈運、江淹、謝朓)，以及庾信〈哀江南賦〉三個端點，建立從先秦到六朝「江南」的書寫脈絡，就顯得極有新意。不過，該論文的内容仍較偏重於史料的分析考察，因此前中古這段時間的「江南」文學書寫，似乎仍是一塊值得繼續開發的研究場域。

本論文擬探索前中古辭賦中的「江南」論述，並以《楚辭》、〈山居賦〉、〈哀江南賦〉為三個主要端點。之所以如此選取，除了受到鄭毓瑜先生的提點、陳頤真的啟發外，還有以下的考量：首先，三者具有時代先後的層次感。屈原(343-277B.C.)²⁰賦作雖被視為南方文學的最早代表，但相較於已有的「時間」研究，²¹從「空間」面向來探索屈賦的著作則並不多見，²²而「擬騷」呈現了漢人對於屈原同情共感的理解，因此討論兼含兩者的《楚辭》，可藉由參看對照以凸顯異同。謝靈運(385-433)是晉宋之際的山水文學大家，關於其山水詩的研究很多，²³但〈山居賦〉的討論則很少。²⁴駢賦能手之庾信(513-581)，由梁入北，並

¹⁶ 俞志慧：〈唐代浙東詩論略〉，《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14-22。

¹⁷ 蘇芳子：《唐宋士人揚州遊樂意象的生成與轉變》，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7月。

¹⁸ 景遐東：《江南文化與唐代文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¹⁹ 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東華人文學報》，第7期，2005年7月，頁41-84。

²⁰ 本論文所錄各作者的生卒年，主要依據姜亮夫纂定，陶秋英校：《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5月)、以及張可禮：《東晉文藝繫年》(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以下各章不再贅述。

²¹ 如陳世驥先生：〈論時：屈賦發微〉(收入葉維廉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比較研究》，臺北：黎明文化，1977年10月，頁47-358)。

²² 比如關於屈賦中「路」此空間意象的探討，許又方：〈路曼曼其脩遠兮/論〈離騷〉中的時空焦慮〉(《東華人文學報》，第3期，2001年7月，頁381-416)中第三節，以「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意涵來處理，見頁389-394。

²³ 以下略舉其要：林文月先生：〈鮑照與謝靈運的山水詩〉(收入氏著：《山水與古典》，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6月，頁99-130)、王國璽先生：〈謝靈運山水詩中的「憂」和「遊」〉(《漢學研

羈留北地，〈哀江南賦〉象徵了「江南」的結束。因此以《楚辭》、〈山居賦〉、〈哀江南賦〉為前中古「江南」的探索焦點，會形成一個由開始、發展到收束的完整脈絡。其次，〈山居賦〉和〈哀江南賦〉皆有引用屈賦的部分，比如〈山居賦〉引述了一段〈九章·涉江〉的景緻描繪，〈哀江南賦〉則不僅涉及了文學用典的問題，還使用了「江南」此兼含了地理、社會兼文化表記的詞彙，²⁵因此若詳加分析兩賦如何引用與轉寫屈賦，應可豁顯出謝靈運與庾信相對於屈原，其「江南」的書寫特色。其三，選取作品皆為辭賦，除了《楚辭》部份為總覽諸作，〈山居賦〉與〈哀江南賦〉都以單篇研究為主，再輔以其他參考文本，此作法一方面當然是受限學力，無法處理從《楚辭》到六朝含括詩文的所有文本，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聚焦於這三個端點，藉由深入的研究，以小見大，提揭出前中古「江南」文學的發展脈絡。基於這三個因素，本論文擬訂「前中古辭賦中的『江南』論述——以《楚辭》、〈山居賦〉、〈哀江南賦〉為主的討論」為題，進行研究。

本論文對於「空間」的認知，為「空間」是個人與空間的相互定義。接續著 1960 年代的實證性地理學，於 1970 年代興起的人文地理學，反對注重數據計量的空間觀，認為地理學不該輕忽人的主體或者是將人加以物化，應以「人之主體存有」作為地表空間的核心。²⁶ 鄭毓瑜先生即認為，這種講求主體賦予意義的脈絡，對於文本的詮釋極具啟發性：

當空間成為社會關係的產物，或者出現充滿情感的地理學書寫，首先讓文學文本相關於空間的描繪都可以脫除「太主觀」或「不科學(不是地理事實)」的世俗認定，文學筆法固然不是客觀地呈現區域或地方，但是卻比看似精確的統計圖表更能撐拄起當時深刻的社會脈絡與在地經驗。其次，正因為破除了主/客觀或現實/想像的二元分界，空間無法單純被反映，同

究》第 5 卷第 1 期，1987 年 6 月，頁 161-181)、鄭毓瑜先生：〈觀看與存有——試論六朝由人物品鑒至於山水詩的寓目美學觀〉(收入氏著：《六朝情境美學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 3 月，頁 121-170)。

²⁴ 主要的有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8)、曹虹：〈謝靈運〈山居賦〉自注與柳宗元山水遊記〉(收入氏著：《中國辭賦源流綜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9 月，頁 76-82)、塚本信也：〈謝靈運的〈山居賦〉與山水詩〉(收入宋紅編譯：《日韓謝靈運研究譯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151-172)。

²⁵ 見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燕京學報》新 12 期，2002 年 5 月，頁 191-250)，頁 218。

²⁶ 參見潘朝陽：〈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說」的宗教性詮釋〉(《中國文哲通訊研究》，第 10 卷第 3 期，2000 年 9 月，頁 169-188)，本文對於從實證性地理學到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史有簡要的介紹。

樣也無法完全被編造，這應該是個人與空間「相互定義」的文本世界。²⁷

而在「相互定義」的原則下，還有以下幾個概念為本文的關注點。首先是「空間」與「地方」的區隔。段義孚先生認為，不同於幾何計量的「空間」，「地方」是人透過居停，產生經驗，進而體現價值意義的所在。²⁸段先生的研究，揭示出人無法出入於一個全然「客觀」的「空間」，同時，「客觀」的「空間」書寫其實也並不存在，這是非常重要的提點。然而進入主體與環境如何交相互動的討論時，段先生的學說有時則會因過於注重主體的情緒情感，所賦予外物的價值，因而可能忽失了外物反過來對於人身的影響，²⁹如此伯梅強調外物包圍人身的「氣氛美學」，則可以提供我們對於主體與環境如何互相調諧的另一個思考點。³⁰由段先生和伯梅的研究，可知文學的「空間」書寫不會是地域的直接反映，而是主體與環境互動下的文學建構。這對於我們思索以下問題有莫大的裨益：若地域反映論有其盲點，不應簡化屈賦的「江南」書寫為生於楚地就該、並且就能描寫楚地風光，那麼屈賦是從什麼角度譜畫出「江南」的景緻？東晉立國(317)至謝靈運出生(385)已經過將近 70 年，其間士人與「江南」存有什麼樣的互動關係，謝靈運的〈山居賦〉，承續了之前什麼樣的「江南」意象，他自己的「地方」經驗又是什麼，並且兩者如何相會於〈山居賦〉之中？而東晉(317-420)至梁(502-557)立足南土已兩百餘年，「江南」一詞毋寧積累了士人一層層的生活印記與思索體會，庾信篇題中的「江南」，自不能脫離此時代氛圍，他又寫出了什麼不同於謝靈運，乃至屈原的「江南」？

其次還可注意權力空間的議題。傅柯認為像是「場」(field)、「區」(region)、「領域」(territory)等許多的地理觀念，其實都充滿了政治或知識權力的運作。³¹

²⁷ 引自鄭毓瑜先生：《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 12 月，頁 15-29），頁 16。有關「空間」議題的重要著作及其研究脈絡，請參見鄭先生在導言中注 1 的討論，見頁 25-26。

²⁸ 請參考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e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尤其是第十章“Intimate Experience of Place”，見頁 136-148。此書有中譯本：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3 月）。

²⁹ 此為鄭毓瑜老師在課堂上的提點。例如段先生引舉了一個藉由接觸熟悉事物以消除恐懼的例子（見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epective of Experience*. p. 144.），此「物為我用」的視角，可能會限制了外物對主體也具有影響力的面向開展。

³⁰ Böhme, Gernot. “Fundamental Concept of a New Aesthetics.” *Thesis Eleven* 36(1993). 此文有中譯，請見谷心鵬、翟江月、何乏筆譯：〈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第 70 期，2003 年 4 月，頁 10-33），亦可參考何乏筆：〈氣氛美學的新視野：評介伯梅〈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第 70 期，2003 年 4 月，頁 34-43）。

³¹ 請參考 Michael Foucault. “Questions on Geography.”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這尤其有助於我們對屈原放逐的地理書寫，以及謝靈運隱居山林卻強調祖德、涉入世務的探討。另外則是文本空間。這其實涉及了典故運用及經典化的問題。從漢代擬騷、到〈山居賦〉和〈哀江南賦〉，都與《楚辭》有所關聯，這種文本空間的疊合會產生什麼效果？或者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當書寫「江南」都不免要溯及屈原時，〈山居賦〉和〈哀江南賦〉又是如何將屈賦推向「江南」書寫的經典？

這些問題，希望在以下幾章的研究中，都能獲得解答。而有關《楚辭》、〈山居賦〉、〈哀江南賦〉，乃至包括屈原、謝靈運和庾信等的詳細參考資料，則請見各章註腳或附錄於後的參考書目，此處不再羅列。



第一章 《楚辭》中的「江南」論述

第一節 前言

一般文學史往往視《楚辭》為相對於「北方文學」代表：《詩經》的「南方文學」起始。這主要是建基於《楚辭》與荆楚地域的連結，比如可以是具有書寫「楚語」、「楚聲」、「楚地」、「楚物」的區域特色，像宋人黃伯思(1079-1118)所云：

蓋屈宋諸賦，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
若些、只、羌、諍、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葑、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¹

或者是從南北文化體系的對照，以凸顯出《楚辭》所具有的「南方」風味，例如廖棟樑先生從漢人以降討論《楚辭》與經典(尤其是《詩經》)的同異之中，指出這樣的探究，其實就是對於《楚辭》是承襲了北方文化，或顯露南方特質，兩者成分多寡的爭辨，他說：

漢代圍繞《楚辭》的繼承關係問題上的論爭，至少昭示出兩條主要路向：一是著眼於屈原與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北方中原文化的關係；一是著眼於屈原與巫教風俗為特徵的南方荆楚文化的關係。²

然而，這樣的討論似乎都預設了一種南北對舉的思考模式，並且對於何為北方特點、何為南方風格，都先抱持了一個特定立場，像是北方與南方就須相應於剛與柔、樸與麗、儒與道等等，如果注意到王文進先生研究南朝邊塞詩時特別強調，南北分立的先入之見、南北風格的刻板印象，是學者們昧於「豪放雄壯」的邊塞詩其實源自於南土的主要原因，³那麼，地域風格就不該是簡單的直接反映，

¹ 引自宋·黃伯思：《東觀餘記》卷下〈校定楚詞序〉(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743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無著月份，頁68-71)，頁68-69。

² 見廖棟樑：《古代楚辭學史論》(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年6月)，頁116。其書第五章「論《楚辭》的文化歸屬——以南北文化論爭為主據」可參看。

³ 如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2月。

而是複雜的建構過程。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對於劉勰(465?-520?)和王夫之(1619-1692)以下的討論，就存有更多值得細膩探究之處：

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⁴

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峩嶴戍削之幽苑。故推宕天地，而天采蠱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揜抑。……夫豈東方朔、王褒之所得與乎！⁵

因此，本文想要提出的問題就是：南方與屈原之間是以什麼樣的網絡聯繫起來的？屈原為何，以及如何建構出這樣的南方？此建構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要探索這些問題，「江南」應是個很好的切入點，原因在於：其一，「江南」是楚國放逐罪犯之地，因此討論「江南」就須從其與「楚國」的關聯網絡中進行，而兩者共組為《楚辭》中的「南方」。其二，屈原以降，以「江南」入題進篇的詩文之作不勝枚舉，例如庾信有〈哀江南賦〉、明清之際有〈大哀賦〉等擬騷作品，⁶謝靈運〈山居賦〉引用了〈九章·涉江〉的一整個段落，唐宋時期也有貶官吟騷的風潮。⁷以「江南」為討論焦點，不僅可說是追溯起源，也得以對照出往後「江南」意涵的轉變。因此本文分成「屈賦中的『江南』論述」、「漢代『擬騷』中的『江南』論述」兩部份。前者選取屈賦中的紀行之作，以及屈賦中唯一使用了「江南」一詞的〈招魂〉作為討論焦點；後者則是將觸角延伸至包括〈招隱士〉和〈惜誓〉、〈七諫〉、〈哀時命〉等漢人擬騷，以梳理出不只是先秦，而是包括漢代以來以屈賦為主線的「江南」風景，並且藉由參照漢人擬騷，更清楚地看出屈賦「江南」論述的特點及其影響。另外，附帶一提的是，本章所謂「楚辭」，包含屈原作品與漢代擬騷之作：「楚辭」為統稱，分言之則為「屈賦」和「擬騷」。

⁴ 引自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物色》（臺灣：開明書局，1993年5月）卷十，頁2。

⁵ 清·王夫之：《楚辭通釋·序例》（臺北：廣文書局，1963年2月），頁6。

⁶ 相關論文如鄭毓瑜先生：〈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哀江南」論述——以夏完淳〈大哀賦〉為端緒的討論〉（收入《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12月，頁135-191）。

⁷ 相關論文如衣若芬：〈「瀟湘」山水畫之文學意象情境探微〉（《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2002年3月，頁175-222）、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東華人文學報》，第7期，2005年7月，頁41-84）。

第二節 中央與四方、中央與四方上下之權力關係下的意識空間

——屈賦中的「江南」論述

討論屈賦中的「江南」，主要可從中央與東西南北四方，以及中央與東西南北上下的兩種權力關係網絡切入。前者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是〈九章·哀郢〉、〈九章·涉江〉這些屈原遭受放逐的紀行之作。〈九章·哀郢〉在以「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譜出序曲後，面對的便是一個迷失在時空雙向間的旅程：

將運舟而夏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之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⁸

「放逐」不僅是「去終古之所居兮」，一方面遠離世居，另一方面與過往的一切斷裂隔絕；同時也是「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以上皆引自〈九章·哀郢〉），踏上了看不見未來的孤獨旅程，並且還因憂心國將危亡，竟預見了未來化為丘墟的荒蕪都城。⁹〈九章·哀郢〉眼前的景觀，毋寧像是一種「概念式的風物」¹⁰。〈九章·涉江〉則可分為頗具層次的五段：首段自「余幼好此奇服兮」至「旦余濟乎江湘」，次段為「乘鄂渚而反顧兮」到「雖僻遠之何傷」，第三段是「入溁浦余儵徊兮」至「固將愁苦以終窮」，第四段為「接輿髡首兮」到「固將重昏而終身」，末段則為亂辭。開篇屈原雖置身於「崑崙」、「瑤圃」，得以「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但馬上淪為強烈對比的江湘之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為放逐之旅展開序幕。次段是在山臯水渚間徘徊游移：「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然後以「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說服自己不肯放棄堅持是正確的選擇。第三段是「幽獨處乎山中」，更加迷茫晦暗的景色：「入溁浦余儵徊

⁸ 本章《楚辭》皆引自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10月）

⁹ 請參考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收入氏著：《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8月，頁75-143），頁78-79。

¹⁰ 見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前注），頁79。

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並續以「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以終窮」的自我鼓勵。第四段回顧歷史，歸結出自己其實並不孤獨，前有伍子比干的往賢之風，因此「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最末一段則為「陰陽易位時不當兮」的慨歎。由點出「濟江湘」，到「邸車」、「容與而不進」、「回水而凝滯」，以至「山高蔽日」、「幽晦多雨」、「迷不知吾所如」，似乎就是逐漸走向情緒最深處的三個歷程，而那越來越迷茫昏惑的江山風景、徘徊不忍離去的舟車回水，更像是眷戀故國的心情象徵；在景緻描繪間穿插的自我標持，例如「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其心端直僻遠何傷」、「不能變心從俗」、「將董道而不豫」，則彷彿是相應於愈發深沉的心情寫照，所刻意自持的高唱。因此，〈九章·涉江〉和〈九章·哀郢〉所描繪的「江南」風景，與其說是現實環境中的自然景物，不如說是屈原悲憤的心靈世界，如同吳旻旻所說的，這些物象「在在雙關指涉山中荒僻的環境與詩人孤苦的心境，屈原通過個人濃烈的哀傷、孤獨、失望強化自然景物的主觀性，把真實可見的景物與主觀感上融為一體，實際的景物與虛擬的象徵之間界線模糊難辨」¹¹。而當周遭風物是遭受放逐以致落魄潦倒的處境呈現，屈原則高舉道德的光環，認為這即是堅持原則、不肯妥協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既然屈賦描繪的景緻與詩人的處境心象密切相關，那麼賦中的地理方位，是否必然要從徵實的角度予以解讀，可能就有討論的空間。這當然並不是要否定屈賦中的紀行之作為虛擬漫遊，就像〈九章·哀郢〉與〈九章·涉江〉的重心雖不在於交代行處，「鄂渚」、「枉渚」、「辰陽」、「洞庭」、「溇浦」（以上見〈九章·涉江〉）、「夏首」、「陵陽」（以上見〈九章·哀郢〉）是否確為地名，以及具體勾連出什麼樣的行吟路線容或也有爭議，¹²但視兩文為放逐途中的紀行之作，學界仍有一定的共識。重點在於，一方面，屈原於旅途中不斷的「顧望」與「觀覽」：「乘鄂渚而反顧兮」（〈九章·涉江〉）、「顧龍門而不見」、「曼余目以流觀兮」（以上兩句引自〈九章·哀郢〉），視線標的無不投向遙遠的「郢都」，而視線落點表現

¹¹ 吳旻旻：《香草美人傳統研究——從創作手法到閱讀模式的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7月），頁27。

¹² 《屈原集校注》指出，關於屈原的行跡，也許還有討論的空間，不過目前為止，蔣驥、游國恩等人的推論是較為合理的，如蔣驥云：「〈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而至陵陽，皆自西徂東；〈涉江〉從鄂渚入溇浦，乃自東北往西南，當在既放陵陽之後。」相關討論請見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著：《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8月），頁429-432、465-466。

的是整個身心的向背，因此屈賦中多有靈魂歸郢的描述，如「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九章·哀郢〉)、「惟郢路之遙遠兮，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另一方面，屈賦又使用了許多相對於中心的四方方位詞，如「方仲春而東遷」、「過夏首而西浮」、「背夏浦而西思」、「渺南渡之焉如」(以上皆引自〈九章·哀郢〉)、「望北山而流涕」、「狂顧南行聊以娛心」(以上皆引自〈九章·抽思〉)，如果參照王逸(生卒年不詳，東漢時人)所說，〈九章〉乃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思罔極」¹³之作，那麼楚國首都郢城相對於屈原的放逐之地，就形成了中央以及四方的關係。換言之，這些方位所拉引出來的間距，就是一種權力的象徵。中央放逐士臣於四方，四方受到中央的宰制；然而同時，士臣也為四方標誌上道德的堅持，因此相對於四方的中央，則是反向的墮落了。因此鄭毓瑜先生就認為，屈賦中的空間其實是一種「意在言外的『空間隱喻』」：

原本屬於自然地理的名物概念，這時已經成為某種策略性的知識傳述，而涉及了人我往來、今昔對應、虛實相生等等的生活問題與生命意義的反思，進而在論述文字中成為意在言外的「空間隱喻」；這些表面上看起來只是指涉方位、區域、疆界的語詞，卻透過其間的規畫、分割、配置，而暗藏著複雜交錯的人文關係網絡。於是，屈原或者「今逍遙而來東」、「背夏浦而西思」(〈九章·哀郢〉)；或者「望北山而流涕」、「狂顧南行聊以娛心」(〈九章·抽思〉)，這些東南西北的四方畫分所以引人流涕哀思，狂亂愁悶，正因為象徵著家國的政治體制之範圍及自我的參與度(楚國與四荒)，以及建構各種價值觀(正與邪、善與惡)的內在意識型態領域。¹⁴

與四方同樣是相對於中央的還有東西南北上下的方位劃分，在〈招魂〉中就呈現了這兩種不同體系的交錯。由於〈招魂〉的詮釋頗為紛雜，在討論前，有必要先交代本章對於〈招魂〉的理解為何。〈招魂〉應為屈原自招之作，¹⁵結構可概

¹³ 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注 8)，頁 202。

¹⁴ 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 9)，頁 84。

¹⁵ 關於〈招魂〉的作者、招者、被招者，眾說紛紜，詳細的比較、辨析請見熊任望：〈論〈招魂〉為屈原自招〉、〈再論〈招魂〉為屈原自招〉、〈三論〈招魂〉為屈原自招〉以及〈運用篩選法為〈招魂〉決疑〉，上述文章皆收入氏著：《楚辭綜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年 7 月)，頁 187-251。本文採用熊先生的觀點，認為〈招魂〉乃屈原自招之作。游國恩與施淑女先生亦持此說，請分別參見《楚辭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 2 月)、《九歌天問二招的成立背景與楚辭文學精神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9 年，不著月份)。

分爲三部份：首先是序辭，交代招魂緣由；接著是招辭，前半部爲「威脅」：勸阻靈魂莫往東西南北上下，後半部爲「利誘」：鋪敘楚國的宮廷居處之美、飲食服御之奢，以及樂舞遊藝之盛等等；¹⁶最後則是亂辭，點出本篇爲春季「南征」之作，然後墜入君國舊事的回憶之中，末了回到現實，以「哀江南」結篇。

〈招魂〉中的「江南」應以亂辭的「哀江南」一語爲探索焦點，並可依序從兩種角度詮解：一是前文所談紀行之作中中央與四方的意識空間，另一則是招辭裡的中央與四方上下。先從前者談起，亂辭云：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蓁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驅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首句「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即以「南」表示此爲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旅程，不過，若繼續往下細讀：「蓁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以及「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臯蘭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會發現此處屈原點綴了紀行之作中沒有出現的香草，以及一些屈賦中經常出現的意象。這些具有「江南」特色的風物地貌，例如「蓁蘋」、「白芷」、「臯蘭」、「楓樹」、「長薄」¹⁷、「沼畦瀛」¹⁸、「薄」¹⁹，表面上形成了「草木蓁榮，春水滿澤」²⁰的圖景，然而，像「蘋」、「芷」、「蘭」，相應於「登白蘋兮騁望」（〈湘君〉）、「雜杜衡與芳芷」（〈離騷〉）、「紉秋蘭以爲佩」（〈離騷〉），皆爲《楚辭》中帶有好修、善質涵意的香草；而折衝於過去

¹⁶ 此處分類採用雄任望的說法，請見氏著：〈再論〈招魂〉爲屈原自招〉（收入氏著：《楚辭綜論》，同前注，頁198-215），頁210-211。

¹⁷ 「廬江」一詞，一般作地名解，雖然林庚先生獨排眾議，認爲是「蘆江」之義，但猶有爭議，因此本文暫不將該辭作「風物」解。林氏之說請見氏著：〈招魂解〉（收入氏著：《楚辭研究》，臺北：華聯出版社，1968年7月，頁125-145），頁142。

¹⁸ 王逸注云：「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池澤中曰瀛。」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注8），頁351。王夫之云：「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畦，界也。」見氏著：《楚辭通釋》（同注5），頁149。兩說略有不同，但皆指地形特色。

¹⁹ 王逸注：「博，平也。」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注8），頁351。王夫之云：「博，遠也。」見氏著：《楚辭通釋》（同注5），頁149。兩說雖有直言地勢或視線之別，但皆顯露了江南地勢平遠的特徵。

²⁰ 見清·王夫之：《楚辭通釋》（同注5），頁149。

與當下時間軸轉換之間的「斯路漸」，則是屈賦中經常用以表示自我堅持、追尋方向的意象，²¹因此，不論是「香草」或是「路」，都具有道德修持的意味，〈招魂〉亂辭中的旅程描繪，就可說帶有雙關意涵，不只是單純的寫景。於是〈招魂〉最末的結語：「目極千里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表示舉目是爲了眺望故鄉、追望從前，所「哀」所「傷」並非出於季節遞嬗的感蕩，而是逐放「江南」的政治悲懷；「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雖令人想及「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歌·湘夫人〉)那以風搖葉落、水波蕩漾所勾勒出的「江南」澤國風情，但更重要的是烘托了心底徘徊不去的逐臣悲慨。因此，《楚辭》中的名物雖皆爲「江南」所產，但仍必須放回屈賦以香草美人隱喻道德政治的脈絡，才能勾畫出《楚辭》中「江南」的「風景地貌」，因爲意象使用並不是自然素材的照單全收，而是涉及選取與挪用的意義轉換，彭毅先生就說：

屈原把一切外在世界都變成他的內在世界的映像，客觀的外在世界對他幾乎是不存在的。……這種濃摯的好善惡惡之情，成為他觀察外物的基礎。他直接掌握住的是物作為「善」或「惡」的表徵，而不是存在物的客體。雖然他不是無視於物的客體性，而就整個隱喻世界來看，是要顯示屈原內在自我的世界。香草之為善，臭木之為惡，正代表了他內心強固的道德意識。²²

因此，屈原所建構出來的意識空間，其實也就是善惡決絕二分的道德體系，這不僅體現在中央與四方相對的地理區位中，也表露於香草美人與惡禽臭物的名物運用。而當善惡是可以如此截然二分，那麼前引〈招魂〉亂辭記敘放逐路途所經的香草，既然比喻著不懈的自我修持，那麼身所離逸的政治中心：郢都，即是漸行漸遠、逐步敗墮的所在；「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曾與屈原畋獵於雲夢大澤、遇合無間的君王，也已成爲了過去。那時空相乘的距離，使得屈原即便不改如蘭芬芳的初衷、仍舊目極千里地瞭望遠方，通往郢都、指引著理想的路徑卻早已湮沒不見。從這個角度來詮釋〈橘頌〉中那棵「受命不遷」，

²¹ 關於屈賦中「路」的意象，請參考許又方：〈路曼曼其脩遠兮／論〈離騷〉中的時空焦慮〉(《東華人文學報》，第三期，2001年7月，頁381-416)第三節：「路(過去、現在與未來)」，頁389-394。

²² 引自彭毅先生：〈屈原作品中隱喻和象徵的探討〉(收入氏著：《楚辭詮微集》，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6月，頁1-42)，頁11。

生南國兮」的橘樹，屈原不止並非著墨於「佳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²³因南方氣候溫暖而植物茂盛的「客觀事實」，而且依照王逸所說：

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眾木，來服南土，使其風氣。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眾也。²⁴

那「以橘喻己」所傳達的，意欲一展長才的抱負和對楚國的強烈歸屬感，²⁵正表示了昔日屈原與楚國的「美善如一」。因此後來屈原遭受放逐，含蘊著道德修持的香草意象，才會帶給他如此複雜的感受：那標誌著過往的美好時光，卻也是如今遭受棄逐的緣由；既時時顧盼，無法與過去截然決裂，但因堅持著道德理想，也就只得離去。而爲了消解放逐之悲，除了以修持不懈、不改初衷的道德修持以自我肯定，屈原還上溯至父祖德光，希望以此對抗放逐。〈離騷〉云：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睠余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屈原不僅鄭重標舉自己爲高陽、伯庸的後代，以嘉名「正則」、「靈均」表示己所承襲的「內美」，並且還以扈紉香草的行動，隱喻兢業於道德修持。儘管這可能是一種「孤傲不群卻又落居邊緣的悲壯心境」，終歸也只是「看似無可如何的『反

²³ 雖然〈遠遊〉是否爲屈原所作爭議頗大，例如姜亮夫先生指出〈遠遊〉實爲屈作無疑，但彭毅先生則認爲〈遠遊〉絕非屈原所作，兩說分別見於《重訂屈原賦校註》「卷五·遠遊第五」（收入《姜亮夫全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頁457-494）、〈《楚辭·遠遊》溯源——中國古代文學裡遊先思想的形成〉（收入氏著：《楚辭詮微集》，同前注，頁271-324）。不過，從〈橘頌〉將南國與特殊植物相互連結的角度來看，以〈遠遊〉此處的發揮作爲補充說明，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²⁴ 引自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注8），頁254。

²⁵ 史料中多有「楚國認同」的記載，如《史記·楚世家》楚王熊渠云：「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楚武王也自稱「我蠻夷也」。分別見於《史記·楚世家》（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卷十，頁1692、1695。顏崑陽先生指出：「雖然，春秋中期以後，楚在文化上頗曾認同華夏，故《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國子囊云：『赫赫楚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但顯然仍以南方代表華夏而撫有蠻夷的政治集團自居，以對抗北方的另一政治集團。……楚國與周抗衡而形成的『小一統』局面，是屈原缺乏『游士』性格的原因之一。」相關討論請見氏著：〈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0月，頁209-253），頁216-217。

放逐』的努力」²⁶，但經由再三的自我肯定，貶謫彷彿就是屈原自己的選擇，「江南」就是他的自我流放之地了。

然而，考慮到亂辭往往提點全篇大意，〈招魂〉亂辭中的「江南」除了連結〈九章·哀郢〉、〈九章·涉江〉等紀行作裡中央與四方的權力空間，還應再從招辭中所體現的中央與東西南北上下切入，方才完整。當屈原所以架構神話世界，主要是因為「他個人的情志在現實中遭受到壓抑或挫折，無法得伸，所以才意圖遁入一個超現實的世界中。這一超現實世界，雖然是現實世界的投影，而作者為解除他在現實世界中所承受的悲痛，馳騁其想像，自然不會一一與現實世界相合，他只是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借用整個神話象徵出來」²⁷，那麼〈招魂〉中挪襲民俗儀式格套，以極端化了的中央和四方上下取代中央與四方，並由意象的差異替換頻頻向中顧盼的姿態：「江南」化為大量鋪排下，東南西北上下的蠻族、野獸、具威脅性的自然……等等令人畏懼的恐怖意象，楚國則是坐擁「川谷逕復，流澌澌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的美好山河，是讓人得以盡情休憩享樂的中央樂土，除了可由前輩學人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去探索〈招魂〉中這些獨特的意象、恐怖和美好的彼此對照，與古今中外的招魂儀式有何異同之外，²⁸比如胡萬川先生就指出，楚國與東西南北上下對舉的招辭套式，顯透的是一組組具有普世文化意義的對立結構，諸如：我族—他族、中央—邊緣、教化有禮—野蠻無禮、溫馨安全—兇頑危險，而中央即為樂土²⁹，更還表露出了屈原彼時哀慟之深。因為使用招魂格套進行書寫，固然不必意謂著實際施行了招魂儀式，但此種挪用就顯示創作時的身心處於極限狀態，需要獲得紓解，³⁰但弔詭的是，受限於招魂格套，紓解方式不是藉由道德自勵以對抗放逐，而是歸返楚國/中央享受歡樂，這就非但不能銷憂，反而使屈原愈發陷入了對於楚國的耿耿執念之中。換言之，當苦痛來源已是魂欲歸郢，意欲銷憂的招魂儀式卻又反而強化返楚企望，這使得亂

²⁶ 關於屈原的「反放逐」，請參考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 9），頁 79-81。此處引文見頁 80。

²⁷ 彭毅先生此段的解說，主要是針對〈離騷〉中幾組神話的闡述，本文挪用為〈招魂〉使用儀式套式的說解。彭先生的意見請見氏著：〈屈原作品中隱喻和象徵的探討〉（同注 22），頁 30。

²⁸ 請參考施淑女先生：《九歌天問二招的成立背景與楚辭文學精神的探討》（同注 15）第三章「招魂與大招」第一節「招魂的儀式與招魂辭」，頁 61-66；蕭兵：《楚辭的文化破譯——一個微宏觀互滲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1 月）第四部分「〈招魂〉：奧秘的闡發」，頁 1000-1175。

²⁹ 詳見胡萬川：〈楚辭〈招魂〉與「中國」樂土〉（收入氏著：《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 7 月），頁 109-129。

³⁰ 由於文獻不足徵，亦非此處重點，本文不去探討〈招魂〉中的「招魂」是否真的實有其事。例如從王逸「以手曰招，以言曰召」的解釋，他似乎認為「招魂」是實際施行的「儀式」。而本文所謂的「儀式」，乃是從招魂的書寫層面著眼，它也可視為一實際施行的「筆上儀式」。

辭最末「魂兮歸來」中的歸向呈現錯亂：究竟應返回招魂初衷，處於「江南」、「魂魄離散」的自身，還是如招辭所云回到郢都？〈招魂〉中這屈原亟欲解脫、卻又無法超越的矛盾困境，就讓四方上下／「江南」成為了一個令人無法立足的恐怖世界。「江南」之可「哀」正在於此。

不論是中央與四方、或者四方上下，屈原以權力關係中士臣的意識空間來書寫「江南」，皆有別於當時史籍對於「江南」的認識。《尚書·禹貢》是這樣描繪荊州一帶的：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筭、枏、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31

針對「九江孔殷」，孔疏曰：「孔，眾多，言治之難也」³²，「雲土夢作乂」，孔疏則說：「可為耕作畝畝之治」³³，可見《尚書·禹貢》對於「江南」江澤的著眼點在於是否有利民生；名物的羅列則為貢品物產的細密考察。根據鄭毓瑜先生的研究：《尚書·禹貢》、《周禮·地官》等反映了一套重在「識別名物」與「地理政治」，可稱之為「山川論述」的傳統地理論述。這種地理政治學結合了識別與掌控為一體，重視準確勘察自然品物，比如講究製圖精確的重要、古來圖籍必須重新考注，但就「在識別名物的同時，也蘊藏了對於土地經濟、人民行動的種種認定與掌控」³⁴。那麼《尚書·禹貢》中以詳細考究的江澤與物產所呈現的荊州，顯然就有別於屈賦以中央與四方或四方上下，所建構起來的「江南」世界。傳統地理論述中的「江南」是替中原帝國權力背書的一角版圖；賦中的「江南」則是楚國棄逐士臣之地，屈原雖流連哀思，不忍去國，卻也以道德修持的自我肯定，

³¹ 引自《十三經注疏·尚書·禹貢》（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4月）卷六，頁83-85。

³² 引自《十三經注疏·尚書·禹貢》（同前注）卷六，頁83。

³³ 引自《十三經注疏·尚書·禹貢》（同注31）卷六，頁84。

³⁴ 「山川論述」、「山水論述」的討論，請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先生此文原以英文稿 Bodily Movement and Geographic Categories: Xie Lingyun's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nd the Jin-Song Discourse on Mountains and Rivers 登載於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vol. 23, 1-4, 2007, pp.193-219。此增補部分內容之中文稿已通過審核，將刊登於《淡江中文學報》，本文所引述之內容出自原始稿本，將待學報出刊後再加列出版項及調整頁碼），頁3-9。引句文字見頁5。

將「江南」型塑為有道之臣的必然去處。

第三節 漢代「擬騷」中的「江南」論述

一、權力中心對於逃離體制的警告——〈招隱士〉的「江南」論述

歷來對於〈招隱士〉的討論，都是以「隱逸文學之濫觴」的角度來談。³⁵然而，如果重新檢視王逸的討論與〈招隱士〉和屈賦的關係，會發現〈招隱士〉其實是漢代書寫「江南」的重要文本。

王逸這樣談論他對〈招隱士〉的理解：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³⁶

其中，王逸對於〈招隱士〉的寫作動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以章其志」；時代背景：淮南王劉安(179-122B.C.)「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以及對屈原的理解：文似若仙，與隱士無異，頗值得進一步討論。

對於〈招隱士〉是否即是「閔傷屈原」之作，也許不無疑義，譬如王夫之就認為此篇「義盡於招隱，為淮南召致山谷潛伏之士，絕無閔屈子而章之之意」，³⁷不過〈招隱士〉確實與屈賦關係密切，摹襲的痕跡歷歷可辨。例如：「桂樹叢生兮山之幽」一句可回溯到〈遠遊〉的「佳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對於植物叢生的描寫，亦可連繫到南方地暖植物繁茂之立意。篇中鋪寫二次的「攀援桂枝聊淹留」，除可連結到〈大司命〉的「結桂枝兮延佇」外，也與〈遠遊〉有關。

³⁵ 例如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的自然觀——以魏晉南北朝文學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章第四節「魏晉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招隱”詩」，以及劉翔飛：〈論「招隱詩」〉（《中外文學》第7卷第12期，1979年5月，頁98-115）。

³⁶ 引自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注8），頁381。

³⁷ 引自清·王夫之：《楚辭通釋》（同注5），頁165。

「春草生兮萋萋」之「春」可能與〈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相連。篇題以「招」爲「招還」之意，取自〈招魂〉，篇末「王孫兮歸來」改寫自「魂兮歸來」。對隱士寄身之境「蠻荒幽森的極力鋪寫」，³⁸令人聯想到〈九章·涉江〉中幽暗迷亂的景象以及〈招魂〉；而此鋪寫，與雖未明言但所隱含的歸來「安樂」，所形成之對比，和〈招魂〉裡中央與東西南北上下的對照一致。由此看來，〈招隱士〉的景緻鋪陳極力追步屈賦中僻遠蠻荒的風格塑造，即使未曾明白指出描寫之地，但「江南」實已「呼之欲出」了。

不過，〈招隱士〉也並非一味邯鄲學步。屈原紀行之作中的「江南」呈現淒涼哀怨的心靈風景，〈招魂〉招辭的「幽森恐怖」主要是蟲獸蠻族、極端氣候的象徵名物鋪排，而不涉及人身置於山野自然環境中的感受。〈招隱士〉則不僅將「幽森恐怖」反映在物類鋪排的擴大，與形態動作的細繪上，比如植物：「桂樹叢生」「枝相繚」、「叢薄深林」、「樹輪相糾兮林木茂飢、青莎雜樹兮蘋草羶靡」；動物：「猿狖羣嘯兮虎豹嘯，蟋蟀鳴兮啾啾」、「白鹿麀麀兮或騰或倚，狀兒崢嶸兮峨峨，淒淒兮漉漉，獼猴兮熊羆」、「虎豹鬬兮熊羆咆」；山水雲霧：「山氣龍嵒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垓兮軋，山曲兮」、「嶽岑嵒嵒兮礧礧嵒嵒」，而且還將屈賦紀行作中的放逐悲感，如鬱結愁苦(〈九章·哀郢〉：「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九章·涉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悵然荒忽(〈九章·涉江〉：「懷信侘傺」、〈九章·哀郢〉：「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³⁹)，轉變爲當人被山林包圍時，因懼怕而產生的情緒，如：「心淹留兮恫恍惚，罔兮沕，懍兮栗」、「人上慄」。由此可見，〈招隱士〉中的「江南」其實是挪寫了屈賦中「江南」再予以創新。

進一步言之，參照王逸在「慕類以悲」下的注解：「哀己不遇也。從此以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有道德、養情性，欲使屈原還歸郢也」，「欲使屈原還歸郢也」並不必然就是寫作初衷，但〈招隱士〉中威嚇的口吻，確實透露了掌權者對於隱士「回歸權力中心」的聲聲呼喚。換句話說，居於政治權力中心的發話者，將原本屈原筆下吐露士臣哀思的「江南」，改換爲權力中心的口吻下，不遵從規定就會陷入的蠻荒之地，那是一種中央對於逃離體制的警告，宣示了隱士若執意不肯從山林歸返，下場就會像屈原那樣，只能在荒

³⁸ 見劉翔飛：〈論「招隱詩」〉(同注 34)，頁 99

³⁹ 「荒忽」既寫出了景象的「遙遠無邊」，見李山選譯：《楚辭選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1 月)，頁 92；也可意指「愁思」之狀，如王逸云：「言己始發郢，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時。」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注 8)，頁 222，因此可說是同時指涉情景的語彙。

地僻處中與野獸爲伍。

我們不妨再參照司馬相如(179-117B.C.)〈天子游獵賦〉中的「江南」。⁴⁰前一節已提到傳統地理論述是一種政治地理，而到了漢代此種地理論述仍延續不絕，一方面，比如《漢書·地理志》中寫到荆州的部分，⁴¹仍是完全延襲自《尚書·禹貢》的描述。《史記·河渠書》則如此提及楚地：「自是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和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⁴²，展現的也依然是「甚哉，水之爲利害也」⁴³，識別與掌控爲一體的理地治國觀點。另一方面，鄭毓瑜先生指出，這種政治地理就落實到以名物繫聯爲文體核心的漢代大賦。因此鄭先生如此詮釋〈天子遊獵賦〉：

當司馬相如透過子虛、烏有先生以及亡是公三人對於齊、楚藩國與帝王苑囿進行描述，不但順勢批評了齊、楚的誇炫土地、越界行獵，乃是忽失君臣之間上下有別、施受有分(天下本爲君王所有)的禮義；更直接以類似知識百科的手法，類聚了上林苑中的山川、草木、禽魚、宮觀、遊獵種種，巧妙展示出坐擁天下萬物的帝王威望。⁴⁴

於是，賦中子虛先生盛稱楚王畋獵之樂，努力從其山、其土、其石開端，續以東南西北上下的鋪排描繪，展示楚「七澤」中之「小小者」：雲夢，也不敵〈天子游獵賦〉的宣告：以「雲夢」所象徵的「南方」，或者說由齊楚爲代表的所有諸侯國，其實都是大漢版圖中即便位居邊緣，但卻絕對「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爲上林苑是「左蒼梧」、「右西極」，「於上林之東假山以象蒼梧」、「亦指其西假渠以象汎水」，⁴⁵在虛實之間以「縮影形式復現了幅員遼闊的帝國」。⁴⁶那麼，〈招隱

⁴⁰ 本文採取沈伯俊以〈天子游獵賦〉統稱於〈子虛賦〉、〈上林賦〉的看法，詳見氏著：〈司馬相如的代表作是天子游獵賦〉(收入馬積高、萬光治主編：《賦學研究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8月)，頁81-90。

⁴¹ 見《漢書·地理志》(臺北：史學出版社，1974年5月)，頁1529。

⁴² 引自《史記·河渠書》(同注25)，頁1407。

⁴³ 引自《史記·河渠書》(同注25)，頁1414。

⁴⁴ 引自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34)，頁6。

⁴⁵ 引自金國永：《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頁33。

⁴⁶ 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這些賦中(如宮殿、遊獵)，還經常把小世界的大小、高低與大世界的大小、高低混淆不清。乍一看來，上林苑幾乎有整個中國那麼大。……即帝王在苑囿中，

士〉也可以說是企圖將屈賦的「江南」書寫，轉換至傳統地理論述的權力體現，雖然表面和〈天子遊獵賦〉有描述焦點：招徠隱士與資產宣稱的區別，但其實都是為了坐實中央的掌控權。

二、矢志之士的紙上慰藉

——〈惜誓〉、〈七諫〉、〈哀時命〉等漢代「擬騷」中的「江南」論述

在權力中心的另一端，漢代士人盛行的「擬騷」中，又是如何書寫「江南」、詮釋屈原的呢？劉向(77-6B.C.)〈九歎·遠逝〉中捨江入洲的一段這樣寫著：

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瀾。乘隆波而南渡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陵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閔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參嵯以翳日。悲故鄉之發忿兮，去余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渡湘兮，耳聊啾而懽慌。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紛。日杳杳以西頽兮，路長遠而窘迫。

高山巨石、雲雪水霧的邊荒景象，一方面「隘狹幽險」、「曼曼眇眇」，另一方面則是帶出自己「耳鳴懽慌」的感受，加之登丘望鄉的身姿，可說與屈賦的紀行之作如出一轍。相似的描繪還可以在〈九歎〉的其他篇章，以及他人的擬騷諸作中看到：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嶮岩兮，阜杳杳以蔽日。（〈九歎·思古〉）

遵壟莽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寔。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而寂寞。倚石

往往以縮影形式復現其幅員遼闊的帝國的身林川澤。」見氏著：〈神女之探尋〉（收入莫礪鋒編：《神女之探尋——英美學者論中國詩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2月），頁44-47。

巖而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嶺岵以長企兮，望南郢而窺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九歎·憂苦〉）

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九懷·蓄英〉）

不過，漢人擬騷當然並不只是浮現著屈原的身影，而是流露了屈原和漢人交會的心聲：

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以為室兮，下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者。（〈哀時命〉）

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七諫·哀命〉）

川谷兮淵淵，山島兮峩峩。叢林兮嶮嶮，株榛兮岳岳。霜雪兮漼漼，冰凍兮洛澤。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蹇跼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九思·憫上〉）

仲尼兮困厄，鄒衍兮幽囚。伊余兮念茲，奔遁兮隱居。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乎呼梟。惶悸兮失氣，踊躍兮距跳。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歎。菅蒯兮壅莽，藿葦兮仟眠。鹿蹊兮，獬貉羈食兮蟬蟬。鸛鷀兮軒軒，鶉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兮齊倫。（〈九思·悼亂〉）

這四則引文都將屈原刻畫為一個隱士，反映了漢人在時命壓迫下遠禍全身的情志，⁴⁷從景象描繪的承襲來看，它們並不是轉化自同一個素材：如果把所處環境

⁴⁷ 廖棟樑先生對於漢代擬騷中如何體現了「遠禍全身」的心態，有詳細的辨析，請見氏著：〈對話批評：論漢代「擬騷」作品在「楚辭學」上的意義〉（《輔仁國文學報》第十三集，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11月，頁67-95），頁81-82。

與篇中人物呈現敵對的狀態，歸為〈招隱士〉的基型；那麼，所寫之景主要展現的特色是「迷茫」而非「恐怖」，則可說是直接上承屈賦了；而且這些篇章的共通點就是將〈九章·涉江〉中「雲霏霏而承宇」之「宇」解為「屋宇」，而不釋為「天空」。⁴⁸關於這些擬騷究竟如何運用屈賦和〈招隱士〉的「江南」書寫：嚴忌(生卒年不詳，約西漢初中期人)〈哀時命〉點出「鑿山楹以為室」，挪用了霧露雲雨的物象來烘托心境，明顯是摹襲屈賦，不過也增添了「虹霓」、「朝霞」，以及屈原「垂釣谿谷」、「上求仙人」彷彿定居荒野的意象。東方朔(514-93B.C.)〈七諫·哀命〉描繪一個高峻山石中的隱者，但「玄舍」、「幽門」、「從蛟為徒」、「與龍休息」透露了改寫的訊息。王逸〈九思·憫上〉則可看到屈賦紀行之作、〈招魂〉，與〈招隱士〉中諸多元素的綜合：不僅有令人想及〈九章·涉江〉中「霰雪紛其無垠兮」、「幽獨處乎山中」的雪積冰凝、高山深谷，⁴⁹隱者只能「庇蔭」、「匍匐」於「枯樹」、「巖石」之間；也有「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一方面是屈賦紀行中的權力空間，另一方面也涵帶出〈招魂〉中的無所歸止；更還引括了〈招隱士〉的草木繁茂，隱含著逼人的恐怖。冬季與夏天的意象何能同時出現與邏輯上的矛盾無涉，重點在於承襲了「江南」書寫體系的重疊交織。這種意象的交融，還可以王逸〈九思·悼亂〉為例。文中以「奔遁兮隱居」明白點出隱士的意象，高山、猴猿、深谷、虺蛇、鳴鵠、呼梟的連類鋪排，既是紀行式屈賦的影響，上下左右的方位配置又令人想及〈招魂〉，而「惶悸失氣」又將前述的這些物象塗抹上〈招隱士〉的色彩，後文的「菅蒯兮壅莽，藿葦兮仟眠。鹿蹊兮，獬貉羈食兮蟬蟬。鸛鷦兮軒軒，鶉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兮齊倫」近似於〈招隱士〉的「青莎雜樹兮蘋草羈靡」，「猿狖羣嘯兮虎豹嘯，蟋蟀鳴兮啾啾，白鹿麇羣兮或騰或倚，狀兒嶮嶮兮峨峨，淒淒兮漣漣，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經由以上討論，可見漢人「擬騷」仍究是一種承襲了屈賦和〈招隱士〉意識中的權力空間，並且將〈招隱士〉中含有警告山林隱士之意、體現中心權力的「江南」意象，拉回到遷逐文士不遇心懷的書寫立場。⁵⁰

就在意象的襲用、融合與改寫之間，相似的符碼卻可能訴說著不同的故事。

⁴⁸ 李山：《楚辭選譯》云：「宇：天空；一說指屋檐。」(同注 39，頁 88-89)從〈涉江〉本文來看，兩種詮釋其實都是可行的，不過漢人擬騷比較喜歡採用「屋宇」的詮釋。

⁴⁹ 「川谷淵淵」，王逸注云：「深貌」；「山岳兮峩峩」，洪興祖補注曰：「峩，音額，山高大貌」。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同注 8)，頁 528。

⁵⁰ 關於漢代士人如何思索「不遇」的處境，除了前引顏崑陽先生：〈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同注 25)，亦可參考鄭毓瑜先生：〈獨立的忠誠——直諫論述與知識份子〉(收入氏著：《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同注 9，頁 145-229)。

就像屈原頻頻回首的「郢都」，在「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九歎·離世〉）、「攀天階兮下視，見鄢郢兮舊宇」（〈九思·憫上〉）的漢代地圖中，其實標示的是「長安」的位置；屈原以「楚國」為「中央」，漢人倒認為「中國」才是他們的中心點了：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留兮中州？……結榮萑兮逶迤，將去烝兮遠游。（〈九懷·危俊〉）

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圖方。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飈乎尚羊，乃至少原之楚兮，赤松王喬皆在旁。（〈惜誓〉）

覽往昔兮俊彥，亦詘辱兮係纍。……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玩琴書兮遊戲，迫中國兮迢陬，吾欲之兮九夷。（〈九思·悼亂〉）

駕玄螭兮北征，躡吾路兮葱嶺。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氣兮為旌。歷廣漠兮馳騖，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九懷·蓄英〉）

這四段引文明顯是模擬〈遠遊〉，不過「遠遊」的起始點為「桂樹冬榮」之「南州」，漢人則以「中州」、「中國」為中、為鄉，〈九懷·蓄英〉之「南榮」雖指極南仙界，但以「南榮」為辭，毋寧就將〈遠遊〉居中之「江南」移往南方邊陲了。

問題在於，除了反映時代的差異，這種座標的位移是否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央與「江南」或者說是中央與東西南北四方、東西南北上下，對於屈原和漢代擬騷而言，是否呈顯不同的意義？

王逸注《楚辭》漢人「擬騷」特別強調屈原的坎坷遭遇和悲劇性結局，「通過屈原的不幸命運來寄託其生不逢時、志不得申的悲慨與憤激」。⁵¹「擬騷」中雖不乏香草隱喻、引舉歷史人物以自我肯定的沿襲，⁵²但較常出現的還是以下兩種態度：一是上引〈七諫·哀命〉、〈九思·憫上〉、〈九思·悼亂〉等作中所透露

⁵¹ 見廖棟樑：〈接受美學與《楚辭》學史研究——以屈原形象的歷史建構為例〉（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中國文學史暨文學批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1996年12月，頁67-86），頁77。

⁵² 例如〈九歎·惜賢〉：「驅子僑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由夷之純美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泣血。吳申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圓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

的遠禍全身。另一則是在經過思索後，仍然重回悲嘆的基調，例如〈哀時命〉反用子胥、屈原（「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原想要「幽隱以遠禍」、「隱伏而遠身」於亦是隱地亦若仙鄉的「江南」，後來卻又流露對功名的戀棧：「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矛盾的最後，依然不過是「邪氣襲余之形體兮，……恐不終乎永年」；而〈九歎·遠逝〉，亦刻畫了江南荒野上「長吟永歎涕究究兮，頽流下隕身日遠兮」，始終流連哀思的漢人身影。這兩者所建構的「江南」，一方面都不是現實生活中身經形處之地，而是擬作者在搖筆摹想間，所型塑的一個得以「慰藉身心」的「地方」；另一方面，漢人普遍失落了屈原標舉道德堅持以形成的「自我放逐」，以致漢代擬騷中的「江南」，反映的是漢人面對帝國中央無所不在的掌控，無法對抗、只能逃遁或者哀泣的處境。

前一節末尾，提及漢大賦體現了傳統地理論述所彰顯的政治權力，由此可見，漢大賦和漢人「擬騷」都反映了漢代大一統帝國無限擴張的權力。不同的是，漢大賦中如同資產清單、細述各項名物的「江南」，是爲了替位居中原的權力中心背書的收編之地；漢代〈惜誓〉、〈七諫〉、〈哀時命〉等「擬騷」中的「江南」，則延襲了屈賦中央與東西南北四方、東西南北上下的權力空間中，以四方、東西南北上下的士臣角度，所體現的矢志文士不遇感慨。其實，在《史記》以降的史籍中，已然出現了以《楚辭》所建構的空間觀來書寫「江南」的方式，例如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就以同情共感的矢志心懷來看待長沙：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⁵³

如此也未嘗不可說，以屈原爲源頭的「江南」書寫，提供了一種有別於傳統地理論述看待空間的視角。並且就在歷代不絕的楚騷繼作中，綿延出一軸展舒不盡的「江南」圖卷。

⁵³ 引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同注 25），頁 2503。

第四節 結語

本章探討《楚辭》中的「江南」論述，分爲屈賦和漢代擬騷中的「江南」論述兩大部分。不同於《尚書·禹貢》等傳統地理論述，講究精確考察，以成就中原政治權力掌控下的「江南」，屈賦中的「江南」爲一權力關係下士臣的意識空間，可從中央與東西南北四方、中央與東西南北上下兩種網絡體系來談。前者主要指由〈九章·哀郢〉、〈九章·涉江〉等紀行之作中所體現的「四方」：一方面，四方是中央棄逐士臣之所，爲相對於權力中心的政治邊陲；另一方面，四方卻象徵著道德美善的堅持來對抗放逐，反過來將中央定義爲墮落之地。因此，「江南」在中央與四方的脈絡中，既有〈九章·哀郢〉、〈九章·涉江〉等作裡，天地茫茫、晦暗多雨、舟船車馬容與不進等，遷客逐臣的心象描繪，同時此即不肯妥協的表徵；也有〈招魂〉亂辭中隱喻著道德修持的繁茂香花，不但勾引出過去與君國遇合的榮光，以致屈原徘徊留戀，不忍去國，卻也凸顯出己之高持與國之墮敗，使得「江南」也可說是屈原自我流放之所。然而，〈招魂〉亂辭中的「江南」，還應再從套用了民俗儀式格套的招辭所體現的中央與四方上下切入，方才完整。不同於中央與四方、時時面向中心的身姿，那強烈對比的意象：閑靜美好、享受無虞相對於滿佈蠻族野獸、遍具威脅的自然氣候，表示招魂乃是爲了安頓處於極限狀態下希冀獲得舒緩的個體，但當苦痛來源已是魂欲歸郢，意欲銷憂的招魂儀式卻又強化返楚企望，這亟欲解脫、卻又無法超越的矛盾困境，使得〈招魂〉中的「江南」成爲恐怖至極、令屈原無以立足的邊緣空間。此爲「江南」可「哀」的另一周折。

漢代「擬騷」中的「江南」論述，可分爲〈招隱士〉及其他「擬騷」之作。〈招隱士〉雖未點出「江南」二字，但從篇題、意象的摹襲上，可知與屈賦的關係密切。然而其「江南」書寫，卻與屈賦大異其趣。居於政治權力中心的發話者，將原本屈原筆下吐露士臣哀思的「江南」，改寫爲權力中心對於逃離體制的警告，表示隱士若執意不肯從山林歸返，下場就會像屈原那樣，只能在荒地僻處中與野獸爲伍。因此〈招隱士〉也可以說是企圖將屈賦的「江南」書寫，轉換至傳統地理論述的權力體現，和〈天子遊獵賦〉一樣，「江南」的存在價值在於坐實中央的掌控權。

〈惜誓〉、〈七諫〉、〈哀時命〉等漢代擬騷中的「江南」書寫，則交錯使用著屈賦與〈招隱士〉的各種意象。和體現了傳統地理論述的漢大賦相較，兩者的「江

南」書寫，都反映了漢朝一統帝國權力無邊的背景。不同的是，漢大賦中細述各項名物，如同資產清單的「江南」，是替帝國權力中心背書的收編之地；漢代「擬騷」中的「江南」，雖延襲了屈賦中央與四方、四方上下的意識空間，但體現的是矢志之士無法對抗，只能逃遁或者哀泣的不遇感慨。



第二章 〈山居賦〉中的「江南」論述

第一節 前言

論及「江南」「真山實水」的書寫最早何時蔚為風潮，一般都會追溯至東晉時期山水文學的興起。比如王國瓊先生認為山水詩「比較多量的出現，還是在東晉時代。主要是因為晉室渡江之後玄風的熾烈，以及靈秀的江南山水的刺激」¹；程章燦先生則考察賦體，指出「東晉王朝建立後，北方世家大族紛紛南渡，僑寓江南。……歷史劇變必然引起文化現象包括文學創作活動的空間變換。東晉賦家的題材選擇給人以顯著的舞台轉換感。……文人的行止見聞，不出南方的風土人情、歷史地理」²，而且將東晉時有關「江南」的賦篇，分為山川、地域、林園、風物等不同門類，其中，有關「山川」的篇數遠勝於他類。³

在「江南」的諸多地域間，東晉時即被視為「山水詩搖籃」⁴的會稽，毋寧是最引人注目的了，然而一直到晉宋之交的謝靈運(385-433)，山水文學才正式邁向了一個里程碑。⁵這提示了我們：首先，東晉王朝建立(317)至靈運出生(385)已歷經將近 70 年，儘管文學發展的萌芽時期，涉及了個人才性、群體創作等等各種複雜的因素，但山水文學到謝靈運的成熟，那顯然經過一段醞釀的時間，尤可資證南方書寫並非文人移處地域的立即反映，人地之間應具有更為細膩周折的交涉。其次，若會稽是「江南」山水文學生發與茁壯之地，被視為山水文學大家的謝靈運，也「多是以會稽一帶山水為題材」⁶，那麼以謝靈運作為探索「江南」山水書寫的核心人物，可說具有承先啓後的代表性。

值得注意的是，習於「山川」或「山水」的連稱，常常會忽略了在謝靈運的賦篇中，與「水」相較，他顯然是更為關注「山」的。李雁先生就指出，謝靈運不僅作有多以山為描寫對象的山水遊覽賦，像是〈嶺表賦〉、〈羅浮山賦〉、〈山居

¹ 見王國瓊先生：《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96 年 7 月），頁 135。

² 見程章燦先生：《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135。

³ 請參考程章燦先生所整理的表格，見氏著：《魏晉南北朝賦史》（同注 2），頁 136-137。

⁴ 相關討論請參見陶文鵬、韋鳳娟主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年 4 月）第三章「東晉山水詩產生的社會歷史原因」第 1 節「魏晉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影響」第 3 點「會稽：山水詩的搖籃」，頁 71-74。

⁵ 比如林文月先生就說：「山水大自然是六朝詩的主要寫作題材之一，而山水詩的最優秀作家當推謝靈運。」見氏著：〈鮑照與謝靈運的山水詩〉（收入氏著：《山水與古典》，臺北：三民書局，1996 年 6 月，頁 99-130），頁 99。

⁶ 見陶文鵬、韋鳳娟主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同注 4），頁 72。

賦》，以及雖走水路、卻多觀山景的〈歸途賦〉，並且也有〈遊名山志〉以傳世。⁷這不禁讓人好奇，究竟「山」在謝靈運的筆下呈現了什麼樣的風貌？「山」對於謝靈運而言具有什麼意義？對於「山」的重視，又在「江南」山水文學的書寫中佔有什麼價值？

本章選取謝靈運的〈山居賦〉為研究焦點。一方面是由於〈山居賦〉凸顯了謝靈運對於「山」的重視，比如賦中自注就曾批評枚乘〈七發〉的「江都之野」為「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另一方面，〈山居賦〉不僅寫「山」，還將「山」與「居」相互聯結，這提醒了我們「居」可能就是探討「山」必須注意的重要面向。本章擬分為四小節：首先，討論西漢至東晉時期「大賦」中的「江南」，梳理出〈山居賦〉前賦作書寫「江南」的主要角度；其次，整理晉宋時期的史料，觀察當時的「東山」論述；然後，討論體現「祖德」的「山居」；最後，探索「身體行動」以至「居」能夠朗現出什麼樣的「山居」風景。希望能藉此討論，豁顯謝靈運的「山居」在「江南」書寫中的位置。

第二節 山川論述與江海描繪

——西漢至東晉間「大賦」中的「江南」論述

西漢至東晉間「大賦」中的「江南」，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書寫方式：一是司馬相如〈天子遊獵賦〉中的楚國、左思(250-305)〈三都賦〉中的吳都，兩者皆為大一統帝國收編的資產、權力空間中位居邊緣的版塊；⁸另一是枚乘(? -140B.C.)〈七發〉(觀濤部份)、楊泉(生卒年不詳，西晉時人)〈五湖賦〉、庾闡(286-339)〈海賦〉、〈涉江賦〉、孫綽(320-377)〈望海賦〉、〈遊天台山賦〉、曹毗(生卒年不詳，383 應仍在世)〈觀濤賦〉、〈涉江賦〉、顧愷之(341-402)〈觀濤賦〉等作，⁹雖然其中〈遊天台山賦〉涉及山嶽的描繪，但一來篇數極少，二來天台山荒莽崢嶸、

⁷ 參見李雁：〈論謝靈運和山水遊覽賦的關係——以〈山居賦〉為中心〉（《文史哲》，2000 年第 2 期，頁 40-43），頁 41。

⁸ 有關〈天子遊獵賦〉中，中央政權如何施行權力論述，請見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第理論述與家國想像〉（收入氏著：《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8 月，頁 75-143），頁 86-90。〈三都賦〉的討論，則請參考王文進先生：〈三分歸晉前後的文化宣言——從左思〈三都賦〉談南北文化之爭〉（《漢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5 年 12 月，頁 27-48）。

⁹ 以上諸賦中，有關「涉江」、「觀濤」、「望海」的篇章，乃參考李雁：〈論謝靈運和山水遊覽賦的關係——以〈山居賦〉為中心〉（同注 7）中的整理，請見頁 42。

幽迴無人的神秀之境，是披圖興想的幻設之詞，「江南」書寫的筆墨重點顯然還是落在江海之上。不過〈七發〉的錢塘大潮，重在「卬然足以駭矣」、「使人踣焉，洄閭淒愴焉」，「在即將失去或跨出界限的霎那間，一種就在悲哀或驚恐裡所體現的個體意識」¹⁰；而「涉江」、「觀濤」、「望海」諸賦，同樣「想像多於親身的體驗，誇飾大過客觀的寫實」¹¹，刻畫重心都不是親身實歷中的江海與體驗。

鄭毓瑜先生透過考索魏晉史籍中「山川」、「山水」詞彙的運用，指出當時存有兩種不同看待地理空間的方式：一是晉代以後，尤其是東晉以降，轉向「窮究歷覽」與「山澤經營」的「山水論述」，這部份我們將於下一節討論；另一則是可往前追溯至《尚書·禹貢》、《周禮·地官》、《禮記》等，重在「識別名物」與「地理政治」的「山川論述」：這種地理政治學結合了識別與掌控為一體，重視準確勘察自然品物，比如講究製圖精確的重要、古來圖籍必須重新考注，但就「在識別名物的同時，也蘊藏了對於土地經濟、人民行動的種種認定與掌控」。¹²因此以「名物聯繫」為寫作核心的大賦體式，不論是強調考校地圖、方志或舊俗的實證論述，像是左思〈三都賦·序〉就宣稱：

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¹³

或者是「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製」¹⁴的賦作，例如〈天子遊獵賦〉中的上林苑可以「左蒼梧」、「右西極」，「於上林之東假山以象蒼梧」、「亦指其西假渠以

¹⁰ 此句引文本為鄭毓瑜先生對於〈高唐賦〉中人身體驗的闡述，見〈從病體到個體——「體氣」與早期抒情說〉（收入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9月，頁417-459），頁440，但由於文前亦談及〈七發〉觀濤等娛樂活動，其實也造成「極限內的擺盪」之效應（頁429），所以本文以此句概括〈七發〉中「江南」描繪的特色與重點。

¹¹ 見李雁：〈論謝靈運和山水遊覽賦的關係——以〈山居賦〉為中心〉（同注7），頁42。

¹² 「山川論述」、「山水論述」的討論，請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先生此文原以英文稿 Bodily Movement and Geographic Categories: Xie Lingyun's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nd the Jin-Song Discourse on Mountains and Rivers 登載於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vol. 23, 1-4, 2007, pp.193-219。此增補部分內容之中文稿已通過審核，將刊登於《淡江中文學報》，本文所引述之內容出自原始稿本，將待學報出刊後再加列出版項及調整頁碼），頁3-9。引句文字見頁5。

¹³ 引自唐·李善注：《昭明文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11月），卷4，頁82。

¹⁴ 引自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同前注），卷45，頁1002-1003。

象汎水」¹⁵，一個苑囿就有整個中國那麼大，而且「所有的景物名號都是有出處、可翻查，從經史子集到神話字書，全篇完備、詳盡且正確得有如知識百科」¹⁶，其實都是運用了「極端知識性、實證性的大賦論述模式，有效地保證了無可質疑的、甚至獲得尊崇的權力地位」¹⁷。因此，「掌握愈豐富的山川名物知識，就愈能掌握住權力；君王權力的合法性因此不必然訴諸道德規範或法令制度，而是直接存在一套名物說解系統中」¹⁸。

在這樣的脈絡中，沿用了大賦體式的陸雲(262-303)〈答車茂安書〉、郭璞(276-324)〈江賦〉就饒有探究的價值。〈答車茂安書〉為陸雲回覆車永的書信，主要是車永來信，說外甥石季甫即將調往南方出任鄧令，舉家聽聞之後，「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晝夜號泣，不可忍視」，而且又聽說鄧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蟲害人」，因此希望南人陸雲能「具示土地之宜」。¹⁹有趣的是，〈答車茂安書〉雖為書信，但行文鋪寫卻使用了大賦體式，將到了劉宋時，依然是吸引北方大族前往開墾其空荒之地的鄧縣：一個「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耕種技術低下，土地空曠，民風簡樸」的山縣，²⁰鋪寫為地理位置四方縱括，並且還富有各式海產佳餚之地，甚至，陸雲還隱用了賦篇中常與攝政擬喻的射獵活動：²¹

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竝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

鱸鮓赤尾，齒比目，不可紀名；鱣鰻鰓，炙鰓，烝石首，臠，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

¹⁵ 見金國永：《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頁33。

¹⁶ 見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8），頁88。

¹⁷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12），頁6。

¹⁸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12），頁6。

¹⁹ 以上引文請見晉·車永：〈與陸士龍書〉（收入清·嚴可均：《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頁3-4），「全晉文」卷109，頁3-4。

²⁰ 參見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頁95-113），頁110。

²¹ 見鄭毓瑜：〈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8），頁89-90。

季冬之月，□政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罽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置繞堙，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狩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

陸雲不僅細校豐碩海產，鋪陳「目所希見，耳所不聞」的異物，還將偏遠的鄮縣，推向了仿若位居四方中央的地理位置，這正是以此地理中心，將原本處於發話主體的帝國統治者，例如前述之於〈天子遊獵賦〉的大漢帝國、之於〈三都賦〉的西晉王朝，替換為具有「東吳士人」身分的自己。因此，陸雲此書，可說是對於北方一統政權意欲收編南方異地的抗拒，反映了當時東吳士人在西晉王朝中備受歧視與力主尊嚴的處境。²²而車永收到陸雲回覆後，語帶幽默的回書：「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笑也」，將陸雲書信與《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兩都〉互相比擬，暗指陸雲竟將鄮縣刻畫為坐擁天下萬品的京城，其實不過「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正是精準透析了陸雲筆下之意的揶揄。

不同於陸雲〈答車茂安書〉以鄮縣為力抗北方一統帝國的微聲吶喊，郭璞〈江賦〉則綰合了權力空間與江海描繪的兩條「江南」書寫路徑，一方面以長江為發揮焦點，另一方面將之前江海賦中著重的人身體驗，轉為承接〈天子遊獵賦〉以降大賦的名物書寫。郭璞這種對於「長江」政治意象的塑造，當然有其相應的時代背景，東晉倉皇南渡，「過江」不是移居國土他方，而是進入一個不同於中原的蠻荒國度，²³難怪彼時衛玠「初欲渡江」，會「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²⁴。因此李善注即引《晉中興書》所云：「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²⁵點出了〈江賦〉最為重要的寓意：以南方水鄉的「川瀆之美」，寄寓「王宅江外」的「中興」政治。²⁶

²² 有關西晉時期南北士人的相爭互蔑，前人已有許多整理、闡述，請見王文進先生：〈三分歸晉前後的文化宣言——從左思〈三都賦〉談南北文化之爭〉（同注 8）第五章「三分歸晉後的南北文化衝突」，頁 36-43，此處不煩列舉。

²³ 比如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9 月）第 29 則：「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見頁 91。

²⁴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同注 23）第 32 則，頁 94。

²⁵ 見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同注 13），頁 254。

²⁶ 有關〈江賦〉的闡述，可參考程章燦先生：〈地理發現與政治定義——論郭璞〈江賦〉〉（收入氏著：《賦學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9 月，頁 191-204）。

當郭璞企圖以「江水」，取代原先為北人量身打造的王權論述、以都邑畋獵為題材的「土地」象徵時，面對京都賦歷來不脫的三個面向：能否具備險要地勢、擁有富足國力、遵行皇統禮法，²⁷亦即大賦政治書寫最重要的三個角度，〈江賦〉有其沿襲、轉化、困挫之處也是勢所必然。對應於以上三個角度：首先，郭璞說「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東至「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澎湃」，且「瀉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指出長江流域的縣長與廣袤。其次，郭璞從字書，如《爾雅》、《字書》、《字林》等，以及《山海經》、《尚書》、《異物志》、《臨海異物志》、《臨海水土物志》、《南州異物志》、《南越志》²⁸等異物方志，錄寫了大量名物，意在表示長遠廣闊的流域，蘊藏了繁富怪錯的水物羽族、金礦嘉蔬，東晉王朝物產豐隆，立國根基穩固。最後，「華夏文化」建構的發話權，在東晉以前主要操持於北方士人身上，即所謂「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陲為襟也」（〈魏都賦〉），「江南」是相對於中原的僻遠之地，從來不是大賦所建構的世界裡中心的所在，而郭璞一旦選取了長江作為「江南」的象徵，一來當然就只有湘娥、伯禹、荊飛、要離等人的神話傳說可資運用，無法從先朝世系的傳承來定位「江南」，二來也不能以合於禮制的畋獵，正統化帝國統治，²⁹因此只能藉由「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從長江水德在五行體系中的合法性與優越處，提供建都於長江之側建康城的東晉王朝同樣的合法基礎，並強調「巖崗潭淵，限蠻隔夷」（〈魏都賦〉），³⁰指出長江「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既區隔了北胡南華，「江南」也就從文化邊陲的荒地僻處，一變轉身為華夏文明的核心所在了。

綜上所述，西漢至東晉大賦中的「江南」可從「山川論述」與「江海描繪」兩種面向來觀察。前者像是〈天子遊獵賦〉、〈三都賦〉中為帝國併納的荊楚與東吳，「江南」並不是舞台上的主角，而是經常為北方一統帝國所用，藉由細辨異物以建構自身政權的大賦所宰制的對象；後者則如〈七發〉、〈海賦〉、〈涉江賦〉、〈觀濤賦〉等江海諸作，著重的是極限下的個體意識、或者水勢的虛誇描繪。〈答車茂安書〉企圖扭轉「山川論述」中總是南北不平的權力位階，〈江賦〉則進一步以「江海題材」為象徵，希望能鞏固「江南」在識別名物的論述中，處於權力

²⁷ 見鄭毓瑜先生：〈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收入李豐楙編：《地域、空間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199-236），頁202。

²⁸ 可參考李善注〈江賦〉中所引用的各種異物方志，見《昭明文選》（同注13），頁254-264。

²⁹ 關於遊獵活動與統治行為的相互擬喻，請參見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8），頁90。

³⁰ 見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同注13），頁116。

中央的位置。總言之，這些大賦中的「江南」，都並未呈現出長久依存於「江南」的在地體驗。相對的，謝靈運自稱為「越客」³¹，也著有仿效陸機〈吳趨行〉以歌頌會稽風土的〈會吟行〉，這樣的身分認同與土地經驗，是否會讓謝靈運筆下的「江南」，呈現出不同於前人的風景？例如〈山居賦〉以「山居」為賦名，不論是強調「山」而不是「水」，或是雖使用賦體，但也提出遊走於私我與皇權兩種向度的「居」，³²似乎都豁顯出了不同於以往的關注焦點。為何會有這種視角的轉移？是否具有特殊的時代背景？而新變的「山居」議題仍結合著大賦體式，這又呈顯出了什麼意義？以下將先考察史料，探討晉宋時人如何看待「山」，尤其是「東山」。然後再於下一節，正式進入〈山居賦〉的討論。

第三節 山野園宅與經營開發——晉宋時期的「東山」論述

所謂「東山」其實並非特定的山岳名號，而是指稱建康以東，通常座落於會稽一帶的山丘群，有時也呼作「東土」，或者以「東」這個方位詞直接省稱，為晉宋時期隱士群聚之處，包括了孫統(生卒年不詳，346 應仍在世)、謝安(320-385)、孫綽、王羲之(303-379)、王子猷(?-386)、王子敬(344-386)、支遁(314-366)、許詢(330?-361)、許邁(生卒年不詳，355 年應仍在世)、阮裕(生卒年不詳，326 仍在世)、劉惔(313?-348)、李充(?-362?)、戴逵(335?-395)、戴勃(?-405)、戴顓(378-441)、謝敷(生卒年不詳，主要應活動於四世紀後期)、帛道猷(生卒年不詳，388 應仍在世)、于法開(生卒年不詳，東晉時人)等人，都曾隱於「東山」。³³史載「會稽有佳

³¹ 〈道路憶山中〉：「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³² 參見孫雅芳：《安居的沉吟：魏晉『閒(閑)居』賦作析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³³ 《紹興府志》曰：「大抵晉宋人稱會稽剡中類曰東山，然非定名，惟始寧東山以太傅著，後乃直謂之東山。」見明·蕭良幹等修，張元忭等纂：《紹興府志》(明萬曆 15 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頁 453。有關史書中「東山」、「東土」、「東」的記載，略舉如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棲逸篇》(同注 23，以下略云)第 6 則：「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頁 654。《世說新語箋疏·棲逸》第 12 則：「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頁 660。支遁上書曰：「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漱流清壑，縈縷畢世，絕窺皇階」，見梁·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0 月)，頁 162。于法開「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經，……講竟，辭還東山」，見梁·釋慧皎：《高僧傳》(同前)，頁 168。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見《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11 月)，頁 2072；另，「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見《晉書》(同前)，頁 2073。值得一提的是，謝玄「考卜東山」(〈述祖德·之一〉)之「東山」在今浙江上虞縣西南曹娥江畔，但顧紹柏認為「此東山是否真為謝安所居，至今仍是懸案。在靈運詩文中找

山水，名士多居之」³⁴，謝靈運也說「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與廬陵王義真箋〉），可見討論「東山」除了山水之美，名士隱逸與自然環境的交相互動尤其值得注意，因此以下將從兩個面向來進行討論，分別是封山佔水的土地欲望與流連山水的審美情懷，以及居處經營的隱逸品味間彼此的關係。

前一節提及鄭毓瑜先生指出，魏晉時期存有兩種不同看待地理空間的方式：一是重在「識別名物」與「地理政治」的「山川論述」，前一節已有所論；另一則是此處我們所要探討的，晉代以後，尤其是東晉以降，轉向「窮究歷覽」與「山澤經營」的「山水論述」。《晉書》傳記中「山水」一詞的使用次數大量增加，雖然其相關用法中，偏重遊賞山水的記載可說是最為常見的，但若仔細探究，會發現流連山水其實還與士族「封山佔水」的地產經營相關聯。以下先談謝靈運，再上溯至孫統和王謝家族。

雖然謝靈運最為人注意的記載，往往是關於他如何愛好山水、肆意遊娛，例如出為永嘉太守時，「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或是返回始寧後，「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³⁵，但下列史料應該也要比合而觀：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童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³⁶

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絕以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岵嶂湖為田，顗又固執。³⁷

「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的名士遊晏，應置於「鑿山浚湖，功役無已」至「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的脈絡中解讀，³⁸而後一則資料顯示，謝靈運在遊

不到謝安隱居此座東山的線索」，見氏著：《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4月），頁66。「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見《世說新語箋疏·輕詆篇》第30則，頁848。

³⁴ 《晉書·王羲之傳》（同注33），頁2098-2099。

³⁵ 見《宋書·謝靈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頁1754。

³⁶ 見《宋書·謝靈運傳》（同前注），頁1775。

³⁷ 見《宋書·謝靈運傳》（同注35），頁1776。

³⁸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

山玩水時也不放過尚未開墾的山野湖泊。³⁹如果再參考以下有關孫統、以及王謝家族的記載，遊覽山水如何與地利資產相結合會更為清楚：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⁴⁰

根據鄭毓瑜先生的研究，孫統此處所謂的「靡不窮究」，其實不同於阮籍「登臨山水，經日忘歸」⁴¹、或者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⁴²，重點並非山水本身的登臨感懷，參照鄞與餘姚即便是到了劉宋時代，都仍然是朝廷建議徙民以開墾的荒僻之地，⁴³孫統的「窮究」山水可能並非只是劉尹所說的「賞翫」，而是具有周遊歷覽、探勘驗證的意味。⁴⁴而晉室東渡後，北方大族尋求土地重新建立他們的田園，由於考慮到距離遠近等因素，原本三吳會稽地區最為合適，但因當地已墾之田掌握在南方士族手中，北人只好往姑熟、吳興，或者是同屬會稽但較為空荒的濱海諸縣發展，⁴⁵因此以下關於王羲之看似只是採藥弋釣、遊賞山水的描述：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⁴⁶

論述〉(同注 12)，頁 8-9。

³⁹ 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第四節「東晉南朝的豪門地主」(臺北：帛書出版社，無著出版年月)，頁 65。

⁴⁰ 《晉書·阮籍傳》(同注 33)，頁 1543。

⁴¹ 《晉書·阮籍傳》(同注 33)，頁 1359。

⁴² 《晉書·羊祜傳》(同注 33)，頁 1020。

⁴³ 參見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同注 20)，頁 110。

⁴⁴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6。

⁴⁵ 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同注 20)，頁 107-110。

⁴⁶ 《晉書·王羲之傳》(同注 33)，頁 2098-2101。

就必須結合著有關行田、視地利的資料，兩者根本是一體兩面：⁴⁷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

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⁴⁸

而史傳中有關謝安山水之遊的記載：

(謝安)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距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量。⁴⁹

這後來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⁵⁰，「漁弋山水」、「言詠屬文」的隱士生活，也就是謝玄口中「以道養壽」的追求，⁵¹如果參考謝安出仕後在位於建康附近、摹擬「東山」的土山，⁵²營建了與山澤佔領有關的別墅，以致「樓館竹林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⁵³，那麼寓居會稽四處遊處的生活，可能就不是單純如史籍所記述的「無處世意」，忽略了地利資產經營的背景。

⁴⁷ 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同注 20)，頁 110。

⁴⁸ 《晉書·王羲之傳》(同注 33)，頁 2102。

⁴⁹ 《晉書·謝安傳》(同注 33)，頁 2072。

⁵⁰ 《晉書·謝安傳》(同注 33)，頁 2076。

⁵¹ 見《晉書·謝玄傳》(同注 33)，頁 2084。

⁵² 見宋·樂史等撰：《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 8 月)卷九十「上元縣」項下曰：「土山在縣南三十里，按《丹陽記》，晉太傅謝安舊隱會稽東山，因築此擬之，無岩石，故謂土山。有林木、臺觀、娛遊之所，安常請朝中賢士、子姪親屬會宴土山。」(頁 679)《丹陽記》為劉宋·山謙之所撰，此條亦收錄於劉緯毅輯：《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178。

⁵³ 《晉書·謝安傳》(同注 33)，頁 2075-2076。

前引謝安於建康營建模擬會稽「東山」的「土山」，此具有主從關係的「模擬」，正好表徵了晉宋時期會稽、或者說是「東山」的地域風情，以及會稽與建康之間周旋交錯的關係。也就是說，封山佔水的行動、流連山水的遊賞、居處經營和隱逸品味的講究，都銘刻為會稽「東山」的獨特意象。

「東山」築有許多體製龐大、流露士族風味的莊園。建康城雖有王導(276-339)、謝安、紀瞻(253-324)等人在烏衣巷的園宅，王導的冶城西園，郗鑒(269-339)、檀道濟(?-436)的青溪園林等等，但由於地稠人狹，土地有限，所以一般來說園宅的規模並不大，⁵⁴有別於士族於「東山」封山佔水、營宅建墅的莊園，比如史載孔靈符(?-465)：「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⁵⁵。而儘管亦有東晉孔瑜(268-342)「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為之」⁵⁶，或者是「嘗在東山，甚貧乏」的王脩齡(?-356)，其拘蹇甚至陶侃(259-334)還送米饋之，⁵⁷但普遍說來，物質條件豐裕、隱居美感享受是「東山」隱士重要的特色，這除了前引謝安、王羲之不同於「被髮陽狂」、「污身穢跡」的隱逸生活可以為證外，以下關於郗超(336-377)起宅如官舍、孫綽經營「東山」、許詢隱居幽穴的事例也可參考：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⁵⁸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⁵⁹

⁵⁴ 請參考劉淑芬：〈六朝建康的園宅〉（收入氏著：《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10月，頁111-134），尤其其中有六朝建康園宅的分佈整理表，見頁123-126。

⁵⁵ 見《宋書·孔靈符傳》（同注35），頁1533。

⁵⁶ 以上事例請見《晉書·孔瑜傳》（同注33），頁2052-2053。史載孔瑜不但上疏辭讓給予親信三十餘人，表明應「貶食節用」，也對「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加上曾「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以稼穡讀書為務」，因此其於山陰所營的數間草屋，可能與一般士族品味不同，見《晉書·孔瑜傳》（同注33），頁2051。

⁵⁷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篇》（同注23）第52則，頁327。

⁵⁸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棲逸篇》（同注23），頁662。

⁵⁹ 引自〈遂初賦·序〉，見清·嚴可均：《全上古秦漢三國南北朝文》（同注19），頁1807。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具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⁶⁰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芑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⁶¹

孫綽所居雖然只是簡約的「五畝之宅」，但若參考「剡山爲龕」的支遁，其實是遣使向竺法深「求買仰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棲之處」⁶²，剡山、蓄馬和好鶴這些名士風雅，⁶³與買山幽棲彼此關聯，那麼「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⁶⁴的孫綽，「游放山水」既透露著在審美之外結合著地產欲望的可能，「五畝之宅」或許也就並非簡陋居所，而是建基於土地資產，和「帶長阜，倚茂林」的環境要求相調諧，所精心營造的隱處居邸，因此這與上述「東山」莊園多有龐大地產其實並不牴觸。許詢亦是一例，他「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表示了幽然巢穴並不與物質生活的適意相悖，唐長孺先生就曾引《太平寰宇記》，指出「越州會稽縣有尚書塢，云是宋尚書孔稚珪之山園；又餘姚太平山云是謝敷引居之所；蕭山縣許玄度岩，云是許詢隱居之所。這些巖栖山宿的高士實際上很多即是佔領山澤的地主」⁶⁵。

鄭毓瑜先生說：「探尋山水之美與封佔山澤之利，很可能是出自同一種慾望，賞翫宴集、弋釣泛游是可以與經營山野園宅的舉動不相衝突的聯繫起來，山野園宅可以透過經營開發而具有栖逸的品味」。⁶⁶經由以上的討論，可知晉宋時人認為

⁶⁰ 見《晉書·孫綽傳》(同注 33)，頁 1544。

⁶¹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棲逸篇》(同注 23)第 13 則，頁 661。

⁶² 見梁·釋慧皎：《高僧傳》卷四(同注 33)，頁 157。唯「『仰』山」應作「『』山」，見《世說新語箋疏·排調篇》(同注 23)第 28 則，余嘉錫就「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引程炎震云：「印山當作『』山，見〈德行〉〈言語〉篇注。《高僧傳》亦作『』山。《音義》云：『吾浪切，山名，在越剡縣』」。頁 802。

⁶³ 分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同注 23)第 63 則：「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蓄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以及《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第 76 則：「支公好鶴，住剡東『』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⁶⁴ 見《晉書·孫綽傳》(同注 33)，頁 1544。

⁶⁵ 請參見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同注 20)，頁 103。唐先生所引述的資料，分別見於《太平寰宇記》(同注 52)卷 96「會稽縣」項下，頁 725；「餘姚縣」項下，頁 726；「蕭山縣」項下，頁 727。其中蕭山縣許玄度岩，注明爲徵引孔靈符《地志》，劉緯毅輯：《漢唐方志輯佚》(同注 52)收此條入劉宋·孔靈符：《會稽記》，見頁 186。

⁶⁶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9。

「東山」是得以探勘封佔的地利資產，也是能讓名士遊賞山水、舒展風流的場域；是物質條件豐裕、注重享受的隱處，也是必須精心打造、流露士族品味的經營之所。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謝靈運返回始寧，就不只是歸返故居，而是與先祖曾在「東山」流連經營的形象相互疊合了，這具有什麼樣的意義、與謝靈運如何看待自己的隱居又有何關聯？而謝靈運的「山居」究竟是如何透過經營開發，以流露不同凡俗的棲逸品味？經由「山居」又「生活」出了甚麼樣的「江南」風景？這些問題將分別於下面兩節加以探討。

第四節 山水流連與功成身退

——〈山居賦〉中體現「祖德」的「山居」

謝靈運〈山居賦〉中所謂的「山居」主要是從兩個方面建構起來的：一是相對於「仕宦」之「隱居」；二則是對隱居地點必須是「山」的細緻分辨。前者可從謝靈運自道隱居或是作賦緣由加以觀察，如：

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情性，敢率所樂，而以作賦。⁶⁷

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合宮非緡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卻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晏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慚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

謝靈運以上所選用的事典，是依照山居—市廛的分類呈現的，有地點的對比；鼎

⁶⁷ 本章所引〈山居賦〉皆本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同注 33），下不贅述。

湖、汾陽—黃屋、合宮、衢室，也有人物的對照：張良、范蠡—李斯、陸機。對於為何選擇隱居，謝靈運則指出了四個原因：身體因素：「抱疾」、「臥疾」、「年與疾而偕來」；不擅官場：「志乘拙而俱旋」；性情所好：「順從情性，敢率所樂」；以及追慕祖父謝玄遺風：「仰前哲之遺訓」。前兩者乍看之下似乎表示隱居乃不得不然的無奈，比如謝靈運自道出任永嘉太守時「臥病對空林」（〈登池上樓〉）、返回始寧故居後「養病亦園中」（〈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身體狀況不佳也許是如實寫照，但也可以參照《宋書》本傳說劉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謝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出守永嘉「既不得志」，「在郡一周，稱疾去職」，⁶⁸抱疾之說應該是官場周旋下的應酬說詞；而不擅於作官之「拙」，也可能是表示自己資質駑鈍。然而〈山居賦〉云：「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當「臥疾山頂」，反而引帶出「悠然而笑」的自適自在，「山居良有異乎市廛」的稱說，藉由了上述戀棧權位與隱退保身的眾多事典鋪排加以強調，包括「合宮」與「縉雲」、「衢室」與「放勳」、「鼎湖」、「汾陽」等等，因此讓所謂「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樓〉），不但只截取了進德不能，並不接續退耕不任的尷尬，而且呈現「工拙各所宜，終以返林巢」（〈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初去郡〉）的安然，使得「拙」與「疾」這「拙疾相倚薄」（〈過始寧墅〉）的隱處緣由，或許含有一絲自嘲，反映的卻毋寧是謝靈運對於仕途不順的淡化、隱居生活的肯定。再結合著順從天性所好與仿效謝玄退隱的後兩者，〈山居賦〉中的「山居」，已然就定位在一個本乎情性的自主選擇了。

不過，關於「順從情性」與「前哲遺訓」，依照〈山居賦〉所說：「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晏息，保自事以乘閑」，俯身審視是基於仰望前哲，「俯性情之所便」就不能只以天性自然來詮釋，主要所表明的仍是自己的性情所好與謝家隱居傳統的「遺訓」彼此相符。如此，我們不妨這樣提問：既然謝靈運所以刻意將「山居」型塑為己所追求的標的，應從謝家門風來理解，那麼始寧莊園與謝玄有何關聯？此關聯對於謝靈運來說，有何意義？在「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之前的一段，可以作為討論的起點，賦云：

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

⁶⁸ 以上引句出自《宋書·謝靈運傳》（同注 35），頁 1753-1754。

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遠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自注）

謝玄「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於太元十二年(387)，解職徐、兗二州刺史及都督七州軍權，任會稽內史，返回始寧經營莊園。在謝靈運的筆下，謝玄不但功業彪炳，而且不同於遭受放逐、仍心念家國的屈原，或是因國君猜夷、而逃奔趙國的樂毅，擁有洞燭機先的智慧，以及功成身退的風範。在〈撰征賦〉和〈述祖德〉中，也有類似的敘述：

殆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而風靡，蹙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帶。既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勳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撰征賦〉）

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述祖德·序〉）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原始。……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粉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述祖德·之二〉）

謝玄不但「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太元中，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功成之後，也能「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拂衣蕃岳，考卜東山」、「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粉梓」。由此看來，謝靈運「所希望或塑造的謝家其實跨越兩個不同領域：出世與入世，廟堂與江湖，都邑與莊園」⁶⁹。

⁶⁹ 引自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8），頁121。關於〈述祖德〉的討論，請參考鄧仕樑先生：〈論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

那麼，謝玄隱居的始寧莊園，就不僅是體現了「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自然之神麗，以申高棲之意」（〈山居賦〉自注）：既曠達於仕途，又講究周覽山水、經營園宅的地利資產與隱逸風采，也標誌了他退隱之前，「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的事功。而從謝玄移鎮東陽，於道疾篤時的上書：「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以及上引〈述祖德·之二〉所說的「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道」、「道情」、「神理」、「遺情」的強調，正表示了不論是「建大功」或「觀丘壑」，皆為「道」的體會與展現。⁷⁰

將前段所引述的自注，說謝玄「故選自然之神麗，以申高棲之意」，對照著史傳記載靈運「修營別業，傍江帶山，盡幽居之美」，⁷¹可以發現謝靈運隱處始寧莊園，一方面是有意識地承繼謝玄，不僅要注重「傍江帶山」的「自然神麗」，同時也須營處出「高棲之意」、「幽居之美」，這種謝家「棲清曠於山川」⁷²的棲隱品味；另一方面，藉由仿效謝玄的「身退」，彷彿就能摩娑出與他同等輝煌的「功成」，使自己經營探勘的身影，一樣散發著滿載功勳的榮耀。難怪〈山居賦〉中謝靈運對於自己偃蹇的仕途只輕輕帶過，卻著力稱頌謝玄肥水之役大敗苻堅之事；而且若考慮到，靈運曾叔祖謝安未仕前曾「高臥東山」二十年，謝玄「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述祖德·之一〉）之前，亦清言悠遊於始寧，或許謝靈運此次隱居，也不無來日「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⁷³的期待吧。從這個角度，就能理解為何謝靈運要將「山居」納入大賦系統，鄭毓瑜先生認為漢賦體式具現了以辨其名物建立起來的知識權威，而謝靈運偏愛以「山川」一詞、用大賦體式來建構家族的「山水」體驗，正是挪借了知識權威，成為士族封山佔水的合法聲明，並且藉由觀覽窮究的實地體驗，進一步轉化名物辨識的模式，推演出新的「山川關係」。⁷⁴換言之，〈山居賦〉中的「山川」一詞，也就是士族權力與山

報》第22卷，1991年，無著月份，頁163-177）。

⁷⁰ 有關「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中「道情」、「神理」的考辨，請參考齊益壽先生：〈『達人』形象與謝氏門風〉（收入《文化的饕餮·語言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頁155-171），頁155-156。「以道養壽」的討論，請見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8），頁120-122。

⁷¹ 見《宋書·謝靈運傳》（同注35），頁1754。

⁷²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12），頁10。

⁷³ 《晉書·謝安等傳》（同注33）云：「（謝安）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見頁2072-2073。

⁷⁴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12），頁9。

水風流一體兩面的具體象徵，⁷⁵例如以下兩組賦文的比對：

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

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列山川。

山川澗石，洲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

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自注）

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

關於前者，「這與不同地點相結合的多樣山形水勢與特殊物產，暗示了謝靈運也希企擁有足與和宮苑聲色相比擬的山野名物組合」；至於後者，則是「強調一己懷抱與山川方域共此清朗曠遠」。⁷⁶這緣自於家世門第的驕傲，⁷⁷就是謝靈運何以一再強調隱居處所必須是「山」：「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因為若是「江」而不是「山」，就無法「居」、不能「經營」，若是尋常山岳而非故鄉「東山」，即無法體現出專屬於謝氏家族的棲隱品味與歷史榮光。⁷⁸

參照前一節已討論，晉宋時期「東山」的隱逸風情，進一步言之，「東山」之「隱」還與建康之「仕」交錯互涉。建康所流露的名士風情雖與會稽有著相通之處，比如跨越仕隱兩端的謝安，在會稽和建康都同樣展現了寬緩悠徐的自若雅量，那是建康在庾亮「任法裁物」⁷⁹的「勤恪謹飭、網密刑峻」外，交揉參錯著王導「愼愼」⁸⁰的玄遠政風，或也可說是相對於「阡陌條暢」，「紆餘委曲」城市

⁷⁵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9-10。

⁷⁶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10。

⁷⁷ 有關門第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重要性，請參見錢穆：〈畧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新亞學報》第五卷第二期，1963 年 8 月，頁 23-77）。

⁷⁸ 小西昇提揭出謝詩中的「舊山」、「故山」、「道路憶山中」和謝靈運上表所云「抱疾歸山」，認為「謝靈運是以『山』作為故鄉意象的第一位詩人，一般旅人對故鄉的感覺是燃著火的爐邊，很久以前聽到的搖籃曲，或是母親的懷抱，但靈運對於故鄉的感受卻是山」、「故山、舊山之語意思重心在『山』，也就是說或許山之語詞自身中已經融入故鄉的意味」。見小西昇著，宋紅譯：〈謝靈運山水詩續考——其審美意識與山水畫之關係〉（收入宋紅編譯：《日韓謝靈運研究譯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109-126），頁 114-116。

⁷⁹ 見《晉書·庾亮傳》（同注 33），頁 1918。

⁸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政事篇》（同注 23）第 15 則記王導云「人言我愼愼，後人當思此愼愼」。

風情的延續，⁸¹但會稽畢竟不同於建康，名士們的弋釣採藥、泛海吟詠，還使「隱」以「居處」的方式跨入了「仕」的向度。孫綽無疑是最好的例子，史載他「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但孫綽並不只是「見止足之分」⁸²，亦曾上疏諫止桓溫還都洛陽，以致遭獲桓溫「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⁸³的譏諷。⁸⁴上疏的舉措或許是參與實務的具體呈顯，不過再仔細閱讀孫綽疏文，以及《世說新語》的記載：

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景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驅跼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漂溺江川。

85

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恆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⁸⁶

孫綽與高柔(生卒年不詳，339 應仍在世)的言語交鋒也許是在調笑彼此父祖的名諱，⁸⁷然而那並未出口、但意在言外的反詰：「無棟樑之用亦有所施」，其實是名士風流參與仕務的象徵，而當此風流是由「帶長阜，倚茂林」的建宅區位選擇、「齋前種松」「恆自守護」的人地相親開展時，它已與取代「地域正當性」——

⁸¹ 有關東晉建康意象與名士風格的相關涉，請參考鄭毓瑜先生：〈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同注 27)，「名士政治與建康意象」一節，頁 225-233。「勤恪謹飭、網密刑峻」一語見頁 227。

⁸²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同注 23)第 84 則，頁 79。

⁸³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輕詆篇》(同注 23)，第 16 則，頁 449。

⁸⁴ 有關孫綽、或其他東晉名士在「玄遊」與「時務」上的交錯干涉，請參見鄭毓瑜先生：〈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第三節「文化事件的『正(政)』統想像」(同注 27)，頁 215-225。

⁸⁵ 引自孫綽：〈移都洛陽疏〉，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同注 19)，頁 1807。

⁸⁶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同注 23)第 84 則，頁 140-141。

⁸⁷ 余嘉錫云：「興公為孫子荆之孫。高柔之言，乃斥其祖之名以戲之。孫答語中當亦還斥高柔祖父之名，但不可考耳。」見氏著：《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同注 23)，頁 141。

意指建都於中原河洛之地——來定義東晉王朝的「人情普遍性」⁸⁸密不可分了。換言之，「植根江外」的論辯正來自於「齋前種松」，不僅上疏行動、疏中文字具有抗諫功能，經營齋居、守護植松的本身，也就直接具有一種參與時政的效力。

將孫綽和謝靈運相對照，會發現謝靈運也正是由隱逸山林、修營別業來參與實務。細讀以下《宋書·謝靈運傳》的敘述：

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江帶山，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並自注，以言其事。⁸⁹

「每有一詩」至「名動京師」的部分，常為論者引述以表示謝靈運文才名滿天下，不過如果注意到：「修營別業，傍江帶山，盡幽居之美」，前已所述，為仿效謝玄之舉；謝靈運的山居生活不僅是美感經營，也同時具有士族權力；儘管試圖自我寬慰，歸隱其實終究是仕途不順下無奈的選擇；謝家與劉宋王朝之間微妙的政治拉鋸；⁹⁰以及這段記載，主要是描述自己隱居始寧的緣由和生活；那麼「作〈山居賦〉並自注，以言其事」，也就是〈山居賦〉之「文」與「山居」之「事」，就都必須一起納入「每有一詩」至「名動京師」的脈絡中，讓隱居始寧與賦寫山居都具有了一種「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的傳響效力。換言之，隱居始寧的本身，除了具顯出「出世」、「江湖」與「莊園」，更就在同時，也參與了「入世」、「廟堂」和「都邑」。⁹¹值得注意的是，表面上謝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的論述，與孫綽「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不應「離墳墓，棄生業」的抗辯如出一轍，但若考慮到謝靈運的「山居」，不只涵括了居宅經營、流連山水、友朋宴遊與土地欲望，還體現了「祖德」，那麼人地相親所含蘊的謝家風範更應是謝靈運的心繫所在。

⁸⁸ 詳細討論請參見鄭毓瑜先生：〈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同注 27），頁 214-215。

⁸⁹ 《宋書·謝靈運傳》（同注 35），頁 1754。

⁹⁰ 有關劉裕與謝家，尤其是具顯為和謝混、謝靈運，牽涉政治利益、門閥階級間的扞格鬥爭，請參考林文月先生：《謝靈運》（臺北：河洛出版社，1977 年 5 月），第三章：「生命中的第一個浪濤」，頁 15-29。

⁹¹ 此三組語彙前文已述，請見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 8），頁 121。

如此看來，體現「祖德」的「山居」，就是謝靈運「反放逐」的方式。⁹²屈原雖然在〈離騷〉中，經由「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寅吾以降。皇覽睠余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的回溯，將自己納入宗族譜系之中以對抗放逐，但再三自我肯定的同時，不免流露著孤獨高傲的激憤，以及故都日遠、往昔湮滅的哀傷；⁹³東吳亡國後赴洛的陸機，儘管多有〈思親賦〉、〈懷土賦〉、〈思歸賦〉等思親懷鄉，或者〈祖德賦〉、〈述先賦〉等追想祖德之作，面對北人譏嘲其南人身份時，⁹⁴亦秉持「我父祖名播海內，甯有不知」⁹⁵的偉傲激亢，但故鄉遼渺、父祖俱亡，只能「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懷土賦〉)的背後，透露的是對陸氏家族、孫吳舊國過去輝煌的無盡悼念。⁹⁶不同於屈原與陸機，謝氏祖德對於謝靈運來說，並不只是一股可以追懷摹想的支持力量，更就是那可觸可感的始寧故地。尤其謝玄出仕之前，是在家鄉始寧日與群從昆弟以清言相娛，以文義相接，妙探名理，品藻古今。而叔父謝安，則時常隨機開悟，循循善誘，⁹⁷始寧對於謝玄來說就是長成於斯的故鄉；但謝靈運雖生於會稽，然而幼時即被謝家因「子孫難得」⁹⁸，送往錢塘杜明師處治養，十五歲時(399)轉往建康，直到三十八歲(422)才因赴任永嘉太守，繞道途經會稽，並於次年(423)秋天辭官返鄉，因此會稽雖是謝家故居，但對於謝靈運來說，往昔在會稽的生活經驗恐怕十分遙遠，⁹⁹吸引著他的是謝家的歷史輝

⁹² 鄭毓瑜先生云：「也許在〈撰征賦〉中緬懷先祖的經處蹤跡，猶只是隱約的傳說記憶，可是到了〈山居賦〉，卻是那些傳說記憶具體落實，而且成為謝靈運體切踏著的安身立命之處。……於是當他重新修營始寧墅，他就不只是在零落的現況中建構起謝家先祖的歷史，也從而企圖把自己的人生經驗放置入家族誌之中；當他在描述謝玄如何高棲自然以避免如同屈原一般的放逐命運時，其實也等於在表現自己如何『反放逐』的思索與智慧」。見氏著：〈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8)，頁125。

⁹³ 關於屈原的「反放逐」，請參看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同注8)第一節「『放逐—反放逐』的地理圖志」，頁75-85。

⁹⁴ 有關陸機詩作中「南方」意象的討論，請參考林文月：〈潘岳陸機詩中的「南方」意識〉(《臺大中學報》第5期，1992年6月，頁81-118)。

⁹⁵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方正篇》(同注23)第18則：「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瑋。』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甯有不知？鬼子敢爾！』」見頁299。

⁹⁶ 關於〈懷土賦〉中追念父祖與懷想舊國的關係，請參考王德華注譯：《新譯陸機詩文集》(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9月)中對於〈懷土賦〉的評析，頁54-55。

⁹⁷ 有關謝玄出仕前以及功成後在始寧的生活，齊益壽先生有詳細的討論，請見氏著：〈『達人』形象與謝氏門風〉(收入《文化的饕餮·語言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頁155-171)，頁158-161。

⁹⁸ 見梁·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2月)卷上，頁29。

⁹⁹ 顧紹柏先生對此亦有相同看法：在此以前(按：指歸隱始寧)，他對始寧縣可以說，知之甚少。他雖是在這裡出生，但很早就被送到錢唐(今浙江杭州市)治養杜明師處治養。十五歲由錢唐入京，時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此一去就是二十三年，到了永初三年(公元四二二年)，他被調任永嘉太守，這才『始得傍歸路』、『枉帆過舊山』，到東山故居轉了一轉。但為時極短。所以

光，而且必須藉由守護故宅、修築新居與周旋山水，這種親自的探勘與經營，來逐步豁顯。歸返對於謝靈運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始寧，究竟開展了一個什麼樣的「山居」生活與「江南」風景？請見下節的討論。

第五節 身體行動與居的世界——〈山居賦〉中以身體行動開展的

「江南」風景

前文已提及鄭毓瑜老師以「山川」、「山水」兩個詞彙，提點傳統漢賦和〈山居賦〉的差異，以下我們也將對照〈山居賦〉和〈吳都賦〉、〈江賦〉等大賦中，「經營」、「經始」與「經略」詞彙的使用，希望觀察出漢賦與〈山居賦〉的不同之處。〈山居賦〉中，有關「經營」等詞彙的資料如下：

後及太傅既薨，遠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經始山川，實基於此。（自注）

（近北……）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自注）

（近西……）曾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并臨江，皆被以綠竹。（自注）

（遠南……）漫石在唐滋下，郝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自注）

遠望 山甚奇，謂白爍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畹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自注）

爰初經略，仗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視。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

無論是童年還是這次回鄉少駐，活動範圍大抵不出東山，不可能對始寧有全面認識」。見氏著：《謝靈運集校注》（同注 33），頁 466。有關謝靈運被送往杜師明處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比如李運富先生暫且繫之於謝靈運五歲時（389），見氏著：《謝靈運集》（長沙：岳麓書社，1999 年 8 月），頁 422，顧紹柏先生所編的年譜則沒有提及此事。儘管如此，從《詩品》（同注 94）所言：「其家已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云客兒」（見頁 29），「方」字仍可能透露出靈運留住杜處之長、送往錢塘之早，因此本文認為他幼年的會稽生活印象恐怕十分遼渺，應是合理的推測。

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

由上引資料，可以看出始寧是謝靈運的祖父謝玄、前人、友人，和謝靈運自己所共同譜寫的空間。所以由紹承謝玄的中央，到近處，再至遠地，都是可以親臨感受、而非無限擴張的世界，這不同於〈吳都賦〉中的「百川」，以「出乎大荒之中，行忽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即李善注云「言大荒、東極、扶桑、湯谷者，謂海外彌廣，無所不連也」¹⁰⁰的無廣不包，來表示「故其經略，土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的吳國權力；也有別於〈江賦〉中「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摠括漢泗，兼包淮湘，……瀉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的長江，一方面要「摠括」、「兼包」、「瀉汗」，另一方面又須「『作限』於華裔」，不免自我矛盾的捉襟見肘。而〈魏都賦〉和〈吳都賦〉言：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

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郭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路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

其「經始之制」、「所以經始」，分別體現了在時間軸上一為承上、一是啓下的「牢籠百王」和「用累千祀」，對照謝靈運的「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自注），最後賦云：「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此處的「百年」、「萬代」、「終古」、「清長」，卻都不再是「牢籠百王」和「用累千祀」的追溯過往或眺望未來，而是凝凍了流逝的時間，把過去與將來都拉引到當下和自己的「對」、「納」、「抱」、「美」之中，於是「高木」、「芬芳」、「泉源」與「膏液」交織的「江南」，就在「剪榛開逕」、「尋石覓崖」、營築新居間逐步透顯出來。並且，由於在「對百年之高木」之前的賦文，特別強調選擇居所的苦辛

¹⁰⁰ 引自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同注13），卷五，頁95。

(「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翦榛開逕，尋石覓崖」)、築建道場的講究(「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因此長久的經營，也就彷彿蘊含在那百年萬代、終古清長之中，以致「對納抱美」更有著一種完成經營之後，品嘗著經營成果的恬靜與安然。換言之，此段謝靈運的躬親經略，不僅寫出了親歷身觀的欣然，更傳達了以久長之親歷身觀：「居」所帶來的「地方」感。

若參照段義孚先生的研究，「空間」與「地方」的不同，在於後者因人的停憩而賦予意義，¹⁰¹他還舉了一個遊賞火口湖的例子，以說明觀光客和本地人環境體驗的不同：觀光客的態度是區隔了物我的「別靠得太近」、「湖就在那裡」¹⁰²，但本地人卻是從陽光和風去「經驗」地方的：

*You point to something as having Quality and the Quality tends to go away. Quality is what you see out of the corner of your eye, and so I look at the lake below but feel the peculiar quality from the chill, almost frigid sunlight behind me, and the almost motionless wind.*¹⁰³

那麼從這樣的角度來閱讀〈山居賦〉，匯聚了多樣的山川名物，反映「長期的」旅遊考察，固然是「居」不同於「短暫的」遊覽之處，比如顧紹柏先生就說：「賦中詳細記述了始寧一帶的山嶺溪澗、亭臺樓宇、花草竹木、鳥獸蟲魚，若無長時間的旅遊考察，很難做到這一點」¹⁰⁴，但除此之外，「居」更引生了物我之間關係的質變。〈山居賦〉的鋪寫，正「循序」體現了謝靈運從接觸、熟悉始寧，到「居」於始寧的過程。這可從兩個角度切入。一是大賦格式題材的轉化。關於〈山居賦〉中八方景觀與竹木魚鳥的鋪陳，前者鄭毓瑜先生指出，謝靈運是將傳統大賦的驗證有無，改寫為相應於殊異的探勘經驗，所獲得的不同山川關係；¹⁰⁵後者則像是提到草藥時說「隨土所生」、「此境出藥甚多」(皆為自注)，談及竹子則

¹⁰¹ 見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e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sota: University Minnesota Press, 1979.) 第十章“Intimate Experience of Place”可參看，見頁 136-148。此書有中譯本：見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3 月)。

¹⁰² 兩句原文為“Don’t go too close!”、“Well, there it is.”見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epective of Experience*. (同注) p.140.

¹⁰³ 見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epective of Experience*. p.141.同前注。

¹⁰⁴ 見顧紹柏先生：《謝靈運集校注》(同注 33)，頁 466。

¹⁰⁵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9-12。

云「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自注)，¹⁰⁶既不同於〈答車茂安書〉、〈江賦〉蒐羅方志、檢校字書所極力刻畫的異物，也與潘岳(247-300)〈閑居賦〉雖鋪排了家居的自然品物，同時也繫聯出匯聚京城的四方名果，¹⁰⁷呈現鮮明的對照。然而謝靈運此處的轉寫，與後文的仗策孤征、山作水役、南北兩居對照，傳統大賦的意味顯然還是較為濃厚。仗策孤征前一段已有所討論，山作水役及南北兩居則更彰顯了以身體行動去接觸「江南」會傳盪出不同以往的體驗，並且分別相應著〈山居賦〉中動詞的使用，以及以身體營造的新地標。鄭毓瑜先生對此有精彩的闡述：關於前者，動詞使用取代了傳統大賦慣用的形容詞，即是從擁有權的模糊象徵，走向劃定身體所在的關係維度。¹⁰⁸而當這些物產的類分、定位就與實際採集、製作、應用等身體動作密不可分，是由搜索者的判斷、採集或製作來決定這名物的出現與存在，在人身與名物、名物與地點的彼此勾連下，人身動作、特定名物與地點之間相互繫聯的網絡於焉形成，如此地理位置也可說是經由名物和人身動作間的連結而加以體現，比如：

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箭於谷。

慕樵高林，剝芟巖椒。掘蒨陽崖，擿陰標。

「刊」木、「伐」竹、「除」榛，是砍伐剪除的動作讓竹、木、榛呈現在眼前，而以「陟」嶺統括伐除等動作，才讓動作所在呈現出「高」度；又如「擿」、「掘」蒨，更以挑取與挖掘這兩種尋覓動作所透露出遠近不同的物我間距，映襯所在地的明暗、濕燥與高低。¹⁰⁹可見從遠東、遠南部分逐漸浮現的「凌石橋之莓苔，越檜谿之紆縈」、「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的「凌」、「越」、「入」等人身動作，到了賦篇後文已成為描寫的重點。而下面接續的南北兩居：

¹⁰⁶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11。

¹⁰⁷ 見孫雅芳：《安居的沉吟：魏晉『閒(閑)居』賦作析探》(同注 32)第四章「拙者的居中：潘岳〈閑居賦〉」第四節「坐擁萬品：兩類權力版圖的並置交合」，頁 122-130。

¹⁰⁸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13。

¹⁰⁹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12-14。

眾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往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葺館，瞰南峰以起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頽楣，附碧雲以翠椽。

參照自注：「從江樓步路，……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林，緣畛彌阜，橫波疏石，側道飛流，以爲寓目之美觀」、「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不論是三里的距離估算、或是二十丈的高度差距，都已不是從精準度量的角度出發，而是「身目與水岸、渠流交接周旋的新路線」、丹霞、碧雲「登堂入室，讓人彷彿飛升於霞際雲端，更使這高度的體驗超越了可以估算的界線」，¹¹⁰並且這樣的空間觀與南朝地志的書寫角度彼此相契，反映了晉宋時期新的地理論述的產生。¹¹¹經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山居賦〉中的「居」不僅是比如八方草木的部分，套用賦體以挪寫新的觀點，更是賦文前後順序的经营：從賦體的轉寫，到揮灑出更爲創新的特色，而這彷彿就是模擬著「居」逐步深化的歷程展現。換言之，從八方景觀的鋪敘、竹木魚鳥的類聚談起，到仗策孤征的經略，以至山作水役的穀稼之事，再進入南北兩居的營處，就顯示了一個逐漸脫離大賦傳統題材格式，愈發重視個人與環境交接的過程。

二則是可從地名的說解，以及特定名物的使用來觀察。關於名物說解，多集中於賦文前頭近遠八方的部分。像是近東一段云：「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土爰、石滂，閔礪、黃竹」，自注說明：「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爲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鄣水畎入田口。……入西谿之裏，得石塚，以石爲阻，故謂爲塚」，不僅將地名在地理空間中的區位交代清楚，更重要的是，「上田」之「上」雖是改「田口」之名以與「下湖」對仗，卻也顯現了「上田」在「下湖水口」故爲「上」的親身認識；「下湖」之「下」則是「田之下下處」的實際說解；而「石塚」更是「入西谿之裏」，才能發現「以石爲阻，故謂爲塚」的親自體察。須強調的是，這種對於地名的親身認識，呈現的是「初至」該地的體認，像是《世說新語》中的這兩則記載：

¹¹⁰ 詳細討論，請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14。並且鄭先生還進一步談到晉宋時期的地志中，有關高遠體驗和雲煙鳴聲，乃至於彼此跨類互涉的空間體驗。見頁 14-17。

¹¹¹ 有關南朝地志的特色，請見胡寶國：〈魏晉南北朝的州郡地志〉（《中國史研究》2001 年 4 期，頁 13-25）。鄭毓瑜先生對胡先生的研究，亦有所討論，請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15。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河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¹¹²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¹¹³

謝萬所云的「故當」一語，正表現了他乍然與曲阿湖相逢的體會：「淵注渟著，納而不流」恰好與湖名相合、本當如此的肯認。後一則劉注引《會稽土地志》：「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雖不得而知支道林在發出感嘆時是否已知曉山名，但「何其坦迤」終究是凸顯了「一見」所得的觀察。相對於這種初次相會的欣然，〈山居賦〉的往後鋪陳中，較引人注目的是一些逐漸浮現出來、一般遊覽者不會注意到的「特定名物」。比如前引段義孚先生所舉的例子：「風」，〈山居賦〉就有以下幾處的描繪：

近西則楊、賓接峰，唐皇連縱。……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

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

其木則松柏檀櫟，□□桐榆。……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

若乃南北兩居，水通路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

近西的「木鳴柯以起風」，按照自注：「鳥集鳴柯，便謂爲風也」，可見那是同時含蘊了觸感與聽覺的「樂風」，彷彿一陣陣撫觸著身體的音樂。竹林與其他樹林間也有不同，「風朝振而清氣」是清爽中含帶了脩竹挺搖擺振的視覺享受，或者也可說是清晨之風具備了爽朗振直的特點，而盤桓於松柏等其他樹種之風則是一種迴旋繚繞的膚觸。至於「方知厥所」所用的「觀風瞻雲」，更明白寫出「風」、「雲」得以成爲一種方位標示法：所謂「風露披清於隈岫」，辨識峰嶺即是去感受那從丘巖中含帶露水清氣迤迤而下的山風；關於「雲」，參考自注：「南悉連嶺疊郭，青翠相接，雲煙霄路，殆無倪際」，籠罩山峰，既「殆無倪際」又隱隱透

¹¹²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同注 23）第 77 則，頁 136-137。

¹¹³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同注 23）第 87 則，頁 143。

顯「青翠相接」的雲煙，反而成為辨認嶺鄣的方式；而「觀風瞻雲」連綴成詞，更含有風拂逐著雲的動態感。由此可知，近西、竹林、松柏或是南北兩居的不同，其實是靠著身體與「風」各種具有細微差異的交相互動來識別的，因此只要將進入不同的「風」裡，身體自然就能夠幫謝靈運記得自己現在身處的位置。所以從近西、其竹、其木仿若資料庫的積累，到最後南北兩居「觀風瞻雲」的方位辨識，也就是水到渠成的展現了。這種因長期生活而對自然環境仔細的觀照，在當時的地志中也多有記載：

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¹¹⁴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接應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壞。」¹¹⁵

卞山峻極，非清秋爽氣，不見其頂。¹¹⁶

不論是西陵峽口的「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王子敬的「若秋冬之際，尤難為壞」、或者是卞山的「非清秋爽氣，不見其頂」，提點出「非」與「若」，就表示這些景緻都必須在某個特定時點才能照應得到，暗示了是周覽四季日夜後所慢慢凝聚出來的心得體會。

〈山居賦〉中提及屈原的部分，正可作為串解本節論點的示例。〈山居賦〉中「遠南」段云：「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巖、漫石。峯、嶂對嶺，、孟分隔。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嶽崎而蒙籠，下深沉而澆激」，後半部迷茫高深的山水描繪，明顯挪用了〈九章·涉江〉：「入溱浦余儻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但若與謝靈運出守永嘉時所作的〈東山望海〉相參照：

¹¹⁴ 引自東晉·袁山松《宜都記》，見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卷34「江水注」，頁2844-2845。

¹¹⁵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篇》（同注23）第91則，頁145。

¹¹⁶ 見晉·張玄之：《吳興山墟名》，錄入劉緯毅輯：《漢唐方志輯佚》（同注52），頁105。原文引自宋·談鑰：《嘉泰吳興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3年3月）卷三「烏程縣」條下，頁6737。惟《嘉泰吳興志》與《漢唐方志輯佚》文字稍有出入，「爽氣」作「爽月」。

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策馬步蘭皋，緹控
息椒丘。采蕙遵大薄，蹇若履長洲。白華縞陽林，紫曄春流。非徒不弭
忘，覽物情彌道。萱蘇始無慰，寂寞終可求。

首四句本於〈九章·思美人〉：「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及〈招魂〉：「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策馬步蘭皋」以下四句也可看出挪用楚典的痕跡，如〈離騷〉：「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九章·思美人〉：「擘大薄之芳茝兮」、〈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¹¹⁷〈東山望海〉雖然與〈山居賦〉引寫〈九章·涉江〉一段，看似同樣描寫屈原放逐江南，徘徊於政治荒原中滿溢哀戚的心靈風景，但按照〈山居賦〉的自注：「棲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嶽崎深沉，處處皆然，不但一處」，顯然〈山居賦〉中的謝靈運已擺脫放逐悲感，¹¹⁸將之轉寫為「有趣之極」的徵實刻畫：「上、下是縱向俯仰，迷茫不知所往，則是窈窕深入」。¹¹⁹不過，賦文並非一定要參照自注才能豁顯出兩者的不同，像是對照〈山居賦〉：「上嶽崎而蒙籠，下深沉而澆激」、〈九章·涉江〉：「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山居賦〉的「蒙籠」不僅僅是西漢孔臧〈楊柳賦〉中，「綠葉累疊，鬱茂翳沉，蒙籠交錯，應風悲吟」¹²⁰枝葉蓊鬱的描繪，還可參照郭璞〈游仙詩〉：「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或者《世說新語》：「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郭璞所寫主要表示高山植被仰望「朦朧」，而顧愷之既是從會稽「還」，在「還」之前應還先有或長或短的「居」，那麼顧愷之所以將巖上草木連結到雲霞，就可能與前面所談，鄭毓瑜先生說雲霞已被視為一種「高度」的體驗，或者是我們在「觀風瞻雲」部份所云，雲霞甚至已與山連結在一起成為地標有關。而顧特別強調「蒙籠」、「興蔚」的光影變化，使得原本雲霞與山的連結，更再接再上了和光影之間的關聯，這當是他在承襲前人之餘個人的一種「居」的體驗。如此，當謝靈運以「蒙籠」一詞替換屈原的「蔽日」時，可能也就隱括了顧愷之的感受，表示那不只存在著一種草木、雲霞與山

¹¹⁷ 以上〈東山望海〉引用《楚辭》典故的說明，請參見顧紹柏先生：《謝靈運集校注》（同注 33），頁 99-100。

¹¹⁸ 此處蒙王文進先生提醒，〈東山望海〉可與〈山居賦〉中挪用楚典的部分相互對照。

¹¹⁹ 引文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2），頁 12。

¹²⁰ 見清·嚴可均：《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同注 19），頁 154。

岳彼此之間交錯的聯繫、更還具顯了和高度：「嶽崎」的關係，也就是此句描寫具顯了謝靈運對於始寧「居」的感受。而下句「下深沉而激澆」的「激澆」，若釋為「水回旋碰撞」¹²¹，那麼由水勢湍疾來體現「深沉」的距離感，也應是謝靈運的「山居」體驗。因此〈山居賦〉經由人身與自然交接，或者更至於「居」所呈顯的「地方」感，顯然不同於《楚辭》的心象世界。雖然此處謝靈運「居」的意味，還不如後文濃厚，比如引述《楚辭》代表的可能是一種隱伏的放逐之悲，表示謝靈運仍無法完全敞開心胸，但大賦體式的使用，使得始寧莊園居於權力中心的發聲位置，迥異於行吟在政治邊緣的屈賦。謝靈運似乎是有意識的翻轉，藉由發聲位置的轉移、大賦體式凝凍時間延展空間的特色，將迫不回從前、看不到未來、歸不了家鄉的放逐之悲，努力轉換為歸返故土、朗現當下、¹²²自主選擇的悠遊自在。所謂「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在與「江南」欣於所遇的同時，謝氏「祖德」也就於此豁顯了。¹²³

第六節 結語

相較於謝靈運的詩作，〈山居賦〉並未受到文學研究者的重視，即使論及，往往提舉出來的也是其仿若史料的紀錄價值，比如有學者認為：「謝靈運文的成就遠不如詩。……〈山居賦〉不是一篇成功的文學作品，但由於它詳細描述了始

¹²¹ 見李運富：《謝靈運集》（同注 99），頁 239。

¹²² 孫康宜先生如此討論謝靈運的「審美快感」：「謝的終極歡樂來自對超越其情感的山水風光的瞬間性征服。因此，對於謝靈運來說，『美』存在於感知自然的『即刻』之中，存在於構成『即刻』的情感之中，在他看來，重要的是凝固這些瞬間，並將它們轉化為審美經驗。人們會得到這樣的印象，詩人是在時間的長河中跳躍，從一個美的持續瞬間『跳』到另一個美的持續瞬間，而不是『移動』。見孫康宜先生著，鍾振振譯：《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2001 年 9 月），頁 94-95。

¹²³ 關於謝靈運喜好使用典故，前人已有所論，例如李光哲：《謝靈運詩用典考論》（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7 年 6 月）；其中，有關《楚辭》的用典，雖然次數少於《詩經》，但根據沈凡玉：〈由典故運用試論謝靈運詩與《楚辭》之淵源〉（《中國文學研究》第 18 期，2004 年 6 月，頁 57-83）的研究，因為「《詩經》典故雖多，卻並未集中於表現特定的情感，意涵較為分散，多為修辭上的雅化功能，相較之下，《楚辭》典故與《老》、《莊》、《易》等玄典，表現的意涵則較具整體性，往往是貫串所有作品，反覆出現的某些情感、意識或理念」（頁 59），毋寧較為引人注目。不過，沈凡玉從「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傷時嘆逝之時間意識」、「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遷客逐臣之放逐心態」、「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幽居空山之隱者形象」三方面切入，認為引用屈騷的寫景部分都應是「自我意識的反應」，這樣的看法雖能夠詮釋像是前述〈東山望海〉沉溺於放逐悲慨的詩作，但卻未能完滿解讀，〈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雖挪用了「幽篁」一詞、描寫幽閉風景，卻又強調「幽篁未為遘」；或者「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修竹茂林」，其實更可能是出於山環水繞的實際描繪、備列要求以及流連賞好，比如〈山居賦〉自注即云：「北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因此本文此處對於謝靈運引用屈賦的討論，或許可以補充沈凡玉沒有觸及的部分。

寧謝氏莊園的規模、形勝、物產，卻為今天研究東晉以來的莊園制度留下了一份重要的資料。¹²⁴然而若注意到〈山居賦〉特意提揭出的「山居」，並將之置於「江南」書寫的脈絡中，反而會開發出〈山居賦〉較少為人注目的面向。

西漢至東晉大賦中的「江南」，主要呈現了兩種形象。一是「承襲」或「反轉」經常為北方一統帝國所用，藉由細辨異物，以展現政治權力的大賦體式所宰制的對象，反映的是自《尚書·禹貢》、《周禮·地官》以來的傳統地理論述；另一則是著重於極限下的個體意識、或者水勢虛誇描繪的江海。兩者儘管有時彼此結合，但都仍並未呈現出長久依存於「江南」的在地體驗。相對的，〈山居賦〉中「山居」不論是強調「山」而不是「水」，或是雖沿用賦體，但提出遊走於私我與皇權兩種向度的「居」，都豁顯出不同於以往的關注角度。謝靈運對於經營山岳的興趣其實不是個案，晉宋時期的「東山」即吸引了大量隱者前往居處，他們心目中的「東山」，是得以探勘封佔的地利資產，也是能讓名士遊賞山水、舒展風流的場域；是物質條件豐裕、注重享受的隱處，也是必須精心打造、流露士族品味的經營之所。不過，「山居」對於謝靈運來說，意義不僅於此。一方面此「山」為故鄉始寧，藉由經營始寧莊園的身體行動，將賦體所展現的皇權，轉化為士族封山佔水的合法聲明以體現「祖德」，使「山居」獲得「名動京師」、對抗放逐的效力；另一方面，「居」也是長時間停留以產生意義的過程，因此謝靈運不僅在身經形處中，以八方殊異的山川描寫轉化有無與否的資產聲明，用物與物之間的動態關係取代了原有普遍物性的展示，形成了一種新的以人身為維度的地理論述，¹²⁵並且也以賦前後的書寫歷程，具現了「居」的逐漸深入。

最後，〈山居賦〉為謝靈運「山居」生活的描繪，若將南朝山水詩概分為遊覽與行旅兩類，雖前文已辨析與「一般遊覽」有著些許差異，但其情調仍較近於「多了份寧靜和玄遠」的遊覽詩，而與「多了些仕宦生涯的奔動」之行旅詩有別，¹²⁶然而若從「開發」的角度來著眼，如：

正是江南經濟的大力開發、比較便利的交通，使千百年不為人知的深澗奇峰暴露在人們欣喜的目光下，被細緻地觀賞描繪。像庾闡、李顥等寫行旅

¹²⁴ 見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6月），頁60。

¹²⁵ 「八方殊異」以下的部分，請參考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12）之摘要，見頁1。

¹²⁶ 有關山水詩「遊覽」與「行旅」的分類，請見王文進先生：〈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年7月，頁103-113）。引文見頁103。

的山水詩，……都與江南的開發有直接關係。¹²⁷

那麼，本章從「山居」的向度來談論謝靈運的「江南」意象，正切中了「開發」的探討要點，其實並不與遊覽或行旅之作中的「江南」論述截然二分。至於「居」、「遊覽」和「行旅」，彼此間更為細緻的相涉與相別，則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¹²⁷ 見陶文鵬、韋鳳娟主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同注4），頁73-74。



第三章 〈哀江南賦〉中的「江南」論述

第一節 前言

一般討論庾信(513-581)〈哀江南賦〉，多是聚焦於賦篇著作時間的考疏、¹用典藝術的分析，²以及庾信的哀梁之情、鄉關之思、身世之悲和歷史批判等諸多面向中，何者為賦作重點，以及彼此之間如何協調等問題，³但對於賦題中所提揭出的「江南」，則少有學者著述專論。⁴這或許是因為，〈哀江南賦〉的篇題似取屈原(343-277B.C.)〈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一句，因此學者皆認為，在與屈作的並比中，即可透析「江南」之意涵。不過，如果我們認為〈哀江南〉是庾信的代表作、文學作品是在古今的對話中展開，而東晉(316-420)至梁(502-557)立足南土已兩百餘年，「江南」一詞毋寧積累了士人一層層的生活印記與思索體會，庾信篇題中的「江南」，自不能脫離此時代氛圍，那麼，〈哀江南賦〉的篇題就有「哀江南」一詞連讀，上承屈賦，或者「哀·江南」稍作停頓，以豁顯南朝士人以至庾信對於「江南」的詮釋。

因此，本章擬以〈哀江南賦〉中的「江南」為題。首先將〈哀江南賦〉與〈招魂〉相互對照，指出庾信承襲前人所體現出的「江南」，以及僅按此種方式理解〈哀江南賦〉的侷限；其次，由於學界談及〈哀江南賦〉，多與顏之推(531-591?)〈觀我生賦〉、沈炯(502-560)〈歸魂賦〉相互參照，因此本章也將從三賦的並比中，釐析出梁人看待「江南」的共性與差異；最後，討論〈哀江南賦〉的用典特色，指出此表述方式形塑出何種「江南」。

¹ 這幾乎是每一位研究庾信的學者都會碰觸的問題，至於存有幾種說法、孰是孰非，請見朱曉海先生於〈讀〈哀江南賦〉三問〉(《燕京學報》新12期，2002年5月，頁191-250)一文中詳細的考疏，見191-202。本文即採朱先生的說法，認為〈哀江南賦〉作於周明帝元年、即陳武帝永定元年(557)十二月，時年庾信四十五歲。

² 如郭玉雯先生：〈哀江南賦的結構與用典〉(《臺北師專學報》第13期，1986年6月，頁67-93)，頁78。

³ 如李錫鎮先生：《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臺北：三通圖書公司，2000年3月)、許東海：《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9月)、牛貴琥：《腸斷江南——庾信與齊梁文士現象》(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魯同群：《庾信傳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⁴ 唯張素卿先生：〈時空·天人：解讀庾信的「懷歸意識」〉(臺灣大學、荷蘭萊頓大學主辦，「中國文化中的時空觀念」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1993年5月)、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和李錫鎮先生：《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同注3)對於「江南」有較多的著墨。

第二節 以「梁」詮釋「江南」的效用與局限

——〈哀江南賦〉對於〈招魂〉的承襲與轉化

討論〈哀江南賦〉與屈原〈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的關係，涉及庾信對於〈招魂〉的理解，唯有釐清庾信對〈招魂〉的體認，才能進一步指出他為何引用〈招魂〉，以及如何轉化。不過，這樣的探索，如果是聚焦在從〈招魂〉的作者、篇中招者、被招者的確切對象，以及「江南」的定義，進而確認「魂兮歸來哀江南」的敘述者、主語和「哀江南」的意涵，恐怕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成果，因為如我們在第一章〈《楚辭》中的「江南」〉所指出的，〈招魂〉雖然實為屈原自招之作，「江南」乃是其放逐之地，但無法確定庾信即是採取此種閱讀方式來理解〈招魂〉，畢竟古來有關〈招魂〉的詮釋眾說紛紜，從〈哀江南賦〉和庾信現存的著作中，無法找到有力證據，可以指證庾信所採取的究竟是哪一種說解。

因此，合宜的詮釋方式，毋寧是先尋繹出不論如何解釋〈招魂〉，皆不致脫離的範疇，再與〈哀江南賦〉對照，以釐析出兩者的切點。〈招魂〉可以從兩個層次切入，而此兩層次都映現了屈作的基調，倘若庾信十分熟悉屈作應是合理的推測，那麼對於〈招魂〉的理解，就不必僅侷限此篇，還指涉著屈作整體。其一，〈招魂〉「雲夢畋獵」一段所描寫的君臣遇合不論被視為往事、或是現在進行式，都會令人想及與懷王相契，不僅是屈原榮耀而不可復返的過去、無法追及的將來，同時也對比出了此刻相對於君臣遇合的放逐之悲；其次，不管招魂對象是懷王抑或屈原，〈招魂〉都表現出了身在異地，戀眷故國的思歸情懷，並暗含著對於楚國盛世的追悼。換言之，〈招魂〉可從「己」：「士臣哀思」與「國」：「君國悲悼」的兩種視角剖析其「哀」，⁵但哀「己」和哀「國」其實是一體兩面，前者可視為後者的衍申。

〈哀江南賦〉亦可從「己」、「國」兩角度切入。賦言「傳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⁶，「悲身世」、「念王室」此兩大主軸即為

⁵ 「士臣哀思」與「君國悲悼」之說乃許東海先生的看法，惟本文的推論過程與許先生稍微有異，許先生云：「〈哀江南賦序〉即以『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憂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說明創作旨趣，所指追憶君國舊事以抒發憂怨即承傳屈〈騷〉系列作品的主要精神，……主要仍源自以屈、宋為代表的楚〈騷〉書寫，並立足於君國悲悼與士臣哀思的兩大基調，可見屈、宋辭賦在庾信新中即是作為『哀怨之深』書寫的傳統典範」，見氏著：〈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141-173），頁161。

⁶ 本章所引〈哀江南賦〉皆本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月），後不贅述。

庾信對〈哀江南賦〉篇章內容的自我說解。不過，這兩大主軸是否即可直接對應到屈賦中的「士臣哀思」與「君國悲悼」？若否，兩者的關係為何？或許，我們也可以換個方式提問：如果以解讀〈招魂〉的方式來領會〈哀江南賦〉，會讓庾信的「江南」，以至「哀江南」，呈現何種面貌？這對於我們理解庾信有何助益，又有何侷限？以下，擬用倪璠《庾子山集注》⁷及許東海先生在〈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⁸一文的闡發為例，加以說明。

倪璠云：「此賦記梁朝之興亡治亂及己世之飄飄播遷，古有『詩史』，此可謂『賦史』矣」⁹，此處「梁朝之興亡治亂」是對應「念王室」，「己世之飄飄播遷」則為「悲身世」的註腳，看似兩者並立，但緊接著的「賦史」詮解，表示倪璠的解讀其實偏重在「梁朝之興亡治亂」，認為「己世之飄飄播遷」可涵帶於此一範疇之下，具有主從之分。¹⁰因此，即使在倪璠的詮解中，「悲身世」應指梁朝覆滅，導致庾信北遷長安、羈旅關河的悲慨，也就是他所謂的「鄉關之思」，或稱「思歸」情懷：



子山丁年出使，皓首不歸。是賦暮年所作，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故云流離至暮齒也。¹¹

此子山鄉關之思，一篇之致意也。……梁國子孫客長安者，有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並簡文帝子。……此言思歸者，不獨梁嗣也。¹²

但是，那似乎僅是「哀王室」的另一種表述方式：希冀回返那一故去之世界，旨在哀悼梁朝逝去，而非以己身之感懷與思索為重心。

換言之，儘管上述引文沿襲《北史·庾信傳》「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¹³的說法，指出〈哀江南賦〉為庾信暮年所作，

⁷ 倪璠：《庾子山集注》，同注 6。

⁸ 許東海先生：〈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141-173。

⁹ 見倪璠：《庾子山集注》（同注 6），頁 98。

¹⁰ 可參考李錫鎮先生對於倪璠注的解析，見氏著：《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同注 3）第 4 章第 1 節「論〈哀江南賦〉的主題：倪璠解釋觀點及其依據」，頁 167-193。

¹¹ 見倪璠：《庾子山集注》（同注 6），頁 97。

¹² 見倪璠：《庾子山集注》（同注 6），頁 171。

¹³ 見李延壽：《北史·庾信傳》卷 71（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 11 月），頁 2794。

「鄉關之思」與「思歸」同義，為賦作主題，但由於重點在於「哀王室」，因此「思鄉」只可理解為倪璠的一種「表層」說詞，是他對《北史·庾信傳》談及〈哀江南賦〉時，僅此一句、留有廣大詮釋空間之題解的一種理解方式。這也就是倪璠何以一方面說「〈哀江南賦〉者，哀梁亡也」¹⁴，另一方面又說此賦「致意」所在，乃庾信的「鄉關之思」，因為對倪璠而言，庾信的「鄉關」即是「梁」。

倪璠的說法，主要立基於對〈哀江南賦〉篇題的理解。倪璠云：

〈哀江南賦〉者，哀梁亡也。……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

宋玉，戰國時楚人。梁武帝都建鄴，元帝都江陵，二都本戰國楚地。¹⁵

此段談及的〈招魂〉作者，我們已在前文說明可存而不論；而「江南」並非楚國代稱、建鄴也非楚國領土。不過，此段引文的重要性，在於透露了倪璠如何理解「哀江南」一詞。他先找出「哀江南」的出處：襲自〈招魂〉，然後再進一步解釋，何以先秦楚國之「江南」可以對應到南朝蕭梁：「江南」意指戰國楚國，梁時建鄴與江陵「皆」為楚國領土，因此南梁即可以「江南」名之。前文已說明，倪璠認為〈哀江南賦〉之「悲己」、「念國」實為一體兩面，並以後者為主，那麼賦題「哀江南」，即與〈招魂〉具有內涵上的緊密聯繫；然而在這樣的詮解中，「哀江南」中的「江南」卻被虛懸了，「江南」只是從「梁朝的領土」此一切點，以作為「梁朝」的代稱，此代稱的本身並不具有其他的特殊意涵。倪璠對〈哀江南賦〉側重於「念王室」的詮解透露了他對於庾信的愛憐護持，強調庾信的鄉關之思，彷彿就替庾信打上了一個「忠臣」的烙印，而無視於賦中隱約其詞之處，甚至出現曲意的解釋了。¹⁶

許東海先生以賦篇開頭鋪陳家風祖德為例，指出〈哀江南賦〉本身就體現了庾信貞與不貞、無愧和有愧彼此交織糾結的複雜情懷。賦云：

¹⁴ 見倪璠：《庾子山集注》（同注 6），頁 94。

¹⁵ 見倪璠：《庾子山集注》（同注 6），頁 94。

¹⁶ 例如「遂餐周粟」本「委曲求全」，「忽踐秦庭」本「畏縮無措」，但倪璠僅取「周粟」之「周」，忽略「遂餐」，認為庾信只是以此說明終仕於周的事實；雖以「秦庭」之「秦」代表出使於魏的地域，但為顧及「秦庭乞師」的救國之意，先說庾信使魏是迫於君命，後又強調其出使與申包胥一樣，亦欲存楚，兩相矛盾。詳細討論請見鄭毓瑜先生：〈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哀江南」論述〉（收入《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135-191），頁 151-153。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嗟有道而無鳳，嘆非時而有麟。既奸回之曩逆，終不悅於仁人。

此段明顯襲用了〈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段，許先生認為屈原追溯世德，是爲了凸顯「與楚王室不可契闊的唇齒關係」，同時也可說是他「孤臣孽子憂憤的情變隱喻」；而〈哀江南賦〉門第世家的敘寫，雖表現了「庾氏父子與南梁王室的遇合情深與得意自豪」，卻也因此對比出庾信羈旅北朝、身仕異族，與屈原「貞臣」相對的「不貞」與「危苦」：¹⁷

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

也就是〈擬詠懷詩其六〉所說的：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

不過，這樣的說法，似乎是將庾信置放在「過去——貞；現在——不貞」的架構中，實際上庾信的複雜糾結不僅是在於往昔和現今的對照，更是當下此刻心念的輾轉反覆。比如不斷強調自己出仕北朝之恥，「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反用伯夷、叔齊典故；同時卻又常自比爲替國效力的忠臣烈士，比如〈哀江南賦〉序云：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睥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朱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

此處庾信以馮異、荊軻、藺相如、毛遂、鍾儀、季孫意如、申包胥、下蔡威公自

¹⁷ 見許東海先生：〈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同注 7），頁 161-164。

況。由於駢文兩兩斷句的形式，上述八位人物可依序分爲四組，先指梁朝覆滅、使北不還，然後敘述無法達成外交使命，再說被拘留北，最後鋪陳救國之心、亡國之痛。第二、三組的中間部分，一是反用藺相如、毛遂事典，除了愧恨有辱國命，並以「見欺」暗責西魏；另一則是以鍾儀、季孫意如表示拘囚西魏。兩者皆含有身不由己的委屈之意。相對於表現己身之無奈處境乃是強遭西魏所迫，第一、四組則較切重於自己和梁運興衰的關係，凸出的是庾信自己的角色：第一組藉馮異、荊軻，述說雖身負重責、高居要位，然而未能完成使命，以致「大樹飄零」；第四組用申包胥、蔡威公事典，甚至以「頓地碎首」轉寫原先的「九頓首」，強調自己救楚心切、亡國悲痛。¹⁸從以上對於四組事典的分析，可見庾信雖一方面以自己未能完成使命、屈身仕北爲辱，甚而帶有自責之意味；但另一方面又強調自己如何爲國「乞援」，¹⁹使得身爲「將軍」、「壯士」，儘管責任重切、不免失敗，卻彷彿因此得以浸染在悲劇英雄的浪漫氣氛中了。難怪有學者就指出，庾信於此掩飾了罪責、誇大了自己。²⁰

既然貞或不貞難以二分，彼此纏結，那麼相對於屈原善惡分明的花草象徵，在己身之香草美人與他者之惡花臭草之間，存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庾信所承襲的草木書寫，也就比譬了自己「既中心煎熬，又行動無力」、既「生無生趣，然死又不能(或不敢)的尷尬心境」。因此楊儒賓先生就指出，庾信雖不用草本的蘭、蕙、荃、蓀等芳草，而以木本植物中高大魁偉的喬木，如桐、槐、桂、柳等象徵自我，然而這些植物卻皆以「半生半死」的意象出現，²¹像是出現頻繁的梧桐就是最佳示例：

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枯樹賦〉）

交讓未全死，梧桐惟半生。（〈慨然成詠〉）

¹⁸ 見李錫鎮先生：《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同注 3），頁 8-9。

¹⁹ 賦云：「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倪璠即指出：「『秦庭之哭』與序內『忽踐秦庭』事同，而取意各異。彼言入長安，此言金陵失守，二帝遇害，已有乞援之志，故奔江陵矣。」見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同注 6），頁 135。兩處相同的用典，「乞援之志」應當也不限於「奔江陵」也。

²⁰ 例如劉文忠認爲：「庾信對自己在侯景之亂中所表現的怯懦，卻進行了掩飾，所謂『將軍一去，大樹飄零』，既美化了自己的臨陣逃跑，也誇大了他自己的作用。」見氏著：《鮑照和庾信》（臺北：群玉堂發行、鴻泰總經銷，1991 年 12 月），頁 138。

²¹ 詳細討論請見楊儒賓先生：〈龍門之桐半死半生——由體裁、主題與表現方式，論庾信晚期作品所展現的精神世界〉（《幼獅學誌》第 12 卷第 1 期，1988 年 5 月，頁 39-79）。「忠臣」、「遺民」之引文出自頁 50，其餘則見頁 57-58。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擬聯珠之二十七〉）

有趣的是，就因為這些植物意象著重於其「半死半生」的特質，難以究其「實情」、意符與意指間的遊離就屬必然，所以「既難以歸入忠臣烈士，又不能成為在野移民」²²的矛盾，當然也就不會是唯一可能的解讀，尤其是對照著〈枯樹賦〉的此段，以及可與之參照的屈原〈橘頌〉：

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歎臥，頓山腰而半折。（〈枯樹賦〉）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九章·橘頌》）

「拔本」之「本」、「傷根」之「根」或許不無「梁朝」之意，彷彿是〈橘頌〉「深固難徙」的反用，但屈原在「深固難徙」之後馬上說道「更壹志兮」、「廓其無求兮」，讓「深固難徙」只是「更壹志」、「廓其無求」的形象化說明，「更壹志」、「廓其無求」是其寓旨，並可歸向於「異志」的表述。屈原要傳達的是，他對於「江南」的眷戀，在於他對楚國的熱愛、美政理想的堅持，「江南」是完全政治化了的；而庾信的枯樹之所以「拔本」，則是由於「山河阻絕、飄零離別」，「山河阻絕」講的是空間的離隔，「飄零」、「離別」皆可是枯樹的「狀態」，也可說「飄零」之感起因於「離別」，總之，庾信使用樹之「本」、「根」作為譬喻，正巧妙地運用植物「根著」地方，在屈原的「政治性」外增加其他可能的解讀。

這提醒了我們：庾信藉由「江南」此詞彙所傳達的語意，可能是非常豐富，不容簡化的。如此，就凸顯了將「江南」等同於「梁朝」的盲點：忽略了「江南」是地理、社會兼文化的表記，而「梁」只是以政權為主要意象；前者足以概括後

²² 引號內的字句為楊儒賓先生所言，不過楊先生用此說明庾信「鬱悶幽滯」的性格，此處則挪以作為意象說解。引句請見氏著：〈龍門之桐半死半生——由體裁、主題與表現方式，論庾信晚期作品所展現的精神世界〉（同前注），頁 50。

者，反之卻不然。²³因此，即便倪璠和許東海先生的討論，切入點和結論並不相同，但大抵還是只將〈哀江南賦〉中的「江南」作為梁朝代指，以「哀江南」上承屈騷，寓「士臣哀思」於「君國追悼」之中的角度來切入〈哀江南賦〉。²⁴這固然極為重要，但如果我們承認「哀江南」不僅是承襲了〈招魂〉，體現了文本彼此呼應的歷史縱深，同時「江南」在東晉以下士人南渡生根，逐漸積存了屬於這個地方的豐厚意涵，而具有南朝的特色，那麼「江南」就應該反映了梁人的新詮。這個部份，我們將在下一節中詳細討論。

第三節 家園與「中原」的「江南」——〈哀江南賦〉、〈觀我生賦〉和〈歸魂賦〉中的人情普遍性與文化正朔

前引許東海先生的討論，以〈哀江南賦〉篇首追敘家風世德，與〈離騷〉相互參照，以凸顯庾信貞與不貞相互糾結的複雜情懷。不過，許先生似乎是聚焦在敘祖中的梁朝那一部分，若我們再重新細讀之，並和賦末「天道迴旋」一段連看，會發現此處的溯祖追源，具顯出了「家族」乃至於「江南」對於庾信的意義。賦云：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冬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岳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川徑臨江之府。

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辭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嘆非時而有麟。既奸回之嚮逆，終

²³ 見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218。

²⁴ 許東海先生在〈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一文中（同注7），對於庾信筆下的「江南」有精彩的發揮，不過，他主要是以〈春賦〉、〈竹杖賦〉、〈邛竹杖賦〉、〈枯樹賦〉等來詮釋庾信的「江南」，討論〈哀江南賦〉時，反而以「哀梁」為主要切入點，此與本文認為〈哀江南賦〉即可體現庾信之「江南」，觀點不同。

不悅於仁人。

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

第一則第一段引文稱述先祖，即是賦序所說「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由於開頭即從周代說起：「掌庾承周，以世功爲族」，因此敘祖以自重，應擴大許先生所說的與「梁」遇合以至與「君」遇合、任「國」重臣。之後，由於晉室南渡，乃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的描述，以帶出一種「播遷」的流離感，因此也消解了前述「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中「重世」、「晏安」原本所含蘊的「安土重遷」，使得上溯周、漢成爲落根江南的序曲。第二段由於承接著先祖「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此只是一個簡略的交代、遷徙中的短暫停駐，因此相對於劉宋至梁，庾易、庾黔婁、庾孜、庾道驥、庾會、庾告云、庾易、庾肩吾等父祖的詳細敘述、往下自己「論兵江和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的誇豪，以及梁朝盛世的圖景描繪，固然可說只是遠古和近代資料繁缺的實際反映，也是以短暫的承平安樂，對比於接續以「豈知」所引領的侯景之亂、梁朝覆亡，但記述詳略正體現了生活經驗的重心，自成一段精筆細描的梁朝圖卷，當然不同於河洛祖地，江陵與建康是與庾信貼近的「鄉關」，他生於斯、長於斯，「江南」是他心靈上的歸宿，而潁川和鄢陵雖具有「系譜意義」，卻只是一個「地理名詞」²⁵。此時，若再連結著第二則引文一起思索，會發現：一方面，「嵩華」、「河洛」之於氏祖，就等同於「江南」之於庾信；另一方面，「播遷」、「流播」、「遭時而遷」統括了先前和當下、自我與家族的遭遇。所以「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洎余身而七葉」表現了對於「江南」的認同，「又遭時而北遷」就完全不見「北遷」的欣悅。當親人離散，故土也就不再是故土了，因此在陳述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的苦辛後，「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表示「偁大家族僅存他這一房系」²⁶；〈傷心賦〉中「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沒。……一女成人，一長孫孩穉，奄然玄壤，

²⁵ 見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210-211。

²⁶ 「零落將盡，靈光歸然」一句，朱曉海先生認爲，並非意指知交亡沒，而是親族零落。見氏著：〈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194-198。

何痛如之」，暗含了「絕後陰影」²⁷始終如影隨形，那庾信熟悉的「江南」，已不是現在位處南方的那塊土地，它只留存在記憶之中，讓人「哀」之悼之了。

庾信對「江南」「累世七葉」的描述，令人想及東晉孫綽的〈諫移都洛陽疏〉：

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景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驅蹶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漂溺江川。

28

孫綽的上疏當然有其針對性，目的在於駁斥桓溫希冀遷都河洛，重建帝都，因此批評江左臣民「班荆輟音」、不思歸返的說法，不過，如果從「人情普遍性」的角度著眼，庾信對於「江南」的看法其實是和孫綽一脈相承的，比如鄭毓瑜先生就如此闡釋孫綽的上疏道：

在此段描述中所謂「河洛」不再代表周代王城典制、不再是宅中圖大的帝國象徵，就只是歷經喪亂六十餘年的一片蕭條丘墟；至於江南，卻歷經數世播流，而成為長養老死的依存所在。……這樣的看法是將家國意識的核心由「地域正當性」移轉到「人情普遍性」，以人情取代地域（或「歷史——地理」），作為一種重新界定東晉王朝與邦國想像的出發點。²⁹

然而孫綽提出「人情普遍性」以參與實務，與東晉以來山水流連、土地經營的風潮有著密切的關聯，而謝靈運歸返始寧、承繼祖德亦與地利資產的開拓有關，³⁰庾信〈哀江南賦〉述祖雖亦有「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岳而胙土。分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提及田宅的營處，但往後不論是談到自己的文武雙全，如「王

²⁷ 見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214。

²⁸ 引自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七刷），頁1807。

²⁹ 引自鄭毓瑜先生：〈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收入李豐楙編：《地域、空間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199-236），頁214-215。

³⁰ 詳細討論請見本論文第二章。

子濱洛之歲」一段，或者五十年中無事的江表風華，像是從「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鍾鼓」到「馬武無預于甲兵，馮唐不論于將帥」整處，倒已都沒有再出現山水開發的描述。這一方面是由於建康的城市意象本來就與會稽不同，另一方面可能也暗示從東晉興起的山林開發，到了南梁已告一段落。

相對於已是「累世七葉」的「江南」之鄉，庾信筆下的北方若不是以寒冷、怪異的形象出現：³¹

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雪暗如沙，冰橫似岸。（〈哀江南賦〉）

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小園賦〉）

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朔。揚浮有怪雲，細凌聞災電。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和張侍中述懷〉）

就是如漸染〈春賦〉南梁風華的〈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兩者都可視為將北方納入以「江南」為中心的書寫系統，因為駢比句式、宮體流風實際上也是體現「江南」的一種方式。王褒、庾信對於北周的政治利益，在於憑藉文學才能，協助北周進行以六朝慣用的駢比句式取代大語體的文體改革。雖說攏絡南來文士能夠塑造北朝重視人才、提倡文教的形象，³²不過卻也因此對比出北周文壇的質木無文，顯現駢句的南方特色。從這個角度來看，《朝野僉載》即便可能是稗官野史之說，但其中關於庾信入北後以〈枯樹賦〉自炫的記載，饒富意味：³³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

³¹ 此處的北方意象，參照了朱曉海先生的意見，朱先生認為這些描述是庾信「初至秦隴，當然難免會有景物全殊，水土不服的感受」，見氏著：〈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212。

³² 以上對於文學改革、攏絡南士的討論，詳見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頁580-583；李錫鎮先生：《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同注3），頁231-239。

³³ 關於此則記載如何體現了「江南」，許東海先生在其〈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同註7）一文中有詳細的討論，見頁157-158。

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³⁴

因此〈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中以宮體書寫北方，呈顯了深刻的意義。此賦雖然依稀暗示了庾信已日益認同北周，將之視為第二家園，但同時也弔詭地觸動了仍以「江南」為依歸的深層情懷；換言之，「表面上極盡宮體風華的北周貴遊樂園，其中雖不無庾信入北多年枯木逢春的際遇，卻終究難以取代南梁〈春賦〉歷史時光的刻骨銘心與永恆眷戀」³⁵。

南朝士人對於長安、洛陽始終懷抱著一種複雜的情感。南朝詩文中不斷出現的京洛意象，一方面，可說是「大中國意識」的展現，「江南」必須在「神州」的「加持」下，才能成為己所「真實」生活的場域；另一方面，京洛意象的使用，涉及對於漢朝的嚮往，雖然可視為「一味沉醉在漢代歷史的光輝下」、「天漢雄風的攀附」，但同時也存有以漢代自比，指南朝廷續正統文化，不與北朝同類的意味，比如南朝〈長安道〉、〈洛陽道〉諸作、看似讚頌「長安」、「洛陽」的宏偉壯麗，但實際上卻洋溢著江南的都城風情，在需要比附京洛的同時，卻又是借京洛之名，將「江南」推向正統。³⁶「大漢圖騰」思維模式正凸顯了南朝士人的矛盾情結。不過，不管如何，那畢竟只是遙想中原，當南人真正有機會踏入北土，「返回」長安、洛陽時，庾信的反應似乎提示了我們，南朝士人眷戀的「京洛」，其實是象徵著漢文化所具顯的文化正統，而非現實中胡人統治下的北方荒漠之地——儘管他們有時也不免流露出一股好奇之情。這可以從經常拿來與〈哀江南賦〉參照的〈觀我生賦〉和〈歸魂賦〉得到印證。

雖然〈哀江南賦〉中也有「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為戎矣」這樣的描述，不過，在顏之推的〈觀我生賦〉中華夷的區辨才表現得比較明顯。〈觀我生賦〉也有從「人情」書寫的江南，顏之推如此描述侯景之亂後，為侯景所擒，返回建康的所見所感：

³⁴ 唐·張鷟：《朝野僉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卷6，頁184。

³⁵ 引文請見許東海先生：〈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同注7），頁153，詳細討論可參看此文第二節「宮體再現與樂園錯位——〈春賦〉與〈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的世變與情志書寫」。

³⁶ 有關南朝士人的「歷史想像」，請參照王文進先生一系列的相關討論，例如：《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12月）、〈南朝文人的「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收入《南朝邊塞詩新論》，見前注，頁239-262）、〈南朝士人的思維模式〉（《東華人文學報》第5期，2003年7月，頁235-260）。不過，王先生主要是從「眷戀中原」、「攀附雄風」的角度著眼，本文則從「歷史想像」具有矛盾的雙重性出發。

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鼗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闐寂而無煙。疇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經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³⁷

顏之推祖籍瑯琊臨沂，為顏氏家族流寓江南的第九代，從出生至九歲居於江陵，之後舉家遷往建康，十七歲時又回到江陵，翌年即發生侯景之亂。³⁸在建康長住八年之久，顏之推應對建康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自注云「長干」為「舊顏家巷」、「白下」則「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因此目睹侯景亂後，建康繁華頓成一片荒墟，「疇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雖是在談「百家」、「五宗」，如自注所說：「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不過「掩抑」、「流連」的背後，毋寧是對於包括自己，和所有已在江南落戶生根的南人，不意卻一朝拔之的悲慨。

「中原冠帶，隨晉渡江」的追往，不只關涉累世生活的經驗，同時也隱含著現今遭遇大禍，梁朝衣冠禮樂³⁹不再、斯文盡喪⁴⁰的感嘆，因此〈觀我生賦〉常常出現華夏與夷狄、文明和野蠻的對比，如：

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奧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催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玩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瀟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為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

這不僅是對於過去歷史的歸納分析，更表現了東晉至梁，由國而家到已延續華夏正統的自重自信，因此面對侯景亂梁、己身遷北時，顏之推也是從華夷分判的角

³⁷ 本章所引〈觀我生賦〉皆本《北齊書·顏之推傳》(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3月，頁617-626)，所錄賦文(見頁618-626)，以下不再贅述。

³⁸ 見盧建榮：《一位父親的叮嚀——顏氏家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6月)，頁8-9。

³⁹ 《北齊書·杜弼傳》(同注37，頁347)云：「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

⁴⁰ 〈觀我生賦〉寫江陵之禍，梁武帝焚書：「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燬。浦天之下，斯文盡喪」。

度著眼。賦云：

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

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

前段之所以說侯景之亂後「江南」已由「禮樂」之地轉為「左衽」四浹，是因為侯景這「傅翼之飛獸」、「貪心之野狼」乃是胡人；後段則透露了顏之推入北時的好奇，「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皆指中原地區這古時的禮樂之地，⁴¹南朝時由於南北隔絕，士人無法親蒞，只能靠著讀詠圖書來揣想。如今到了北方，卻只覺得山川依舊，人事全非。諸夏正朔的關鍵存乎於「人」，而非地域上距離中原的遠近。

至於〈歸魂賦〉，學者已指出其富於寫景的特色，沈冬青云：

賦中對江陵亡後遷徙北方的歷程，以及在北方所見的景物，和南歸途中的山水風光皆詳加描述，這些大量寫景的句子，實喻託了作者個人由遷徙到返歸期間的一段心路歷程。⁴²

所謂「心路歷程」的「喻託」，當指情景合一的描述，例如羈縲入北時，「履峩峩之層冰，面颼颼之巖雪」；被釋南歸時，卻是「于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不過如果從行旅賦的兩大特色：「山水寫景」和「因地及史」⁴³來切入〈歸魂賦〉，卻更能凸顯出沈炯對於北方的看法。賦云：

⁴¹ 此兩句盧文弨注云：「十六國，當以詩有十五國風，并魯數之為十六也。或者身已入關，舉崔鴻所紀載之十六國為言，亦未可定。管仲言古封禪之君，七十二家。今言七十代，舉成數也」，不過此處既然「十六國」與「七十代」對言，後文強調「詠圖書而可想」，「十六國」或許以前說為宜。盧注見周法高輯：《顏氏家訓彙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5年4月），頁145。

⁴² 見沈冬青：《梁末羈北文士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頁234-235。

⁴³ 王琳：〈簡論漢魏六朝的紀行賦〉（《文史哲》1990年第5期，頁67-69）指出，漢魏六朝紀行賦前期的特色是因地及史，東晉以後則增加山水描寫的成分。詳細討論，則請參看鄭毓瑜先生：〈魏晉南北朝行旅賦的兩種類型及其美學意義（今風古轍，每動寸衷——漢魏六朝行旅賦的抒情美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7年7月）。

乃尋浙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燦。其山也，則嶽岑嶧嵬，巖 婆陲，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碎訇滌汨，或寬或疾。繫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雨，水百仞而寫蜿蜒。若一夫而守隘，豈萬眾之能攻。去青泥而喻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羸發握其何言。訪軹道之長組，拾藍田之瓊璫。無故老之可訊，並臚臚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符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為彼主之庭除。⁴⁴

上述引文可以「何武關之狹隘」分為兩小段。前段為「山水描繪」，後段為「因地及史」。前段以一新奇的眼光流連北地風光，然而山水木石的鋪排，令人想及的卻反而是江南景緻，失去了北方的面目；後段點出行經地點，但「武關」、「驪山」、「灞陵」、「未央」、「長樂」等地名所勾連出的，卻是秦漢三國魏晉古事，不像顏之推只說「詠圖書而可想」，沈炯彷彿是將書冊所載當作旅遊指南，一一與所存遺跡相互比對，近乎刻意的查訪，使他忍不住發出「實不乖乎前史」的讚嘆。然而，就在大量的古今對應鋪排中，卻夾雜著令人怵目驚心的一句：「無故老之可訊，並臚臚之空原」，原來京洛所留存的，即使與書籍一致，也不過是歷史的空殼罷了。沈炯沒有說出卻暗帶其中的，就是對於「江南」禮樂正朔的眷戀與自豪，難怪庾信在〈和張侍中述懷〉中描述梁朝亂亡時說：「永嘉獨流寓，中原惟鼎鑊」，會將「江南」比為「中原」了。

第四節 「江南」的建構與解構——〈哀江南賦〉用典藝術的探討

張素卿先生在〈時空・天人：解讀庾信的「懷歸意識」〉一文中，討論了庾信對時間和空間的思考。張先生指出，解讀〈哀江南賦〉，即「透徹庾信的心路歷程，這是深一層去了解『哀』的意義」，並詳論云：

⁴⁴ 本章所引〈歸魂賦〉本自嚴可均輯：《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同注 28，頁 3477-3478）。

所謂「心路歷程」，是指庾信既投注心思於「江南」，形成一個空間映象，而且，它有時間之推移，它有歷史。由此而言，庾信〈哀江南賦〉是記敘他關於「具時間性的空間之歷史」的心路歷程。這種兼含時間與空間維度的意識情態，本文稱之為「懷歸意識」。……究極「哀江南」的意義，即冀望重返存在的本源，以求安頓自我，而重新肯定生命的價值。⁴⁵

張先生之所以解釋「心路歷程」、「懷歸意識」，重點在於接著指出了庾信的懷歸具有兩個向度，「一則導向於天，一則回歸家族」。前者指向「天人合一」的民族集體潛意識，在詩賦中往往化為登天、遠遊、懷歸的歷程；後者則主要從庾信的文學世家：庾易「移談講樹，就簡書筠」、庾肩吾「文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以及庾肩吾「顧託成書」而言。但就集體潛意識言之，「天」是無法回返的，因此家族根源成為庾信自我安頓的重要依據，也就是他對生命意義的終極反省。

46

不過，首先，如果從「江南」的角度著眼，「文學世家」的稱述其實是涵括在「水木交運，山川崩竭」以下的一整段敘述中，連結著庾易、庾黔婁、庾枚、庾道驥等人一起談論，與其說凸顯了「文學世家」的身分，不如說寫出了已在「江南」生根茁壯，因此，更可追溯至前面所述「待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以此一整大段刻畫家族與江南愈形緊密的聯繫。所以，如前一節的討論，親族的凋零播遷，造成了江南的「覆滅」，「家」不應是庾信的歸趨。其次，在〈哀江南賦〉中，「家」還是無法離逸「天」的掌控，自成意義的來源。賦末結尾談自己和整個家族的播遷與辛酸，總括以「天道迴旋，生民預焉」，如果「天道」是鬼魅般不可預知，毫無義理可言的：

生涯實有始，天道終虛曩。（〈和張侍中述懷〉）

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擬詠懷〉第十九）

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思舊銘〉）

⁴⁵ 見張素卿先生：〈時空・天人：解讀庾信的「懷歸意識」〉（同注4），頁1。

⁴⁶ 見張素卿先生：〈時空・天人：解讀庾信的「懷歸意識」〉（同注4），頁10-14。

那麼所有的「生民」都無法脫離此「天道」之「無道」。因此，儘管我們贊同庾信的著述與其父顧託有關，但是否就可視之為回歸於「家」，並以「家」作為最後安身立命之所在，或許仍可再進一步討論。

不過，張先生的討論，引領我們繼續思索：由於〈哀江南賦〉賦文以「敘祖自重」起始，至篇末才直截點出天之不可以依恃：「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天道迴旋，生民預焉」，那麼，從敘祖自重、落定江南，到不可恃天之間，庾信經歷了什麼樣的歷程？這個歷程中所體現的「江南」，具有何種意涵？或者，也可如此提問：〈哀江南賦〉從敘述先祖周漢舊事，以為播遷江南之序曲；最末說「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雖是反詰之前「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作為「故時將軍」、「思歸王子」「力道強勁」⁴⁷的身分表述，但「故時」之「故」也隱含著「江南」消亡，所以「思歸」不免透露著一股哀情。從「江南」之「興」談到「江南」之「亡」，⁴⁸〈哀江南賦〉究竟寫出了什麼樣的「江南」？

這個問題可從〈哀江南賦〉的用典切入。郭玉雯先生說：

〈哀江南賦〉句句用典，甚至一句就使用二典，這種廣用典故的情形，已形成全面的效果；因為大量用典時必牽動歷史上相關的時代，使過去的時空和賦中所述時空交融在一起。⁴⁹

哀江南所敘梁朝興亡的時間並不長，但篇製之鉅偉為當代少見，因為庾信在描述一事件時，往往運用許多典故來指涉，這些典故因為這事件而連結成一種類型。經由類型的分析，可以了解庾信用典的豐富性與創造性，別人想不到、用不上的典故，他以生花妙筆將其一一化入文章的脈絡中，有效地、藝術地表達了感悟與批判。⁵⁰

郭先生的討論觸及了使用典故的目的效果以及對於篇製的影響：前者指時空交融、巧妙有效地傳達感悟和批評；後者意謂繁用典故，使得篇幅成為長篇巨製。

⁴⁷ 見李錫鎮先生：《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同注3），頁132。

⁴⁸ 須強調的是，此「江南興亡」不同於倪璠所說「此賦記梁朝之興亡治亂」，「江南」不可化約為「梁朝」，前文已詳論矣。

⁴⁹ 引自郭玉雯先生：〈哀江南賦的結構與用典〉（同注2），頁68。

⁵⁰ 引自郭玉雯先生：〈哀江南賦的結構與用典〉（同注2），頁78。

若繼續探究前者是何種「時空交融」與「感悟批評」，可以蔡英俊先生從六朝文學切入，對於「用典」或「擬古」的討論，為進一步的申說：

透過認同作用所伴隨的對於過往經驗的借代與解釋，不論「擬古」或「用事」在在顯示出古典作家試圖把時間上的「過去」拉向「現在」的一種自覺，使得「過去」能與作家當下所屬的「現在」具有一種「同時代性」(contemporaneusness)，並且以此喚起一種文化上的集體意識。⁵¹

蔡先生所提及的典故意義：「同時代性」、「文化上的集體意識」，朱曉海先生也有近似的看法：「語文本質上是社會的產物，也是使用該語文的那個社群文化的累積」⁵²。而若再考慮到庾信使用典故，還多因地理形勢，將梁比擬為楚、吳、越，如郭玉雯先生云：

梁原來立都於建鄴，為吳國所在，所以時時引吳比梁。後元帝都於江陵，地近荊楚，又常常以楚喻梁。⁵³

那麼〈哀江南賦〉中的用典，毋寧就是希冀藉由時空疊合，積累出「江南」更為豐厚的文化深度。然而問題就在於，庾信常常以「空」、「徒」、「虛」、「不」、「未」、「害」、「無」、「盡」等字來反用典故，⁵⁴朱曉海先生就認為這所呈顯的意義是：

用典不僅是文學上的技巧與藝術的要求，也不僅是魏、晉風尚所致，他顯然希望能將自己的這份經歷尋求歷史上的往例，找到與它們足相對應者。如果說日光之下沒有真正的新事，那麼，他若能將個人面臨的衝擊歸檔到歷史中，新就只是個人經驗意義的新，其實古已有之了。但我們發現：庾信在用典時，至少在此〈賦〉中，經常採取反用的手法。換言之，他經歷

⁵¹ 引自蔡英俊先生：〈「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收入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67-96），頁75。

⁵² 引自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216。

⁵³ 引自郭玉雯先生：〈哀江南賦的結構與用典〉（同注2），頁88。

⁵⁴ 見郭玉雯先生：〈哀江南賦的結構與用典〉（同注2），頁89。而楊儒賓先生亦就關於庾作中的「對反對」句式有所研究，請參考氏著：〈龍門之桐半死半生——由體裁、主題與表現方式，論庾信晚期作品所展現的精神世界〉（同注21）第三節的討論，頁64-71。

的衝擊在他認識的歷史之外，不是既有案例、範疇可以涵蓋的，既然無法馴化這外來體，他也就只能一而再地嘗試。⁵⁵

朱先生較側重於庾信馴化衝擊的嘗試，若從「江南」意象的角度出發，當我們前已引述朱先生所指出的，「江南」為「地理、社會兼文化的表記」⁵⁶，並且也從「人情普遍性」和「文化正朔」去詮釋〈哀江南賦〉所體現的，東晉至梁逐漸於「江南」所層積出的文化意蘊，那麼〈哀江南賦〉中的「江南」於梁朝達致文化高峰後，庾信卻接著於往後極大篇幅的書寫中不斷反用典故，在為「江南」寫上一筆的同時，又馬上反詰自己、將之消抹，就是從一個更廣遠的、上承吳楚越的「江南」文化，去剝蝕消溶從東晉家族南渡、梁朝興盛以建構起的「江南」家園，以及「江南」紹繼大漢的「中原」意義。因此不但梁亡可悲，〈哀江南賦〉開篇至「馬武無預于甲兵，馮唐不論于將帥」，東晉至梁的文化礦層也被庾信掏空，甚至連「江南」更久遠的文化繫聯也被庾信割斷。整個「江南」的消亡，該是他最沉痛的感慨。

當「江南」已然消逝，安身立命對於庾信來說，是否可能呢？我們不妨從書寫的角度著眼。〈哀江南賦·序〉可以「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分為兩段，兩段結尾皆分別談及賦作書寫，若與賦篇收尾相互對照：

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飄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也。

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⁵⁵ 引自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216。

⁵⁶ 引自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218。

第一、二則引文雖皆以吐訴哀情爲作賦緣由，然而第二則的「是所甘心」、「固其宜也」顯然較第一則的「聊」、「不無」、「惟」來得強勢，似對「窮者達其言」、「勞者歌其事」充滿了不悔之執著；然而，經由賦作中「江南」的建構與拆解，賦篇末尾的「思歸」流露的卻是無盡的滄桑與悲哀。朱曉海先生就說道：

因「履危亡之運」引生之「思歸」乃歸迴那已逝去的整個世界，「思歸」既是「去故」之結果，但因故主、故交、故榮、故樂、故夢等種種「故」以「去」世，如星漢、蓬萊永無可上、可到之期，而若說神話中星漢、蓬萊猶有一兩位幸運兒曾涉足，他則由於外在「風飄」的阻力，連這一絲渺茫之可能性亦不復存，此所以其可悲之甚。⁵⁷

「已逝去的整個世界」即是那爲了銷憂而建構、之後又被自己否定的「江南」。對於庾信來說，就連書寫也因充滿矛盾而不足以依託了。

讓我們再回到第一節所談的「悲身世」、「念王室」。一般的討論，不外乎兩種層次：一是從文章重心來探討兩者比例：例如倪璠的「哀梁亡」之說顯然偏重「念王室」，二是由因果關係來貫串兩者：身世之悲繫因於王室之亡。兩種層次可以彼此互融，如倪璠之說實兼兩者。不過，如果再讀〈哀江南賦〉本文：

傳變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會發現「悲身世」與「念王室」是以互文對義的形式出現，兩者無法彼此區隔；而當我們解析了〈哀江南賦〉大量用典、並且是反用典故的意義後，更可以發現，「悲身世」與「念王室」不只是比例問題，也不純是因果關係，〈哀江南賦〉在長篇鋪敘「梁朝興亡」，並反用典故使之成爲「江南興亡」的同時，「念王室」也就是「悲身世」了。也就是說，庾信一方面書寫「江南」，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也在藉著典故事類間的相逆互忤表示安身之處無處可尋，因此從〈哀江南賦〉反用典故的特色切入，才能適切詮解「念王室」與「悲身世」彼此的關係與意涵。

⁵⁷ 引自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同注1），頁211。

第五節 結語

本章以三個層次來討論〈哀江南賦〉中的「江南」。首先以倪璠注及許東海先生於〈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一文中的討論為起點，指出「哀江南」一詞固可溯及〈招魂〉，從「士臣哀思」與「君國悲悼」的角度切入，將「江南」解為「梁朝」，並且在與屈原的對照中，呈現出庾信在貞與不貞間的矛盾糾結，但也應注意「江南」包有地理、社會、兼文化的意涵，「梁」只是其成分之一。其次，將〈哀江南賦〉與〈歸魂賦〉、〈觀我生賦〉相較，會發現三篇賦作中的「江南」書寫，都觸及了「人情普遍性」與「文化正朔」：前者反映了東晉渡江歷數百餘年，士人已在江南落戶生根，對於南土的依戀，且不同於〈山居賦〉，都已不重「江南」的山水開發。後者〈哀江南賦〉僅簡略帶過，〈歸魂賦〉與〈觀我生賦〉著墨較多，兩賦描述了士人入北後的所見所感，相較於禮樂江南，北方京洛的輝煌只留存在史冊之中，觸目所見不過是徒具虛文的山川遺跡，反映了以「江南」為文化正統的態度。而當此正統是經由駢賦體式加以豁顯，「江南」似乎已演練出不必套用漢賦習格，即能夠體現自己為中心的文體，並將北方納入此「江南」的體系之中。最後，用典乃是希企積累文化，然而〈哀江南賦〉在大量援引「江南」古事入典時，卻採取了反用典故的方式，這就是從一個更廣遠的、上承吳楚越的「江南」文化，去剝蝕消溶從東晉家族南渡、梁朝興盛以建構起的「江南」家園，以及「江南」紹暨大漢的「中原」意蘊。因此梁亡可悲只是其中的一個節點，〈哀江南賦〉開篇至「馬武無預于甲兵，馮唐不論于將帥」，東晉至梁的文化礦層也被庾信掏空，甚至連「江南」更久遠的文化繫聯也被庾信割斷。所以「江南」之可「哀」，並不只是因為整個「江南」都已然消亡，而且還是由於它仍在持續崩毀。於是：

還思建鄴水，終憶武昌魚。（〈奉和永豐殿下言志之七〉）

綠房千子熟，紫穗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忽見檳榔〉）

「建鄴」、「武昌」、「水」、「魚」和「檳榔」，都只能存在於「思」、「憶」、「曾經」之中。庾信如果還有可以憑恃的，大概就是那僅存的悲哀吧。



結語

本論文討論前中古辭賦中的「江南」論述，以《楚辭》、〈山居賦〉和〈哀江南賦〉三個端點進行研究。在簡述各篇的研究成果之前，須先提出一個參照的脈絡。鄭毓瑜先生指出，《尚書·禹貢》、《周禮·地官》、《禮記》等勾連出了一個重在「識別名物」與「地理政治」的傳統空間論述：這種地理政治學結合了識別與掌控為一體，重視準確勘察自然品物，比如講究製圖精確的重要、古來圖籍必須重新考注，但就「在識別名物的同時，也蘊藏了對於土地經濟、人民行動的種種認定與掌控」。¹而大賦體式由於文體核心即在於名物聯繫，因此「就在考訂源流至到，包羅草木鳥獸且類分定名的過程中，這種極端知識性、實證性的大賦論述模式，有效的保證了無可質疑的、甚至獲得尊崇的權力地位」²。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史籍中的地理論述，或者是體現此地理論述的大賦，都抱持著中原主位的立場。

《楚辭》中的「江南」可分為屈賦和「擬騷」兩部分。既不是一般談及屈賦，常常容易簡化為地域的反映，也不同於傳統地理論述中，講究精確考察，以成就中原政治權力掌控的帝國一隅，屈原筆下的「江南」為一權力關係下士臣的意識空間，可從中央與東西南北四方、中央與東西南北上下兩種網絡體系來談。前者主要以〈九章·哀郢〉、〈九章·涉江〉等紀行之作為討論題材。〈九章·哀郢〉中多處使用了四方方位詞以描述自己與楚國漸行漸遠的行跡，這些地理方位勾畫出了一個以郢都為中心的權力空間：一方面，四方是士臣為中央棄逐之所，是相對於權力中心的政治邊陲；另一方面，四方卻象徵著道德美善的堅持，得以對抗放逐，反過來將中央定義為墮落之地。因此，「江南」在中央與四方的脈絡中，既有〈九章·哀郢〉、〈九章·涉江〉等作裡，天地茫茫、晦暗多雨、舟船車馬容與不進等，遷客逐臣的心象描繪，同時此即不肯妥協的表徵；也有〈招魂〉亂辭中隱喻著道德修持的繁茂香花，不僅勾引出過去與君國遇合的榮光，以致屈

¹ 請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先生此文原以英文稿 *Bodily Movement and Geographic Categories: Xie Lingyun's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nd the Jin-Song Discourse on Mountains and Rivers* 登載於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vol. 23, 1-4, 2007, pp.193-219。此增補部分內容之中文稿已通過審核，將刊登於《淡江中文學報》，本文所引述之內容出自原始稿本，將待學報出刊後再加列出版項及調整頁碼），頁 5。

² 見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同注 1），頁 6。

原徘徊留戀，不忍去國，卻也凸顯出如今已仍高持但國已墮敗的現實，那麼爲國所棄乃是堅守操持的必然代價，使得「江南」也可說是屈原的自我流放之所。然而，〈招魂〉亂辭中的「江南」，還應再從套用了民俗儀式格套的招辭所體現的中央與四方上下切入，方才完整。不同於中央與四方、時時面向中心的身姿，那強烈對比的意象：閑靜美好、享受無虞相對於滿佈蠻族野獸、遍具威脅的自然氣候，表示招魂乃是爲了安頓處於極限狀態下希冀獲得舒緩的個體，但當苦痛來源已是魂欲歸郢，意欲銷憂的招魂儀式卻又強化返楚企望，這亟欲解脫、卻又無法超越的矛盾困境，使得〈招魂〉中的「江南」成爲恐怖至極、令屈原無以立足的邊緣空間。此爲「江南」可「哀」的另一周折。

漢代「擬騷」中的「江南」，可說是模擬屈賦的紙上空間。若分爲〈招隱士〉及其他「擬騷」兩種體系：〈招隱士〉雖摹寫屈賦，但筆下的「江南」卻與屈賦大異其趣。居於政治權力中心的發話者，將原本屈原筆下吐露士臣哀思的「江南」，改寫爲權力中心對於逃離體制的警告，表示隱士若執意不肯從山林歸返，下場就會像屈原那樣，只能在荒地僻處中與野獸爲伍。因此〈招隱士〉也可以說是企圖將屈賦的「江南」書寫，轉換至傳統地理論述的權力體現，和〈天子遊獵賦〉一樣，「江南」的存在價值在於坐實中央的掌控權。〈惜誓〉、〈七諫〉、〈哀時命〉等漢代擬騷中的「江南」書寫，則交錯使用著屈賦與〈招隱士〉的各種意象。和體現了傳統地理論述的漢大賦相較，兩者的「江南」書寫，都反映了漢朝一統帝國權力無邊的背景。不同的是，漢大賦中細述各項名物，如同資產清單的「江南」，是替帝國權力中心背書的收編之地；漢代「擬騷」中的「江南」，雖延襲了屈賦中央與四方、東西南北上下的權力空間，但體現的是矢志之士無法對抗，只能逃遁或者哀泣的不遇感慨。

西漢至東晉大賦中的「江南」分爲兩種書寫系統。前者像是〈天子遊獵賦〉、〈三都賦〉中爲帝國併納的荆楚與東吳，「江南」並不是舞台上的主角，而是經常爲北方一統帝國所用，藉由細辨異物以建構自身政權的大賦所宰制的對象；後者則如〈七發〉、〈海賦〉、〈涉江賦〉、〈觀濤賦〉等江海諸作，著重的是極限下的個體意識、或者水勢的虛誇描繪。〈答車茂安書〉企圖扭轉「山川論述」中總是南北不平的權力位階，〈江賦〉則進一步以「江海題材」爲象徵，希望能鞏固「江南」在識別名物的論述中，處於權力中央的位置。然而，這些大賦中的「江南」，都並未呈現出長久依存於「江南」的在地體驗。

相對的，〈山居賦〉中的「山居」，不論是強調「山」而不是「水」，或是雖

沿用賦體，但提出遊走於私我與皇權兩種向度的「居」，都豁顯出不同於以往大賦的關注角度。謝靈運對於經營山岳的興趣其實不是個案，晉宋時期的「東山」即吸引了大量隱者前往居處，他們心目中的「東山」，是得以探勘封佔的地利資產，也是能讓名士遊賞山水、舒展風流的場域；是物質條件豐裕、注重享受的隱處，也是必須精心打造、流露士族品味的經營之所。不過，「山居」對於謝靈運來說，意義不僅於此。一方面此「山」為故鄉始寧，藉由經營始寧莊園的身體行動，將賦體所展現的皇權，轉化為士族封山佔水的合法聲明以體現「祖德」，使「山居」獲得「名動京師」、對抗放逐的效力；另一方面，「居」也是長時間停留以產生意義的過程，因此謝靈運不僅在身經形處中，以八方殊異的山川描寫轉化有無與否的資產聲明，用物與物之間的動態關係取代了原有普遍物性的展示，形成了一種新的以人身為維度的地理論述，並且也以賦前後的書寫歷程，具現了「居」的逐漸深入。而賦篇中引述〈九章·涉江〉的一段風景描繪，原為屈原放逐江南，徘徊於政治荒原中哀戚的心靈風景，但一方面始寧莊園居於權力中心的發聲位置，迥異於行吟在政治邊緣的屈賦，另一方面謝靈運將之轉寫為「有趣之極」的實地體驗，因此使得追不回從前、看不到未來、歸不了家鄉的放逐之悲，轉換成了歸返故土、朗現當下、自主選擇的悠遊自在。

相較於〈山居賦〉有意識地改寫了屈原的「江南」，並於賦篇龐大的鋪寫中只引用了一個段落；庾信〈哀江南賦〉的篇題與〈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其中「哀江南」三字的相契，的確容易讓人只留心於該在與屈作的並比中，透析〈哀江南〉的篇章題旨。然而若意識到，「江南」一詞積累了南朝士人一層層的生活印記與思索體會，〈哀江南賦〉當也有承襲屈原並加以轉化之處。因此，其「江南」論述可從三個層次來談。首先，「哀江南」一詞固可溯及〈招魂〉，從「士臣哀思」與「君國悲悼」的角度切入，將「江南」解為「梁朝」，並且在與屈原的對照中，呈現出庾信在貞與不貞間的矛盾糾結，但也應注意「江南」包有地理、社會、文化等意涵，「梁」只是其成分之一。其次，將〈哀江南賦〉與〈歸魂賦〉、〈觀我生賦〉相較，會發現三篇賦作中的「江南」書寫，都觸及了「人情普遍性」與「文化正朔」：前者反映了東晉渡江歷數百餘年，士人已在「江南」落戶生根，對於南土的依戀，且不同於〈山居賦〉，都已不重「江南」的山水開發，這一方面可能是建康與會稽城市意象有別，另一方面山水經營風潮至梁朝已告一段落，亦是可能的緣由；至於後者，〈哀江南賦〉僅簡略帶過，〈歸魂賦〉與〈觀我生賦〉著墨較多，兩賦描述了士人入北後的所見所感，相較於禮樂江南，北方京洛的輝

煌只留存在史冊之中，觸目所見不過是徒具虛文的山川遺跡，反映了以「江南」為文化正統的態度。第三，用典乃是希企積累文化，然而〈哀江南賦〉在大量援引「江南」古事入典時，卻採取了反用典故的方式，這就是從一個更廣遠的、上承吳楚越的「江南」文化，去剝蝕消溶從東晉家族南渡、梁朝興盛以建構起的「江南」家園，以及「江南」紹繼大漢的「中原」意蘊。因此梁亡可悲只是其中的一個節點，〈哀江南賦〉開篇至「馬武無預于甲兵，馮唐不論于將帥」，東晉至梁的文化礦層也被庾信掏空，甚至連「江南」更久遠的文化繫聯也被庾信割斷。「江南」之可「哀」，並不只是因為整個「江南」都已然消亡，而且還是由於它仍在持續崩毀。

因此，從《楚辭》談到〈山居賦〉、〈哀江南賦〉，也就呈現出了一個起源、開發與崩毀的歷程。並且這之間，「江南」經常是處於和權力中心相對的邊緣地帶：屈賦中遠離郢都的放逐之地、「擬騷」中不遇的紙上寄託、〈招隱士〉中勸慰接受中央掌控的隱士之地、漢大賦中統一帝國的一隅、〈答車茂安書〉裡意欲與西晉對抗的東南小縣、〈江賦〉中奮力擠入主流論述的長江、〈山居賦〉中體現祖德對抗放逐的始寧故地，……不論這個權力中心通常是中原帝國，還是偶而的南方政權，都一直要到〈哀江南賦〉、〈觀我生賦〉和〈歸魂賦〉，「江南」才成為了「中原」所在，而且是以駢賦此書寫範式來加以體現。往後庾信的〈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以南筆歌頌北地，嘗試讓北方也經由南方的書寫格套來成為權力中央，相較於以往「江南」希冀藉著傳統賦體以進入「中原」論述，正可說是此一時期，彼一時了。

本論文企圖以三個端點的辭賦之作，勾勒前中古「江南」論述的大致走向。此課題猶有可以繼續研究的空間，除了將觸角擴大至詩作、樂府，或其他文類比如散文、銘、地志等等，也仍可上溯《詩經》，下開唐宋以至明清，以觀察出整個「江南」論述的脈絡。希望本文能對「江南」的研究，有著些許的裨益。

主要參考書目

一、古籍

經史部

- 《十三經注疏·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4月。
- 漢·司馬遷著：《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
- 漢·班固：《漢書》，臺北：史學出版社，1974年5月。
-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
-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
- 唐·李百藥著：《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3月。
- 唐·李延壽：《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1月。

子集部

- 楚·屈原著，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著：《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8月。
- 楚·屈原著，姜亮夫校注：《重訂屈原賦校註》，收入《姜亮夫全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 楚·屈原等著，李山選譯：《楚辭選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月。
- 漢·司馬相如著，金國永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 吳·陸機著，王德華注譯：《新譯陸機詩文集》，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9月。
- 劉宋·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4月。
- 劉宋·謝靈運著，李運富：《謝靈運集》，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8月。
- 梁·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11月。
-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灣：開明書局，1993年5月。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9月。
-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

北齊·顏之推著，周法高輯注：《顏氏家訓彙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5年4月。

北周·庾信著，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月。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

唐·張鷟：《朝野僉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

劉緯毅輯：《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2月。

宋·黃伯思：《東觀餘記》，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743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無著月份，頁68-71。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10月。

宋·談鑰：《嘉泰吳興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3年3月。

宋·樂史等著：《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8月。

明·蕭良幹等修，張元忬等纂：《紹興府志》，明萬曆15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

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臺北：廣文書局，1963年2月。

二、專著

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臺北：帛書出版社，無著出版年月。

游國恩：《楚辭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2月。

林庚：《楚辭研究》，臺北：華聯出版社，1968年7月，頁125-145。

施淑女先生：《九歌天問二招的成立背景與楚辭文學精神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9年，不著月份。

蕭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3年12月。

姜亮夫纂定，陶秋英校：《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5月。

林文月先生：《謝靈運》，臺北：河洛出版社，1977年5月。

饒宗頤先生：《楚辭地理考》，臺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4月。

盧建榮：《一位父親的叮嚀——顏氏家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6

月。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7月。

許東海：《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9月。

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

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的自然觀——以魏晉南北朝文學爲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

蕭兵：《楚辭的文化破譯——一個微宏觀互滲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

劉文忠：《鮑照和庾信》，臺北：群玉堂發行、鴻泰總經銷，1991年12月。

張可禮：《東晉文藝繫年》，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10月。

牛貴琥：《腸斷江南——庾信與齊梁文士現象》，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

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7月。

鄭毓瑜先生：《六朝情境美學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3月。

林文月先生：《山水與古典》，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6月。

王國瓊先生：《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96年7月。

魯同群：《庾信傳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6月。

彭毅先生：《楚辭詮微集》，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6月。

王文進先生：《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2月。

李錫鎮先生：《庾信〈哀江南賦〉的批評與詮釋》，臺北：三通圖書公司，2000年3月。

熊任望：《楚辭綜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

鄭毓瑜先生：《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8月。

王文進先生：《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12月。

程章燦先生：《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孫康宜先生著，鍾振振譯：《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2001年9月。

陶文鵬、韋鳳娟主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

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月。

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

景遐東：《江南文化與唐代文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鄭毓瑜先生：《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12月。

顧彬(Wolfgang kubin)著，馬樹德譯：《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

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

宋紅編譯：《日韓謝靈運研究譯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Xiaofei Ti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三、單篇論文

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頁95-113。

錢穆：〈畧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新亞學報》第五卷第二期，1963年8月，頁23-77。

陳世驥先生：〈論時：屈賦發微〉，收入葉維廉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比較研究》，臺北：黎明文化，1977年10月，頁47-358。

劉翔飛：〈論「招隱詩」〉，《中外文學》第7卷第12期，1979年5月。

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83年4月，頁67-171。

郭玉雯先生：〈哀江南賦的結構與用典〉，《臺北師專學報》第13期，1986年6月，頁67-93。

- 楊儒賓先生：〈龍門之桐半死半生——由體裁、主題與表現方式，論庾信晚期作品所展現的精神世界〉，《幼獅學誌》第12卷第1期，1988年5月，頁39-79。
- 王琳：〈簡論漢魏六朝的紀行賦〉，《文史哲》1990年第5期，頁67-69。
- 沈伯俊：〈司馬相如的代表作是天子游獵賦〉，收入馬積高、萬光治主編：《賦學研究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8月。
- 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0月，頁209-253。
- 周振鶴：〈釋江南〉，收入錢伯成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1992年6月，頁141-146。
- 林文月：〈潘岳陸機詩中的「南方」意識〉，《臺大中文學報》第5期，1992年6月，頁81-118。
- 張素卿先生：〈時空・天人：解讀庾信的「懷歸意識」〉（臺灣大學、荷蘭萊頓大學主辦，「中國文化中的時空觀念」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1993年5月。
- 俞志慧：〈唐代浙東詩論略〉，《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14-22。
- 廖棟樑：〈接受美學與《楚辭》學史研究——以屈原形象的歷史建構為例〉，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中國文學史暨文學批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1996年12月，頁67-86。
- 鄭毓瑜先生：〈魏晉南北朝行旅賦的兩種類型及其美學意義(今風古轍，每動寸衷——漢魏六朝行旅賦的抒情美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7年7月。
- 廖棟樑：〈對話批評：論漢代「擬騷」作品在「楚辭學」上的意義〉，《輔仁國文學報》第十三集，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11月，頁67-95。
- 王文進先生：〈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年7月，頁103-113。
- 李雁：〈論謝靈運和山水遊覽賦的關係——以〈山居賦〉為中心〉，《文史哲》，2000年第2期，頁40-43。
- 齊益壽先生：〈「達人」形象與謝氏門風〉，收入《文化的饕餮・語言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頁155-171。
- 潘朝陽：〈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說」的宗教性詮釋〉，《中國文

- 哲通訊研究》，第 10 卷第 3 期，2000 年 9 月，頁 169-188。
- 胡寶國：〈魏晉南北朝的州郡地志〉，《中國史研究》2001 年 4 期，頁 13-25。
- 許又方：〈路曼曼其脩遠兮/論〈離騷〉中的時空焦慮〉，《東華人文學報》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381-416。
- 小西昇著，宋紅譯：〈謝靈運山水詩續考——其審美意識與山水畫之關係〉，收入宋紅編譯：《日韓謝靈運研究譯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109-126。
- 衣若芬：〈「瀟湘」山水畫之文學意象情境探微〉，《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0 期，2002 年 3 月，頁 175-222。
- 朱曉海先生：〈讀〈哀江南賦〉三問〉，《燕京學報》新 12 期，2002 年 5 月，頁 191-250。
- 蔡英俊先生：〈「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收入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12 月，頁 67-96。
- 何乏筆：〈氣氛美學的新視野：評介伯梅〈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第 70 期，2003 年 4 月，頁 34-43。
- 王文進先生：〈南朝士人的思維模式〉，《東華人文學報》第 5 期，2003 年 7 月，頁 235-260。
- 高莉芬先生：〈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113-148。
- 沈凡玉：〈由典故運用試論謝靈運詩與《楚辭》之淵源〉，《中國文學研究》第 18 期，2004 年 6 月，頁 57-83。
- 胡萬川：〈楚辭〈招魂〉與「中國」樂土〉，收入氏著：《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 7 月，頁 109-129。
- 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東華人文學報》，第 7 期，2005 年 7 月，頁 41-84。
- 鄭毓瑜先生：〈從病體到個體——「體氣」與早期抒情說〉，收入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 9 月，頁 417-459。
- 程章燦先生：〈地理發現與政治定義——論郭璞〈江賦〉〉，收入氏著：《賦學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9 月，頁 191-204。

曹虹：〈謝靈運〈山居賦〉自注與柳宗元山水遊記〉，收入氏著：《中國辭賦源流綜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9月，頁76-82。

王文進先生：〈三分歸晉前後的文化宣言——從左思〈三都賦〉談南北文化之爭〉，《漢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5年12月，頁27-48。

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從〈廬山略記〉與〈遊石門詩序〉談起〉，《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71-106。

許東海：〈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141-173。

鄭毓瑜先生：〈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先生此文原以英文稿 Bodily Movement and Geographic Categories: Xie Lingyun's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nd the Jin-Song Discourse on Mountains and Rivers 登載於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vol. 23, 1-4, 2007, pp.193-219。此增補部分內容之中文稿已通過審核，將刊登於《淡江中文學報》，本文所引述之內容出自原始稿本，將待學報出刊後再加列出版項及調整頁碼）。

Michael Foucault. "Questions on Geography."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p. 63-77.

Böhme, Gernot. "Fundamental Concept of a New Aesthetics." *Thesis Eleven* 36(1993).

Böhme, Gernot 著，谷心鵬、翟江月、何乏筆譯：〈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第70期，2003年4月，頁10-33。

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神女之探尋〉，收入莫礪鋒編：《神女之探尋——英美學者論中國詩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2月。

四、學位論文

沈冬青：《梁末羈北文士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

李光哲：《謝靈運詩用典考論》，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87年6月。

吳旻旻：《香草美人傳統研究——從創作手法到閱讀模式的建立》，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7月。

廖棟樑：《古代楚辭學史論》，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 年 6 月。

李心怡：《唐詩中的揚州形象》，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

劉躍進：《樂府古辭〈江南〉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

孫雅芳：《安居的沉吟：魏晉『閒(閑)居』賦作析探》，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陳頤真：《六朝之江南及其文學——以香草、山水與歸魂爲主》，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

蘇芳于：《唐宋士人揚州遊樂意象的生成與轉變》，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

